

云髻山飞出的雄鹰

李任予简介.....	1
第一章 投身大革命洪流.....	2
一、苦难童年.....	2
二、读书岁月.....	4
三、投笔从戎.....	7
第二章 转战闽西创建革命根据地.....	13
一、领导农民开展武装斗争.....	13
二、闽西地方武装斗争主要领导人.....	16
三、首任红四军第四纵队党代表.....	22
第三章 参与红四军领导工作.....	24
一、接任红四军政治部主任.....	24
二、兼任中共上杭县委书记.....	29
三、创办第一张军报《浪花》.....	36
四、古田会议组织者之一.....	38
五、用古田会议精神加强部队建设.....	50
第四章 留守闽西 扩大和巩固闽西苏区.....	54
一、任红二十一军政治委员.....	54
二、率领部队出击东江.....	56
三、任闽西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59
（《红二十一军军委书记李任予给中央军部南方办事处、广东总行委的报告——进攻东江经过及最近内部情况》）.....	61
第五章 到北方开展革命斗争.....	69

一、在南京、上海开展革命工作.....	69
二、恢复北平党组织活动.....	70
第六章 领导保定二师学潮.....	76
一、改组保属特委.....	76
二、开展护校学潮斗争.....	81
第七章 领导高蠡暴动.....	89
一、受命发动高蠡暴动.....	89
二、高蠡两县亲察民情.....	90
三、布置蠡县高阳游击战争.....	103
四、省委军委书记湘农来保指导.....	106
五、组织高蠡暴动，建立红军.....	116
第八章 被捕入狱 坚贞不屈.....	135
一、用生命保护党组织.....	135
二、彪炳史册 英魂长存.....	138
附 录.....	142
红军早期领导人李任予烈士追认纪实.....	142
追寻红军早期领导人李任予的足迹.....	148
一、李任予的革命经历十分丰富，生前化名多，追寻其 下落过程曲折复杂.....	148
二、李任予不仅仅是新丰的光荣，不仅仅是韶关的光荣， 而且是我们广东人民的光荣.....	151
三、红四军主要领导成员李任予对红四军党的建设和思想	

政治工作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	154
四、李任予临危受命，为壮大发展北平市（今北京市）的 党组织和发展党员做出杰出的贡献.....	158
五、李任予作为一个党的高级领导干部，把生命献给了中 国人民解放事业，他的精神会永垂千古，激励着全国人民 不断地前进.....	159
李任予生平年表.....	166
李任予被追认为革命烈士大事记.....	186
1946 年.....	186
1953 年.....	186
1957 年.....	187
1984 年.....	187
1985 年.....	187
1986 年.....	188
1988 年.....	189
1989 年.....	189
1991 年.....	189
1992 年.....	189
1999 年.....	190
2000 年.....	190
2002 年.....	191
主要参考资料.....	192

后 记.....	196
----------	-----

李任予简介

李任予，汉族，1903年11月出生于广东省新丰县丰城城东村车田围，是中国工农红军早期领导人之一。他1925年投笔从戎，并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参加了著名的广州起义，1928年任中共福建临时省委特派员，在福建闽西地区组织领导农民武装斗争，是闽西革命根据地主要创建者和领导者。他先后任中共上杭县委书记、中共闽西临时特委军事书记、红四军第四纵队党代表、红四军政治部主任等职。他是古田会议组织者之一、红四军前委委员、红四军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他后任红二十一军政治委员、军委书记，闽西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红新十二军政治部主任。1931年，他受中共中央派遣，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化名李德山、李之道、黎亚克，到北方开展革命斗争，恢复整顿北平党组织，建立红军，创建北方苏区。先后任中共北平市委组织部长、中共保属特委书记，组织领导了全国闻名的“二师学潮”，发动了震惊华北的“高蠡暴动”。1932年9月30日，因叛徒出卖被捕，他在狱中受尽酷刑，坚贞不屈。11月27日，他在河北保定城外小西门刑场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年仅29岁。

第一章 投身大革命洪流

在广东省中部偏北山区，有一个千年古县——新丰县。远在新石器时代，人类祖先就在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南齐永明元年（483 年）朝廷析龙川设置新县，因该地域资源充足，故称新丰县，是取“物产丰富”之意。隋开皇十八年（598 年），改新丰县为休吉县。大业三年（607 年），将休吉县并入河源县。明隆庆三年（1569 年），析河源县地，兼割英德、翁源两县东南隅再复县，取“长久安宁”之意，称长宁县。民国三年（1914 年）为避免与四川省及江西省的长宁县同名，故改称为新丰县。

一、苦难童年

新丰人民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早在明、清两朝，新丰人民不堪忍受封建统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揭竿起义，攻打县衙；不畏强暴，劫富济贫。大革命时期，共产党领导的农民运动波及新丰，进步青年曾福田发起成立了新丰县农民协会（亦称犁头会），在丰城、梅坑等地组织发动农民，对地主豪绅开展抗租抗暴斗争，有力地打击了封建统治的反动气焰。为了寻找真理，探索革命的道路，新丰一批进步青年学生冲出山门，奔赴广州，投身大革命洪流。有的考入黄埔军校，加入北伐战争的行列；有的从事工人运动，在斗争中成长。李任予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新丰县境内中北部有一座山峰，名称云髻山，主峰海拔 1438 米，

是珠江三角洲地区内最高的山峰，从云髻山峦中孕育出新丰江的源头。在山脚下，紧邻县城城东有个名叫车田围的小村，此地一片竹海。绿竹成荫，山清水秀，风景瑰丽，与云髻山同属新丰旧八景之一。此处地灵人杰，人材辈出。1903年11月4日（农历九月十六日），就是在这小村的一户贫苦农民家里诞生了一个男婴。该男婴长大后事迹彪炳，非同凡响。他是为数不多的参加了著名的广州起义和高蠡暴动的传奇人物；他是闽西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和领导者之一；他是古田会议组织者之一，曾是红四军主要领导人之一；他为中国工农红军的建设，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思想建设、政治建设和部队建设付出了毕生精力，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创建史上写下了光辉一页；他短暂的一生功勋卓著，充满传奇！他就是红军早期领导人——李任予。

李任予出生在新丰县城城东的车田围村。故居座东向西，屋前有一口半月型水塘，屋舍中间为大门，大门两边有水门，南边水门里有9间住房，北边水门中厅有一间厢房，是李任予出生之所；大门中间有天井，后栋中间是厅房，两边共有4间住房，前栋有房4间，在故居北面100米处为李氏茂公宗祠。

李任予祖籍福建省上杭县稔田镇丰朗村，祖上李福庆是李火德（火德公）十一世孙，明朝嘉绪十九年（1538年）迁入长宁县（今新丰县）遥田，李福庆后裔李文佐之孙李茂于明朝末年，由遥田迁居新丰县城南车田村绿竹围开基。李任予是李福庆十七世裔孙，乳名亚桥，辈名济道，参加革命后，曾用名李力一、李德山、黎亚克、李之道。兄妹5人，他为兄长，大弟光吕，二弟充吕，四弟安吕，还有

一个妹妹很早就已去世。

李任予祖父李奕瑶，原家境富庶后家道中落，到父亲李世彰（又名李名伍）时家境已贫寒。其父以教书、行医为业兼种几亩薄田，每年的收入仅能勉强维持7口之家的生活。母亲潘氏是个贤良、俭朴、正直、勤劳女性。

在母亲影响下，他从小就养成爱劳动的习惯，做一些挑水做饭、喂猪放牛、栽种收割等力所能及的家务和农活。他幼年随父在村私塾里就读《人之初》、《启蒙》、《增广贤文》和《三字经》等一类书籍。在父亲严格管教下开始接受启蒙教育，读书期间，母亲由于终年操劳积劳成疾，虽经精心调治最终因医治无效撒手人寰。母亲过早地离开了人世，使失去母爱年幼的李任予心灵受到极大创伤。遭此变故，作为长子，他只好放弃学业回家承担一些家务劳动。生活的艰辛促使他萌发了对贫富不均现状的愤慨！不久，其父李名伍继配廖氏。因家庭经济窘困，经常饥寒交迫，加上弟妹年幼，继母廖氏把主要精力都放在照顾年幼的弟妹身上，对任予关爱很少。由于艰难困苦，不得不由外公廖敬渊将他接到新丰县诸家镇塘陂岭（今新丰县梅坑镇大岭村）寄养。李任予在这种艰辛的环境中度过了童年，从小就饱尝了生活的艰辛和穷人的疾苦，磨砺出他坚强的意志和吃苦耐劳的精神。

二、读书岁月

1913年，李任予已10岁，其舅父潘庚平（梅坑大岭人、清末秀才）认为他聪慧敏锐是个读书的料，长大后定会有出息，便把他带到

自己开设的私塾读书。当时李任予唯一的念头就是读书。他知道，只有读书才有出路，才能改变家庭困境。他自幼养成了勤学好问的习惯，求知欲很强。因此他发奋读书，各科成绩都名列前茅。为不断增长知识充实自己，课余时他如饥似渴地阅读一些中国古典名著如《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等。

1917年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开创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唤起了全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觉醒。1919年5月4日，北京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五四爱国运动，揭开了中国现代史上伟大的一页。地处粤北山区的新丰，虽没有北京那样激动人心盛大的游行示威，也没有慷慨激昂的演讲；但五四运动所激起的革命浪潮势不可挡地冲击着这个古老而封闭的山城。在反帝反封建爱国主义运动影响下，各种新思想、新文化，唤起了人们特别是青年一代知识分子的觉醒。当时的李任予和大多数穷苦青年知识分子一样，由于政治上找不到出路，经济上没有地位，对于国家衰弱，政府腐败和帝国主义列强的入侵，一方面感到无比忧愤，一方面又为报国无门而深感苦闷。五四运动以后，李任予被新兴进步的社会潮流所鼓舞，长久以来压抑在胸中的爱国激情从此振奋起来。

为了提高自我更好地吸收接纳新思想，寻求救国报国之路，1923年，李任予离开家乡前往广东韶州（今韶关市），在其舅父潘庚平好友潘允和（当时在韶州开药店）的帮助下，到韶州府神道学校就读。

韶关市地处粤北山区，中华民国成立前称韶州府。神道学校原校址在韶州府东河坝，清代末期由基督教会主办，民国初改为开明中学

（现址在韶关浈江区东河村）。

在五四爱国运动影响下，神道学校的青年学生精神面貌为之一新。他们不再埋头死读书了，而是经常聚集在一起传阅进步书刊，探讨时局和研究各种新思想，研讨世界大事和国家大事。李任予思想倾向进步向往光明。他参加了该校进步组织，经常组织同学们讨论反帝反封建等社会问题。为更好地领会宣传新思想，李任予利用课余时间经常如饥似渴地阅读了当时的进步组织在韶州发行的《新青年》、《新潮》、《列宁学说》、《马克思主义》等进步书刊。他从中汲取新的政治主张和思想，寻求救国拯民之道，从而大大地丰富了他的知识，开阔了他的眼界。

《新青年》由陈独秀主编，是五四运动前后新文化运动中最有影响的权威刊物。五四运动以前，《新青年》曾大张旗鼓地宣传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毫不留情地抨击封建礼教，揭露军阀政府的腐败统治，提倡科学与民主，在青年知识分子中掀起了一个新思想启蒙运动，成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一面旗帜。五四运动以后的《新青年》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介绍欧洲的共产主义运动及革命理论。1923年6月重新出版《新青年》季刊。该刊物由瞿秋白主编，是中共中央机关出版。

《新潮》是北京大学一个著名学生社团“新潮社”的刊物。在五四运动期间，《新潮》以尖锐泼辣的文字和透彻的说理，激烈地抨击封建伦理道德下的孔孟之道，提倡个性解放，婚姻自由和男女平等，鼓励青年男女同封建传统观念作彻底的决裂。

李任予通过阅读这些进步书刊，使自己耳目为之一新。五四运动吹响了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号角，唤醒了中国的青年一代，也促使李任予明确了人生的价值和意义。他还与一班志同道合的同学交流传递各种消息，议论政局时弊，探讨救国大计。他们互相激励，立志将来干一番事业，为国家民族的独立解放和繁荣富强努力奋斗。李任予同这些具有革命意识的同学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并很快成为该校进步活动的骨干。

1924 年，神道学校学生发起反对学校当局压制进步活动的学潮斗争，李任予因积极参加学潮，被校方开除。李任予是个有抱负的热血青年。他并未因校方开除而消沉，反而更加坚定了救国救民的决心。

三、投笔从戎

1925 年春，潘庚平通过亲朋好友的介绍，再次资助保送李任予到广东甲种工业专科学校就读。

1925 年 5 月 14 日，上海日本纱厂工人为抗议日本资本家无理开除工人举行罢工。5 月 15 日，日本资本家开枪打死工人代表顾正红，并打伤工人 10 多人。这一暴行激起了上海工人、学生和广大民众的愤怒。5 月 30 日，上海各校学生 2000 多人到租界散发传单发表演说，声援工人罢工并要求收回租界，被租界巡捕抓去多人，引起学生和市民更大的激愤。近万名群众聚集在巡捕房门口要求释放被捕学生。但是，帝国主义的捕头竟命令巡捕用机枪向群众射击，群众退避不及，当场死伤达数十人，制造了震惊全国的五卅惨案。

五卅惨案发生的当天深夜，中共中央召开会议，决定将斗争迅速扩大到各阶层人士中去，号召各阶层人士行动起来，开展罢工罢课罢市的斗争，组织广泛的反帝爱国统一战线，反对帝国主义的暴行。中共广东区委迅速贯彻中央的指示精神，决定发动民众开展示威大游行，并筹划在省港两地举行大罢工以声援上海工人。6月19日，在中共两广区委书记陈延年和苏兆征、邓中夏等领导下，广州数十万工农兵群众为声援上海人民的“五卅”（5月30日）反帝斗争，举行了著名的省港大罢工，香港海员电车和印刷工人首先行动。6月23日，罢工工人和广州工农商学兵各界群众5万多人涌到东较场集会，通过对“沪案”的要求条件16项，提出收回海关主权，收回租界，取消一切强加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反对外国人在中国设立工厂，铲除汉奸等多项要求。下午1时30分，反对帝国主义的示威游行开始，5万多人的游行队伍按照工、农、学、商、军的顺序排列，组成示威游行队伍，沿着广州的大街浩浩荡荡，有秩序地前行。游行队伍沿途散发各种传单，高呼“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援助上海五卅惨案”等口号。下午2时40分，当游行队伍途经沙基西桥之际，在沙面的英军突然开枪射击，白鹅潭及沙基口之英、法、葡等国的军舰亦同时开火，打死52人，重伤170人，轻伤无数。

李任予面对帝国主义制造这一骇人听闻的沙基惨案，耳闻目睹帝国主义列强对游行队伍的镇压以及封建军阀的黑暗统治，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无比的愤慨使他产生了强烈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主义思想。工人们反帝反封建的英勇壮举，激发起他放弃学业，加入工人

运动的念头。

作为罢工主要领导人之一的苏兆征，十分重视在罢工工人中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在工人队伍中开展党组织的建立工作，壮大党的力量。在苏兆征等人带领下，先后在罢工工人队伍中组建了罢工委员会和罢工工人代表大会，以此作为罢工的指挥部，带领工人同帝国主义进行斗争。

1925年8月，为了救国救民，李任予告别了读书生活投笔从戎，投身到中国大革命洪流。他先是在广州市从事工会工作，领导工人开展罢工斗争。不久，他担任了北海中队长，缉获走私，罚收巨款，充作办学，曾登报广闻。他还积极参与发动广西北海的革命群众运动，与黄敬云一起在广西北海指导开展“援助省港罢工周活动”，募捐款项支援省港大罢工，同时还将作恶多端的英帝分子驱逐出境。

李任予在工人运动的暴风雨中经受锻炼迅速成长，在苏兆征、邓中夏、李森等工人运动领袖的影响下，他开始懂得马列主义的道理，领会到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任务，以及怎样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共产主义战士。为此，他积极地参加革命实践，更加勇敢地投身于工运工作。他立下决心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人类最美好的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

1925年10月，在苏兆征、邓中夏、李森等工人运动领袖的培养教育下，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同李任予一起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有近千名人士是受到苏兆征等培养和影响的优秀分子。其中包括罗登贤、邓发、陈郁、李源、黄苏、

何来等。这些人士大多数后来都同李任予一样成为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这批工人阶级中的先进分子团结了广大罢工工人，向帝国主义者和国内反动势力进行坚决的斗争中发挥了骨干作用。

1926 年，李任予在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十师蒋光鼐部教导团任政治指导员，协助蒋光鼐训练军队。

蒋光鼐，名憬然，广东东莞人，中国著名爱国抗日将领。1913 年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曾任国民革命军师长，第十一军副军长，十九路军军长。1945 年抗战胜利后，他从香港返回内地，任国民党第七战区副司令长官，1946 年参与发起组织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支持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中央人民政府纺织工业部部长、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务委员等职务。

1927 年 4 月 12 日，蒋介石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大举逮捕和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4 月 15 日，广东的国民党反动派按照蒋介石指令，发动了四一五反革命“清党”大搜捕、大屠杀，解除了省港罢工委员会工人纠察队的武装，封闭了工会和农会等革命组织，逮捕了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 2000 多人，秘密杀害了一大批工农运动领袖和骨干，白色恐怖笼罩着曾是大革命策源地的广州。一时间，广州弥漫着血雨腥风。为保存革命火种开展新的战略转移，李任予在党组织的安排下，离开广州到北江（今韶关市）及江西等地从事革命活动。

大革命失败后，为挽救革命，反击国民党反动派的疯狂镇压和屠

杀，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了临时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利用共产党掌握和影响下的国民革命军在南昌举行起义，并成立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南昌起义前敌委员会。1927年8月1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率部举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和创建革命军队的开始。

南昌起义后的第6天，为了审查和纠正党在大革命后期的严重错误，决定新的路线和政策，中共中央于1927年8月7日在湖北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会议总结大革命失败的教训，讨论党的工作任务，确立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体党员书》等文件，要求坚决纠正党的过去的错误，号召广大党员和革命群众继续战斗。会议着重批评大革命后期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央所犯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及其他错误。选出以瞿秋白为首的新的中央临时政治局，毛泽东、周恩来、张太雷等被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

8月20日，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在香港召开省委会议传达八七会议精神。根据中央的指示，中共广东省委作出在全省举行武装暴动的决定，发出《关于暴动后各县市工作大纲（决议案）》，并决定成立广州、西江和北江暴动委员会，以配合南昌起义入粤部队一举夺取广州政权。11月，中共广东省委根据中央的指示，成立指挥起义的革命军事委员会，决定在广州发动起义。12月，南昌起义后李任予冲破国民党当局对共产党人的堵截“围剿”和层层封锁，他不顾个人安危由江西赣州绕道返回广东，途中遭遇检查，他化装脱险来到

广州后，全身心投入广州起义的准备工作中。

12月11日，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和叶挺、黄平、叶剑英、周文雍等人领导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教导团、警卫团和广州工人赤卫队在广州举行武装起义。广州起义打响后，李任予勇敢地参加了起义军的战斗，同国民党反动武装进行殊死搏斗。

广州起义取得初步胜利后，建立了广州苏维埃政府。广州起义和工农民主政府的成立，吓坏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他们联合起来镇压革命军，向新生的革命政权进行疯狂反扑。12月13日晨，国民党反动派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调集大批军警向起义军进行疯狂反扑。起义军在党的领导下，顽强抗敌。由于敌我力量过于悬殊，形势对我十分不利，起义失败。为保存革命武装力量，起义军撤离广州，转移到东江、北江等地农村和其他城市继续开展斗争。起义军部分武装力量，在广东花县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师，转入海陆丰地区，加入了东江地区的革命斗争；少数起义者到达香港，后到广西参加了左、右江起义；还有少数人员撤到粤北韶关地区，加入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部队，后来上了井冈山。根据党组织的安排，李任予前往闽西任职。几经周折，1928年春，李任予找到了中共福建临时省委。

第二章 转战闽西创建革命根据地

闽西是中国土地革命的重要发源地，是中央苏区的主要组成部分和经济中心，是毛泽东思想的发祥地；也是红军故乡将帅的摇篮，是红军长征的重要出发地；20年“红旗不倒”的革命堡垒。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等一代伟人在这里留下了光辉的足迹。古田会议，彪炳青史；才溪调查，辉耀千秋。中国共产党人在这里留下一个个惊天动地、震古烁今、可歌可泣的伟大创举，而李任予就是这一时期的杰出人物。

一、领导农民开展武装斗争

闽西即福建省西部地区，与粤东、赣南交界。这里山高林密，沟壑纵横，交通阻隔，为千百年来中原庶士南迁之客家祖地，是历代军事之要地。闽西地理位置重要，具有可进可退可守的战略意义，同时它距福州等中心城市较远，是反动统治比较薄弱的地方。这些都为开展游击战争，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创建革命根据地提供了极为有利的客观条件。

1928年春，李任予到福建后参与中共福建临时省委的领导工作，在闽西地区组织领导农民武装斗争。中共福建临时省委是由中共闽南临委和闽北临委合并组成，陈明为省委书记。中共福建临时省委分析了当前形势，认为闽西一带农民运动急剧进展，民众革命情绪高涨，指出当前党的主要方针是建立红色苏维埃政权，主要任务是领导工人

和农民举行暴动，实行土地革命，武装夺取政权。把全省划为 4 个暴动区域。闽西的龙岩、永定、平和为第一暴动区，认为这些地区农运已有相当的基础，“完全适用党的口号及新政策，应马上以暴动的方法实现之”。中共福建临时省委根据中共八七会议精神，制定了领导工农武装暴动，实行土地革命，夺取政权的任务。

中共福建临时省委成立不久，各地农民武装斗争的消息频传，工农革命汹涌激荡。1928 年初春，闽西农民运动逐渐由小规模武装冲突发展为一触即发的武装暴动。从 3 月初开始，龙岩、永定、平和、上杭、永定等县农民在党的领导下，与军阀豪绅展开激烈斗争，先后多次举行农民武装暴动，从而把如火如荼的农民运动推进到创建红色苏维埃区域的阶段。

3 月 4 日，龙岩县白土后田农民在党的领导下举行暴动，打响了闽西工农武装起义第一枪。作为“福建总暴动的信号”引发了平和暴动，接着上杭蛟洋、永定相继举行了农民暴动。

3 月 8 日，中共平和临时县委组织了 800 余人的农民武装攻占县城，中共福建临时省委接到平和临时县委即将举行暴动和要求派得力同志指导帮助的报告后，立即“派李任予和刘端生（中学巡视员）二人代表中共福建临时省委前往该地协助工作，将省委的指示精神直接转给平和党部，并设法建立起平和与省委的交通（线）”。

刘端生，广东大埔县人，1925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曾任中共闽南特委委员兼组织部长、中共闽西特委委员、中共汀连县委书记等职。1932 年 2 月在肃反扩大化中被错杀，年仅 27 岁。

中共福建临时省委非常重视这次农民武装暴动。特派具有政治水平、武装斗争经验和军事才能的李任予、刘端生两人为省委特派员，到闽西指导农民武装暴动。李任予、刘端生两人接到中共福建临时省委的指示后，立即从福建厦门启程奔赴闽西平和。当他们到达平和时，由于暴动队伍已撤出县城，正值国民党张贞部围攻长乐乡，他们一时无法与平和党组织接头，只好返回省委。3月20日，中共福建临时省委又派李任予、刘端生两人前往平和。于是他们再次绕道永定到平和，找到平和党组织和农民暴动队伍，从此建立起中共福建临时省委与平和县委完善的交通（线）。

1928年11月，出席中共六大代表、中共福建省委候补书记罗明从苏联莫斯科回到福建。他在向省委传达中共六大会议精神之后，与共青团福建省委书记陈柏生一起前往闽西各县传达贯彻中共六大会议精神和省委的指示。罗明从龙岩来到上杭传达中共六大会议精神。

罗明，广东大埔县人，1926年6月历任中共广东区委宣传部秘书、汕头地委书记、闽南特委书记，1928年2月以后历任中共福建临时省委书记、中共福建省委书记。由于工作关系，他经常奔波于闽西、闽南、粤东，对闽西各县的情况了如指掌。

中共上杭县委在庐丰召开扩大会议，罗明传达了中共六大会议精神后接着指出：“要加紧争取广大群众，积极准备第二次更大的武装斗争，要扩大和深入宣传土地革命，加强党在群众中的领导力量。”同时指出“闽西党组织目前的任务是恢复和扩大各区乡党的组织，建立党的基础，加紧训练，提高党员的政治觉悟和工作能力，建立党与

群众的密切联系。”并提出了发展新党员的具体要求。发动群众加入农会，自制武器作好武装暴动的准备。各级党组织要物色可靠分子，打入民团中去做分化瓦解敌军的工作。

会议对中共上杭县委领导机构进行了改组，增选委员 7 人，其中常委 3 人，候补委员 2 人。李力一（即李任予，以下同）任中共上杭县委书记。

罗明来到闽西各地传达贯彻中共六大精神，对统一党内思想，克服悲观消极情绪，振奋革命精神起到了积极作用。为掀起土地革命高潮和建立闽西革命根据地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上杭位于福建省西南部，东接龙岩，西连武平，北倚长汀，东北毗连城，东南邻永定，西南与广东省梅州市、蕉岭县接壤。东西宽 69 公里，南北长 78 公里，总面积 2848 平方公里。

上杭是李任予的客家祖居之地，中共福建临时省委派李任予到上杭任县委书记，有利于开展武装斗争，发展党组织。

李任予任中共上杭县委书记后，依照中共六大精神和罗明的指示，带领上杭县委致力于农村争取广大群众，积蓄和发展革命力量，并转入分散和隐蔽的游击战争。恢复和扩大各区乡党的组织，建立党的基础；积极准备第二次更大的暴动。1929 年 4 月，上杭党员由 200 余人发展到 300 多人，建立区委 4 个、支部 30 余个。10 月后，党组织迅速发展，有党员 3049 人。

二、闽西地方武装斗争主要领导人

中共六大以后，农村革命根据地得到不断巩固和扩大，其中以毛泽东等人创建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影响最大。这时，国民党军阀之间的战争暂时停息，蒋介石命令湘赣两省国民党军队向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发动了多次“会剿”。面对国民党军重兵，以毛泽东为书记的红四军前敌委员会与湘赣边界特委、红四军军委、红五军军委在宁冈县柏露村举行联席会议，决定由彭德怀、滕代远指挥一部分红军留守井冈山；毛泽东、朱德、陈毅于1929年1月14日率红四军主力3600人向赣南出击，以便解决由于敌人的军事“会剿”和封锁给根据地造成的经济困难，并以内外线相互配合的办法打破国民党军的“会剿”，保卫和发展根据地。

红四军主力下井冈山后，受到国民党军重兵的尾追和沿途阻截，屡次陷入险境。2月初，红四军主力进抵江西乌县罗福嶂时，赣军独立第七师刘士毅部前来包围。红军立即从罗福嶂出发，沿着冰封的崎岖山路，进入武平县和平乡的黄沙（今高书）村，当日再折回江西境内吴畬村宿营。翌日，红四军主力由上增坑再次进入武平县境，经龙溪、沙公排等地，下午抵达东留圩，立即展开宣传活动。当晚，红军指战员露宿于屋檐下潮湿的地板上。第二天凌晨，红军离开武平，挥戈北进。红四军入闽第一站经过武平，虽停留时间不长，活动不多，但这一振奋人心的消息很快传遍闽西、粤东地区。

2月11日，红四军在瑞金县大柏地歼灭尾追之敌刘士毅旅大部，俘敌800多人，扭转了被动局面。随后挥师北上，在吉安东固革命根据地与李文林等领导的江西红军独立第二团、第四团会师，开始

在赣南站住脚根。

这时，井冈山已被国民党军占领，原定的回师计划已无法实现，红四军分析了周围的实际情况，决定灵活使用兵力“到闽粤交界处游击”，随即于2月25日撤离东固，掉头东向，经永丰、乐安、广昌、石城向闽西进军。3月11日，红四军从瑞金壬田出发，挺进到闽西长汀县的楼子坝，次日进驻四都镇。盘踞在长汀城内的福建省防军第二混成旅郭凤鸣部闻讯后，想先发制人，派出团长钟铭清带补充团赶往四都渔溪截击，但该团不敢与红军正面交锋，隐蔽在山头放冷枪。13日清晨，毛泽东、朱德听取了敌情报告后，立即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分析了敌情，决定主动出击。上午8时，红四军分三路齐头挺进，在渔溪歼敌一半，钟铭清部便仓皇向长汀城方向溃逃。红四军各部乘胜追击，一直赶到长岭寨山脚下的陂溪村。当红军主力进抵陂溪村，郭凤鸣闻报立即率两个团进逼长岭寨，占领长岭寨东侧的梁屋头和河龙头等有利地形。14日晨，红军主力第二十八团、三十一团在朱德等指挥下，抢先占领长岭寨制高点，诱敌进入伏击圈。毛泽东率领红四军军部和特务营迂回敌后，断敌退路。在红军的上下夹击下，郭凤鸣两个主力团、机枪连等大部被歼，郭凤鸣左腿中弹后在两个马弁的搀扶下，逃到牛头村的栗树园厕所内躲藏，在红军打扫战场时被查获击毙。这一仗，红军歼敌2000余人，缴枪千余支、子弹数百箱。当天下午，郭部留守在汀州城内的卢新铭团向上杭方向逃窜，红四军乘胜解放了汀州城和周围乡村。

红四军首次入闽，首战长岭寨战斗告捷，并进占汀州城，大大振

奋了红军的士气，鼓舞了闽西和福建全省人民参加革命斗争的热情。福建及闽西各级党组织及时把握了这一有利的革命形势，发动群众起来斗争，积极配合红四军的行动。中共福建省委从红四军入闽的胜利喜悦中看到了闽西革命形势迅速发展的美好前景，为配合红四军入闽，在红四军到达长汀后仅两个星期，中共福建省委于3月28日制订了《关于闽西斗争工作大纲草案》，大纲草案中指出：红四军入闽加上国民党军阀混战的有利形势，必然使国民党在闽西的统治受到严重削弱，闽西工农革命运动将重新兴起高潮；“毫无疑义的在闽西有造成割据局面的可能”，并提出闽西的工作应以上杭、长汀、龙岩、永定四县为中心开展苏维埃活动，实行土地革命，造成割据局面。并决定恢复中共闽西特委（原中共闽西临时特委于1928年11月30日在永定文馆遭国民党驻军和地方民团破坏而解体）。指派李力一（李任予）到上杭城水南，召开（龙）岩、永（定）、（上）杭、（长）汀、武（平）五县代表会议，恢复建立中共闽西临时特委：

书 记：邓子恢

军事书记：李力一

常 委： 邓子恢、李力一、李立民

军事委员： 张鼎丞（省委委员，党团代表）

卢其中（永定红军团长）

傅柏翠（上杭红军领导者）

张赤男（张希尧，汀州县委）

李任予成为闽西地方武装斗争的主要领导人。

为了响应红四军入闽，中共闽西临时特委确定了一个在永定、龙岩、上杭 3 县骚扰敌人的计划，要求这 3 个县委发动群众，在各地散发宣言、标语，破坏敌人交通，宣传红军胜利消息，以此威慑敌人；同时，各县游击队分别向上杭、永定县城进袭，并在原来暴动区域再次举行暴动，造成四面骚动局面，迫使敌人疲于应付，帮助红四军摆脱敌人的追围。

李任予任军事书记后，领导闽西地方武装贯彻福建省委“工作大纲”，发动群众开展武装斗争，积极配合红四军行动，为红四军再次入闽，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为了便于开展游击战争，1929 年 3 月，红四军在长汀县改编，将军、团、营、连、排、班的编制，改为军、纵队、支队、大队、中队、分队的编制，分别编为第一、第二、第三纵队，第一纵队纵队长林彪，党代表陈毅（兼）；第二纵队纵队长胡少海，党代表谭震林；第三纵队纵队长伍中豪，党代表蔡协民。军长朱德，党代表毛泽东；政治部主任陈毅。并集中城里的裁缝师傅赶制了 4000 套军装。红四军官兵第一次穿上了整齐统一的青灰色军装，戴上缀有红五星的新军帽，打上新绑腿，部队面貌焕然一新。

1929 年 5 月初，蒋桂战争基本结束，国民党江西省主席朱培德即以 3 个旅分由赣州、泰和、临川向雩都、兴国、宁都、瑞金推进，企图围歼红四军于赣南地区。此时，粤桂军阀燃起战火，接邻粤东地区的闽西各大小军阀先后投入了这场混战。盘踞在龙岩的地方军阀陈国辉，追随闽南的国民党新编第一师张贞部加入了讨桂阵营，于 5 月

中旬出兵潮汕地区参加军阀混战，造成闽西腹地空虚的局面。

5月中旬，毛泽东、朱德在赣南宁都附近，接到中共闽西临时特委书记邓子恢建议红四军再来闽西的书面报告后，鉴于赣南敌军集中，闽西空虚的情况，决定避开赣军进攻锋芒，红四军再次入闽，开辟闽西新的割据区域。5月19日，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从瑞金出发，经长汀古城、四都挺进到濯田乡。这时，国民党军发觉红军动向，赣军李文彬旅紧追不舍，闽军卢新铭团在汀江东岸设防拦截，企图迫使红军背水而战，围而歼之。

5月20日上午，红四军进抵汀江渡口水口，在当地群众援助下，汇集9条大船全部渡过了汀江，甩开了国民党军，向龙岩方向疾进。随后，全军抵达连城庙前。21日晚，毛泽东、朱德在庙前孔清祠接见了应约前来的傅柏翠、曾省吾两人。他们听取了关于闽西革命形势和敌情的报告后，决定出其不意首先攻取龙岩城；然后攻打永定或漳州，消灭陈国辉，相机攻打张贞，扩大红军的影响。22日凌晨，红四军经芄园，加快步伐向古田进发。因为古田地方党组织预先接到闽西特委的通知，所以当红军一到，立即发动了武装暴动，组织了北五区（古田）革命委员会。红四军在古田稍事休息后，于当天下午进驻龙岩小池。

5月23日、6月3日和6月19日，红四军三次攻打闽西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城市——龙岩城。中共闽西临时特委军事书记李任予领导闽西地方武装配合红四军作战，先后打败了盘踞龙岩、永定、白砂等地的国民党军队，解放了龙岩、永定县城，极大地打击了当地的反

动力量，动摇了国民党的统治，使土地革命的巨大浪潮席卷了龙岩、永定、上杭、长汀、连城 5 县，开创出闽西革命斗争的新局面。

三、首任红四军第四纵队党代表

为了更好地迷惑陈国辉，红四军制造了向江西退却的假象。白砂战斗后，红四军没有强攻上杭城，而是于 6 月 10 日开到连城新泉进行了为期一星期的休整，并在“望云草屋”召开了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决定帮助闽西建立正规红军，成立地方苏维埃政权，使整个闽西形成工农武装割据局面，将红五十九团等闽西地方武装改编为红四军第四纵队。事实上几天前在上杭旧县，红四军前委就做出了组建第四纵队的决定，只不过到了连城新泉才向全军正式宣布。

在连城新泉的竹山背种有许多竹子，除了中央一个并不高的土堆外、竹山背的大坪还算是宽敞的。红四军在这里召开了军民大会，毛泽东、朱德、李任予、傅柏翠等人站在东山楼（后人称之为万人台）的台上，台前万人集会，规模盛大，十分气派。朱德军长亲自宣读了红四军前委关于成立红四军第四纵队的决定，任命中共闽西临时特委军事书记李任予为第四纵队党代表，傅柏翠为第四纵队纵队长，并抽调一、二、三纵队的部分干部如邓毅刚、谭震林、胡少海、毕占云等人到第四纵队任职。第四纵队由傅柏翠、曾省吾、罗瑞卿领导的第五十九团和张鼎丞领导的永定地方武装组成。下分第七、第八两个支队。第七支队由红五十九团，长汀赤卫队，永定湖雷、溪南游击队等编成，支队长陈紫峰，党代表傅松茂；第八支队由永定、龙岩、上杭东五区

农民暴动武装编成，支队长卢肇西，党代表赖连漳。

6月16日，蒋介石发出“会剿”命令，指令赣军金汉鼎师集中瑞金、汀州，闽军张贞师集中连城、龙岩，粤军蒋光鼐师集中上杭、永定，对闽西红色区域及红军实行三省“会剿”。

6月19日，李任予率领红四军第四纵队配合红四军主力第三次攻占龙岩县城后，红四军第四纵队进驻龙岩，在翁家花园进行编训，使该纵队真正初具规模，总人数800余人，枪400多支。

红四军前委和龙岩县委在龙岩城中山公园召开有3万余人参加的祝捷大会。6月下旬，红四军第四纵队在龙岩集中整训20余天后，随即参加了红四军“七月分兵”行动。在短短的时间里与其他纵队分别开赴闽西各县，在原来没有工作或工作基础较薄弱的广大地区，发动农民暴动，进行土地革命，成立区、乡苏维埃。开展筹款活动，巩固和发展赤色割据。

“七月分兵”进一步横扫了闽西境内的零星反动武装，促使各县红色区域迅速地连成一片。

以闽西地方武装改编的红四军第四纵队，后来转战闽粤赣边区，纵横几百里，接受了战斗的考验，成为闽西红军主力的中坚。

第三章 参与红四军领导工作

一、接任红四军政治部主任

在红四军第三次攻打龙岩城之前，红四军前委在小池召开前委扩大会议，决定于近期内召开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

红四军三克龙岩城后，暂时有了一个比较安定的环境。红四军前委决定抓紧这个有利时机召开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以解决党内由来已久的争论问题。1929年6月22日，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在龙岩公民小学的红四军政治部驻地（今龙岩一中内）召开，到会的有红四军前委委员、各纵队司令员、党代表和士兵共40多人；毛泽东在会前建议，通过采取总结过去斗争经验的办法达到统一认识、解决红军建设中主要问题的目的。这一建议没有被采纳。红四军七大由陈毅主持。会议认为，毛泽东是前委书记，对争论应多负些责任，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大会改选了红四军党的前敌委员会，由中央指定的前委书记毛泽东居然落选了，陈毅被选为前委书记。大会结束后，毛泽东离开红四军的主要领导岗位，到闽西特委所在地上杭县的蛟洋协助指导地方工作。

7月29日，红四军前委在连城新泉得到敌情报告。朱德、陈毅赶至上杭蛟洋，会同在那里参加闽西一大的毛泽东、邓子恢、张鼎丞、谭震林、傅柏翠一起，由前委书记陈毅主持召开了前委紧急会议，认为应积极应对国民党反动派三省“会剿”的到来；如三省会合进攻闽西，红军可取道闽北入赣东赣南发动沿途的群众，或入闽省腹地到

福州延平之间活动，或分兵两路，一路经闽北，一路经闽西。根据形势的发展，会议最后决定红四军兵分两路，一路留在闽西，缩小目标，一路离开闽西分散敌人的力量，以打破敌人三省“会剿”。会上还同时确定陈毅到上海参加中共中央召开的军事会议，汇报红四军工作，前委书记由朱德代理。

1929年8月7日，中共福建省委给永定县委并转闽西特委、红四军前委的信指出：“目前连城漳平宁洋一带的反动势力都很薄弱，我们应向这方面发展。一则可以拱卫闽西现有的斗争区域，二则可以扩大我们的力量向闽南闽西北进展”。福建省委的意见和前委会议的决定是基本一致的。福建省委在信中还特别提到：“李力一（李任予）同志暂时在红军中工作，如果红军离时，他一定要留在闽西做党的工作，因为他会说本地话，而且是一个得力的干部”。中共福建省委的信，充分肯定了李任予在闽西和红四军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根据红四军前委命令，红四军第二纵队与第三纵队按时赶到白砂集中，由红四军军长、代理前委书记朱德率领向宁洋县城挺进，开始了出击闽中的军事行动。李任予随前委和军部行动。

朱德，字玉阶，原名朱代珍，曾用名朱建德，1886年12月日出生于四川仪陇一个贫苦佃农家庭。他于1976年7月6日在北京逝世。他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和军事家、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要领导人之一、中国人民解放军创建人之一。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大元帅之首。他曾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总司令、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国民

革命军第八路军总司令、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

8月4日，朱德率领红四军第二、第三纵队，一举歼灭宁洋守敌，解放宁洋县城。8月7日，红四军第二、第三纵队沿双洋河南进，直赴漳平县城，在新桥击败陈祖康部及反动民团。8月8日，攻占漳平县城。进城以后，红四军在朱德的领导下，广泛开展了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朱德还亲自召开群众大会，召集手工业工人、农民和城镇贫民开座谈会，进行调查研究。号召工农劳苦大众团结起来投身革命斗争，并帮助建立了漳平县工会办事处、县农民协会、妇女会等革命团体和漳平县城防第一赤卫队。

8月15日，红四军第二纵队与第三纵队从漳平出发，经溪南、象湖、杨美，向大田、德化边界进发，出击闽中地区。8月下旬，由永春回师，重返漳平。8月25日到达漳溪南时将一直跟踪的张汝劭旅一个团消灭，击毙团副一名，缴枪数百支。8月29日，朱德率部猛攻漳平县城。激战一日，国民党军张汝劭旅残部退至永福，红军再次攻占漳平。接着，红军乘胜追击，又在永福歼敌一部。红军进占永福，直逼龙岩。这时，永福一带农民在红四军节节胜利的鼓舞下，揭竿而起，举行暴动。红四军派出红军干部指导永福群众开展革命斗争，在短短几天内，永福、龙车一带就建立了4个乡苏维埃政府，开展了打土豪分田地，减租减息的土地革命运动。

红四军在溪南、漳平、永福等地的胜利，把敌人三省“会剿”的

包围圈打开了一个大缺口。侵占龙岩的杨逢年旅吓得连夜弃城逃回闽南老巢。9月6日，朱德率红四军第二、第三纵队重占龙岩，胜利返回闽西。

击退国民党军队三省“会剿”以后，闽西红色根据地日益巩固。但是，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上杭县城仍被土著军阀卢新铭部盘踞。

上杭，地理位置险要，地形复杂。上杭城，位于汀江中游西岸，城墙坚固，三面环水，易守难攻，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民间相传着这样一首歌谣：“南有河道，北有鱼塘，东无退路，西无战场，钢铁上杭，固若金汤。嘱咐子孙，莫打上杭。”因而有“铁上杭”之称。民国十八年（1929年）红军入闽后，汀属各县逃亡的土豪劣绅，纷纷潜躲到上杭县城，曾两次惨败在红军手下的国民党福建省边防第二混成旅主力近2000人也盘踞在上杭城。他们依仗三面环水，周围有3丈多高的城墙，妄图固守“铁上杭”休养生息，等待时机东山再起。为了巩固和发展闽西苏区，必须消灭驻上杭城军阀的卢新铭部，解放上杭城。9月中旬，朱德率部返回闽西以后，根据中共闽西特委和中共上杭县委的要求和建议，红四军前委决定集中兵力攻下上杭城，拔除国民党军占据的这一重要据点，彻底消灭地方反动势力。随后，红四军第一、第四纵队奉命赶到上杭白砂集结。

9月18日，红四军4个纵队，秘密到达上杭城郊。朱德主持召开支队以上干部会议，制定了攻城战术，主力部队选定第二天夜间，由地方同志作向导，从水西渡择水浅处涉水过江，第一纵队进攻西门，用迫击炮猛轰，将敌主力引向西门，第二、第三纵队主攻北门；第四

纵队一部配合赤卫队攻取东门，另一部和赤卫队佯攻南门。朱德一面和各纵队、支队干部研究战斗方案，一面派人进城摸情况，联络地下情报站，命令部队做云梯，搭舟桥，作好一切战斗准备。

9月19日凌晨，红四军和上杭地方武装共1万余人，云集上杭城东北地区。红军分路向各城门发起总攻，守军孤注一掷，拼死顽抗。夜晚，红军组成突击队，架起攻城竹梯进攻，激战至次日清晨。20日，在朱德军长亲自指挥下，李任予率领部队一举突破西门城防，攻克了素有“铁上杭”之称的上杭城，俘敌千余人，缴枪千余支，打破了汀江天险的神话，赶走了闽西“最后一个土皇帝”卢新铭。朱德在县衙门前的广场上主持召开军民祝捷大会，热烈庆祝上杭城解放。

红军攻下上杭城后，中共闽西特委和上杭县委领导机关迁入上杭城工作。9月下旬，李任予参加了朱德在上杭城太忠庙主持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八次代表大会。红四军召开党的八大时，陈毅已去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工作，朱德主持前委会议，忙得不亦乐乎。加上当时频繁的军事行动和出击闽中某些战斗的失利，红四军的领导力量、特别是政治工作大大削弱，部队中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又有新的发展。因此，在红四军党的八大会议上出现了非常混乱的情况。开会讨论问题，无休止地争论。为了一个红军法规中党代表的权力问题，讨论了两天都没有统一认识，只好决定请示中央。就这样，这次会议在无组织状态下开了3天，结果选出来的红四军第八届前委，又同第七届前委一样，毛泽东只被选为前委委员，未能当选前委书记。同时，红四军又分兵向汀江以西短距离出击，上杭的湖洋、中都等地农民在

红四军支持下，举旗暴动，打土豪，建立农会、赤卫队等组织。至此，上杭除峰市（现为永定县辖）外，全境解放，杭川大地连结成了一片红色区域。

1929年11月，李任予任红四军政治部主任，他与毛泽东、朱德等红四军领导率领部队在闽西一带开展游击战争，打土豪、除匪霸、分田地、建立红色政权，为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做出了重要贡献。

二、兼任中共上杭县委书记

为加强上杭县党的领导，10月，李任予兼任中共上杭县委书记。这是李任予第二次出任中共上杭县委书记。10月2日，中共上杭县委在城关天主堂召开上杭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上杭县苏维埃政府。大会讨论和通过了关于分谷、土地、山林、债务、捐税、粮食、劳动、城市政策、优待保护青年妇女及老弱残、婚姻、文化建设、合作社、赤卫队、政府职员等提案和惩办反革命条例等22项提案。其中土地、山林问题提案规定：一切地主、土豪及福会众尝等田地，不论典当卖绝，一概没收，由苏维埃政府分配给农民。所有土豪地主以及公尝公山山场一律没收归公，山契焚烧，但农民自耕山不没收。为了粉碎敌人的经济封锁，发展生产，11月，上杭县才溪创办了闽西第一个消费合作社“才溪消费合作社”。随后，茶地、中洋、上早康、下早康、通贤都办起了乡一级的消费合作社，白砂、稔田、茶地、太拔、旧县建立了区一级的消费合作社。上杭作为当年中央苏区21个县市中，才溪乡同江西兴国长冈乡一样，创造了中央苏区第一等工

作，获得了“中央苏区模范乡和福建省第一模范区”的荣誉。

10月11日（农历九月九日）重阳节，毛泽东从永定合溪来到上杭城，住在“临江楼”。此时，毛泽东已经离开红四军的领导岗位。他深入上杭、永定的农村，一面养病，一面作社会调查。这时的闽西山区，黄色的野菊花竞相开放，毛泽东面对临江楼前寥廓江天和遍地黄菊花编织成的壮丽画卷，看到新生的革命根据地不断扩展，联想到上杭地区革命斗争如火如荼的喜人景象，不由得诗兴大发，在上杭城临江楼写下《采桑子·重阳》这一首不朽诗篇：

人生易老天难老，

岁岁重阳。

今又重阳，

战地黄花分外香。

一年一度秋风劲，

不似春光。

胜似春光，

寥廓江天万里霜。

由于得到红四军的帮助，在很短的时间内，闽西红色区域扩大到武平东部一带。至此，红四军经首战长岭寨，三打龙岩城，攻占铁上杭，先后消灭了统治闽西的土著军阀郭风鸣、陈国辉、卢新铭和地主豪绅武装，进一步巩固和扩大闽西红色区域，使闽西成为当时全国最大的红色根据地之一。是年秋天，毛泽东有感于闽西出现的前所未有的大好形势。展望未来，他心情喜悦地在《清平乐·蒋桂战争》一词

中充满激情地写道：

风云突变，

军阀重开战。

洒向人间都是怨，

一枕黄粱再现。

红旗跃过汀江，

直下龙岩上杭。

收拾金瓯一片，

分田分地真忙。

1929 年秋，中共中央根据时局的变化，于 9 月 28 日向红四军前委发来指示信，指出：“在军阀战争开始爆发之际，红军应以全部力量到韩江上游闽、粤游击，以发动群众斗争。至两广军阀混战暴发，东江空虚时，红军可进至梅县、丰顺、五华、兴宁一带游击，发动广大群众斗争，并帮助东江各赤色区域的扩大……”随后，中央给中共福建省委来信指示“红军全部即到东江游击，向潮梅发展”。中共福建省委接到中央这一指示后，于 10 月 6 日，立即向红四军前委和闽西特委发信，转达中央的意见，同时还派遣中共福建省委常委、组织部长谢汉秋携带中央和省委的指示信，从厦门赶赴上杭向红四军前委、闽西特委传达中央的指示信。指示“朱毛红军（红四军）立即开到东江去，帮助东江广大群众的斗争”。10 月 15 日，红四军第一、第二、第三纵队 6000 多人，依照红四军前委的命令，分三路陆续向闽粤边境进发，开赴东江一带作战，经半个月的作战，最后减员 1000

余人返回闽西。

10月27日，朱德、陈毅率领红四军回撤闽西，到达丰顺边界的当天下午，陈毅与李任予谈话。刚进屋，陈毅看到桌子上放着一叠布告。布告旁边正好有张毛边纸，砚台上还留着墨，顿时来了诗兴，挥毫泼墨，写下两句诗：

且遣李郎招旧部，
重阳决策下福州。

写罢，陈毅把笔架在砚台上，伸了伸腰，对着墨迹做自我欣赏状，并问李任予：“怎么样？”

“好诗，好诗。”李任予称赞说，但他觉得两句似不成诗，便笑着对陈毅说，“再写两句嘛，为什么不凑成一首七绝呢？”

“要凑成七绝诗嘛，就最好请你去凑啰！重要的问题是需要你把这项工作做好。”陈毅一边说，一边在布告上一拍，转身就走了。

李任予心领神会，脸上露出了一丝微笑。可在场的其他人是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政治部宣传科长吴仁声试探着问：“我们搞不懂刚才陈毅同志在布告上那一拍是什么意思？”

“噢，就是他留下的第一句诗，‘且遣李郎招旧部’。”李任予解释说，“我们眼前面对的是国民党蒋光鼐部。大革命时期国共合作，我曾和他在一起共过事，他的部下有很多都是我当年的部属。你们知道我现在叫李力一，而在大革命时期，我的名字叫李任予，这些布告上的李任予，就是我当年与蒋光鼐共事时的名字，陈毅同志是想用我的名字去影响蒋部，把他们拉过来，这就是‘且遣李郎招旧部’的实

质含义。”

吴仁声等人恍然大悟：陈毅棋高一筹啊！

陈毅，字仲弘。他 1901 年 8 月 26 日出生于四川省乐至县，1972 年 1 月 6 日在北京逝世。他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政治家、中国人民解放军创建人和领导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大元帅之一。他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上海市人民政府首任市长。

11 月 2 日，李任予与朱德、陈毅一起率领红四军撤离梅县，经江西的寻乌至武平到上杭、长汀。11 月 18 日，陈毅在上杭官庄向红四军前委传达了中央“九月来信”和周恩来的口头指示，把毛泽东请回红四军前委主持工作。到达长汀后，毛泽东被安排与朱德一起住在辛耕别墅，红四军前委机关、军部也都设在这里，而军政治部则设在县学宫。

毛泽东历来重视深入基层走访调查，以此获得第一手的信息资料。毛泽东重新回到红四军主持工作后，李任予积极协助毛泽东开展社会调查和群众工作。1929 年 11 月一天上午，毛泽东独自一人步行来到县学宫的红四军政治部驻地，走到大门口就大声问：“李主任在家吗？”

值班的政治部宣传科吴仁声等两位同志正在院子里摆棋对弈，听到喊声，立即放下手中的棋子站起来，跑到大门口，但他们都不认识眼前的人是毛泽东，只是礼貌地回答说：“他出去办事了，同志，你进来坐一会，喝点开水，他可能就快回来了。”

“不坐了，回头再找他。”毛泽东点了点头，转身到别的地方去了。

过了不久，李任予回来了，一进门就用手指着吴仁声，笑着说：“仁声同志哟，你真是有眼不识泰山。”

吴仁声糊涂了，问是怎么回事。李任予说：“刚才来找我的是毛委员。我回来的时候在路上遇到他，他跟我说，你们不认识他，还背了两句古诗：‘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你说你们是不是有眼不识泰山？”

吴仁声是1929年中秋节以后即红四军打下上杭城后才入伍的，那时毛泽东还在苏家坡等地指导中共闽西特委工作，互相没有见过面，如今相见不相识，吴仁声为刚才没有称呼毛委员而自责。

李任予安慰他说：“也难怪你们，刚入伍嘛。明天要开群众大会，毛委员要来讲。会场就在我们前面的空地上，搭个台子，你们去布置一下。”

吴仁声欣然领命，连蹦带跳地找人一起去布置会场了。

第二天上午8时许，毛泽东独自一个人又来到政治部。李任予提醒说：“毛委员，你这样一个人独来独往不安全，还是派一个警卫员吧。”

“不，我这样不会出乱子的，有人跟着，反倒觉得不方便，不自在。”毛泽东婉言谢绝了李任予的好意。

这一回，吴仁声热情地叫他“毛委员”。毛泽东幽默地说：“小同志，以后你就不会‘笑问客从何处来’了吧？”

李任予陪同毛泽东一起走上了刚搭起来的简易台子。台前站满了

红四军宣传人员事先动员前来的老百姓。李任予先作了开场白，并把毛泽东向大家作了介绍。毛泽东接着开始发表演说：“你们长汀是个好地方，可你们的日子并不见得过得多好嘛，为什么？因为有人在你们头上压迫剥削。郭凤鸣、卢新铭凭什么来压迫剥削你们呢？很简单，因为他们有枪杆子，有反动政权。如果我们有了武装，又有了政权，我们人多势大，反过来镇压他们，他们就不敢作鬼作怪，作威作福了。你们说是吗？你们看现在，郭凤鸣被我们杀了，卢新铭被我们赶跑了，但还会有郭凤鸣第二，卢新铭第二，第三，第四，所以，革命不能单靠我们红军，要靠乡亲们自己团结起来，组织武装，建立政权，打土豪，分田地，跟反动派斗到底！”长汀是客家人聚集的地方，毛泽东的湖南口音很重，来听演说的群众听不太清楚，好在李任予是广东人，操一口标准的客家话，长汀的客家话与广东客家话相近。于是，李任予临时当起了毛泽东的翻译，用客家话把毛泽东的话复述了一遍，群众听了很亲切，在亲切的气氛中得到了革命的启蒙。

毛泽东，字润之。1893年12月26日出生于湖南湘潭韶山冲一个农民家庭，1976年9月9日在北京逝世。他是中国人民的领袖、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诗人、书法家。他曾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时代杂志将他评为20世纪最具影响100个人物之一。

自 10 月中旬至 11 月下旬，闽西革命根据地尽管遭到敌人不断进攻，但由于有毛泽东和闽西特委的正确领导，有根据地军民坚持不懈的战斗，革命根据地才能日益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到 1929 年 11 月底，闽西红色区域迅速发展，建立了 4 个县 50 多个区 400 多个乡苏维埃政权，约 80 万贫苦农民分到了土地。工农武装也得到迅速发展，从 3 月间的 800 多支枪发展到 5000 多支枪，赤卫队员扩编到 6000 余人。党和各种群团组织也不断发展，已有工会会员近万人，全体农民加入农会，党员计 7800 余人。红色区域扩大到龙岩、永定、上杭、长汀、武平、连城等 6 个县，纵横 300 多公里。呈现出一派“战地黄花分外香”，“寥廓江天万里霜”的大好景象。闽西革命根据地的保存、发展和巩固，为古田会议在闽西境内顺利召开提供了可靠的保证。

三、创办第一张军报《浪花》

红军正式出版的第一份军报，是红四军在闽西创办的《浪花》。

红四军入闽后，为了配合红四军出击闽中的战略，全面实现红四军前委在闽西六县的游击计划，广泛宣传党和红军的政策，扩大政治影响，李任予决定创办军报作为宣传工具和政治喉舌。这个任务交给了毛钟鸣和毛铭新印刷所。

长汀毛铭新印刷所创办于 1921 年春。毛钟鸣在大革命时期曾在武汉任国民党中央联席会秘书处干事。大革命失败后，毛钟鸣牢记老革命家吴玉章的教诲：“印刷所对革命很重要，列宁在国外进行革命斗争时，常因没有印刷所而苦恼。你们要设法把这个印刷所办下去，

以应将来革命的需要”。毛钟鸣回到毛铭新印刷所，学了一手精湛的印刷技术，并成为我党在该印刷所的实际领导人。南昌起义部队到达汀州时，毛铭新印刷所已经拥有三台石印机、两台圆盘机和四架平台机，铅印、石印都有，在闽西一带颇有名气。1929年春，红四军首次入闽，毛泽东驻汀期间，非常重视宣传队印刷工作，曾在辛耕别墅热情地接见毛钟鸣，详细询问印刷工人情况和毛铭新印刷所设备情况。

毛钟鸣接到李任予交办的任务后，决定采用玉扣纸，因其纸质薄，用浆糊粘贴在粉墙上不易撕毁；采用铅印技术，因为铅印的刊物尽管费时，但是不像油印会渗油而变得模糊，而且易于保存。

在《浪花》创刊号上，赫然写着发行时间：1929年7月27日。设有“发刊词”、“特讯”、“短评”等栏目。在《浪花》创刊号上，发刊词阐明该报的宗旨是“唤起被压迫阶级和弱者，去踏死那些为非作歹的败类——国民党反动派”，“效力于它的主人——被压迫阶级”。同时，《浪花》创刊号用漫画的形式惟妙惟肖地表现了国民党匪军惊恐万状的情形，热情地宣传红四军入闽攻克汀州，直取龙岩、永定、上杭，歼灭军阀郭凤鸣、陈国辉的战绩，以及闽西各地举行工农暴动，组织工会、农会、赤卫队、暴动队，创建和发展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大好形势，号召贫苦工农积极行动起来打土豪、分田地，推翻封建剥削制度。创刊号还刊载了龙岩县革命委员会制定的条例和分田标准等土地革命的有关政策。

红四军《浪花》报的创办，成为中国工农红军创办最早的第一张

铅印的军报，在党的新闻报刊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现在古田会议纪念馆收藏陈列的《浪花》（创刊号），是1994年在福建漳平县双洋镇观音亭的内墙上发现的。这张用闽西特有的玉扣纸印刷的《浪花》报，经受了战火的洗礼和岁月的沧桑，虽早已斑驳不堪，却仍然与土墙牢牢地粘在一起难以剥离，只好把报纸和土墙一起切割下来，将这个重达200多公斤的“大家伙”运回纪念馆，用玻璃罩起来，放在展室内永久保存。经福建省文物专家鉴定，把这张独一无二的红军珍贵文献报纸列为国家二级文物。

四、古田会议组织者之一

红四军党的七大后，陈毅赴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在红四军党的七大结束时，前委即将大会决议及其他有关文件上报中共中央。中央收到红四军七大文件后，立即觉察到红四军领导层分歧的严重性。8月13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专门讨论红四军问题，决定由周恩来代表中央起草一封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即八月来信）。8月20日，指示信写成并发出。信中对红四军党内争论的几个主要的原则问题提出明确意见，明显地赞同毛泽东的观点。8月下旬，陈毅到达上海。8月29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听取陈毅关于红四军全面情况的详细汇报，并决定组成李立三、周恩来、陈毅三人委员会，由周恩来召集，负责起草对红四军工作的指示文件。9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即九月来信）。这封指示信是陈毅按照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和周恩来、李立三的多次谈话要点代中央

起草并经周恩来审定的。九月来信肯定了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确认中国革命是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红军的基本任务是实行土地革命，开展游击战争；明确规定红军由前委指挥，并将党代表改为政治委员，其职责是监督军队行政事务、巩固政治领导、部署命令等；要求红四军官兵维护朱德、毛泽东领导，明确指出毛泽东仍为前委书记。

1929年10月，陈毅肩负着中共中央的重托从上海乘船至香港，22日到达广东松源，遇到了正在出击东江的红四军部队。当夜，陈毅主持召开了红四军前委会议，传达了中央指示精神，并转达了周恩来的指示。

11月2日，红军撤离梅县，经江西寻乌至武平到上杭、长汀。11月18日，红四军前委在上杭官庄召开会议，再次传达了中央“九月来信”和周恩来的口头指示，这对红军指战员尤其是领导干部起了很大的教育和鼓舞作用。朱德表示坚决执行中央的指示，欢迎毛泽东回前委工作。朱德对陈毅说：“过去的那些我收回，我们请他回来。”前委决定由陈毅去蛟洋请毛泽东回前委工作。于是，陈毅派人到苏家坡，将中央“九月来信”送交毛泽东。并向他传达了周恩来代表中央所作的口头指示，催促他速回红四军主持前委工作。11月26日，毛泽东接到陈毅和中央“九月来信”指示，读后百感交集，自言自语地说，中共中央对红四军党内争论问题终于作出了正确的裁决。随后，他在中共福建省委巡视员、组织部长谢汉秋陪同下心情舒畅从上坑蛟洋抵达汀州，重新担任红四军前委书记。陈毅也诚恳地向毛泽东当面

作了检讨。

毛泽东回到红四军领导岗位是从苏家坡经蛟洋回长汀。11月28日毛泽东回到长汀时，李任予去迎接他，同时还让他给红四军官兵讲课，发表演说，鼓励广大官兵要积极上进。毛泽东回到长汀后主持召开了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讨论和研究如何贯彻中央“九月来信”的精神，决定对红军部队进行政治军事整训和召开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

在这个历史转折时期，李任予为红军部队建设和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

12月3日，红四军第一、第二、第三纵队从长汀开赴连城新泉与第四纵队会合，开展了著名的“新泉整训”。新泉整训包括政治整训和军事整训。朱德负责军事整训，毛泽东和陈毅负责政治整训。毛泽东、朱德、陈毅、李任予一起居住在望云草室。望云草室原是清代咸丰年间的书院，为一厅四室的砖木结构小平房。室内有后厅和天井，三合土地面，进深15.5米，面积163平方米。

新泉整训期间，李任予协助毛泽东、陈毅主持政治整训工作。为了了解部队的真实情况，李任予与毛泽东、陈毅冒着严寒深入红军各连队召开座谈会，与到会同志展开讨论。大家无拘无束的畅所欲言。朱德则主持举办基层军事干部训练班，在全军开展军事技术、战术的训练。并主持制订红军的各种条例法令，从而提高了红军指战员的军事知识和技术水平。

政治整训的目的主要是让指战员明确红军的性质和任务，自觉克

服非无产阶级思想，纠正军阀作风。主要做了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第一，举行各种调查会。开展调查研究，摸清部队官兵思想问题，为纠正非无产阶级思想做准备。毛泽东为了更全面准确地掌握和了解红四军中存在的各种非无产阶级错误思想的表现危害及其根源，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深入调查。为了了解部队的真实情况，采用“请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的办法，调查部队和党内存在的各种问题，和大家共同研究这些问题产生的根源和解决的办法；毛泽东在当时的所居处望云草室主持了许多次调查会，每次的调查会都有各纵队、支队、大队的负责同志以及连队的支部书记和一些士兵 10 多人。每次会议的人员都有所变化。调查会上，毛泽东亲自发问、亲自作记录。并同与会者一起探讨红四军中存在的问题，分析产生问题的原因，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毛泽东把这种调查方法称之为“请进来”。李任予与毛泽东、陈毅一起召集由红四军党内各级党组织的书记、组织委员、宣传委员参加的联席会议，对部队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广泛深入的调查。此外，毛泽东多次深入连队，召开士兵调查会，了解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在红四军中的表现。毛泽东还深入农村，甚至步行到离新泉五里外的官庄，召开农民座谈会，收集农民对红军的意见和要求。毛泽东把这种调查方法称之为“走出去”。通过调查研究，毛泽东进一步摸清了红四军内存在的问题，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鲜活的第一手资料。

第二，开展思想教育和政治建设，为提高官兵、军民的思想觉悟做了大量工作。在整训期间，毛泽东强调红军党内教育的重要性和迫

切性。他把思想政治工作娴熟地结合于各种调查会中，有条不紊成效显著。

第三，加强组织纪律和制度建设，为打造新型人民军队提供纪律保障。李任予还协助毛泽东起草了红四军党的九大决议草案。今天，在望云草室的厅堂旧址的石灰墙壁上还保留着“军事政治训练”、“加强少先队”等红军标语。当年毛泽东、朱德、陈毅、李任予卧室内各种物件仍按原样陈列，保存完好，它是当年红军新泉整训的历史见证。

12月17日，李任予与毛泽东、朱德、陈毅率红四军从新泉进驻上杭古田；一方面继续进行军事政治训练，另一方面继续为召开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作思想和组织上的准备。李任予与毛泽东、陈毅一起居住在红四军前委机关及政治部驻地古田的八甲村松荫堂。

八甲村松荫堂建于清嘉庆12年（1807年）。在八甲村松荫堂，标注着前红四军前委机关及政治部旧址上，至今还保留李任予卧室。它是当年李任予与毛泽东、陈毅在一起工作和生活过的历史见证。

12月18日，李任予协助毛泽东在司令部驻地主持召开纵队、支队、部分大队的党代表和支队以上书记、组织委员以及宣传委员联席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报告。他首先讲了这次会议的意义，是为了彻底肃清存在于红四军党内的各种不正确倾向，使红军建设成为一支真正的人民军队。他列举了很多例子，指出红四军内存在着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念、绝对平均主义、打骂士兵现象和枪毙逃兵的军阀主义残余思想等等不良倾向，号召到会同志们充分发表意见。针对红军中存在的问题，会议分小组进行了专题研究，如有的

小组讨论废止肉刑问题，有的小组讨论党的组织问题，有的小组讨论红军宣传工作问题等。由于充分发扬民主，大家都能够畅所欲言。各级党代表大胆地尖锐地揭露了党内军内存在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表现，追溯了各种错误思想产生的危害根源以及克服的办法等。由于每个人的认识不同，会上经常发生不同意见的争论，大家既能够敞开思想各抒己见，又能够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因而会议期间大家的心情是轻松舒畅的，气氛是和睦团结的。这次联席会议共开了 10 多天，各个专题小组的讨论情况都留有文字记录。不仅为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召开作好了充分准备，同时也为古田决议起草工作提供了丰富的材料。

经过 10 多天的整顿，红四军广大官兵的军事素质和政治思想水平得到很大提高。大家初步认识到非无产阶级思想对红四军的危害，认识到纠正红军党内非无产阶级思想对于军队建设乃至中国革命的重要性，从而使全军官兵的思想达到初步统一。因此，新泉整训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为古田会议的成功召开铺平了道路，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和组织上的准备工作。

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确定在古田召开，有其地理的因素和历史的必然性。古田镇位于福建省上杭县东北梅花山南麓，处在龙岩、连城、上杭三县交界处，从地理上看，古田镇坐落于一个高山上的盆地；它东有彩眉岭，西有将军山，西南有双髻山。北有梅花山，南有气势雄伟的吊钟岩，地形十分险要。历来是屯兵的好地方，非常有利于军事上的防守和安全上的保密性。

从政治上看，自从 1928 年闽西的龙岩后田、上杭蛟洋、平和、永定四大暴动以来，古田的农民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特别是红四军入闽近一年来的艰苦斗争，古田已成为闽西红色区域的中心地带，中共闽西特委机关就驻在离此不远的苏家坡村。古田的群众基础较好，有充足的粮草供应红军战备的需要。当时，红四军的许多后方机关都驻在古田蛟洋一带。

再从军事形势上看，红四军于 10 月下旬出击广东东江，攻打梅县后，国民党蒋介石就开始筹划第二次闽粤赣三省军事会剿，妄图一举扑灭闽西红色区域的革命火焰！因此在古田这个相对安全的盆地中召开会议就比较适当了。同时，红四军驻扎在古田还便于伺机攻打龙岩，实现向东发展的战略目标。

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毛泽东根据中央“九月来信”精神，结合红军创建两年多来的实践经验，为大会起草了决议方案。

1929 年 12 月 28 日至 29 日，毛泽东在上杭县古田曙光小学（原为廖氏宗祠）亲自主持召开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即古田会议），李任予作为 120 名代表之一参加了大会。

曙光小学原是一座祠堂，称为万源祠。始建于 1848 年，为古田第一大姓氏廖氏所建，故称为廖氏宗祠。辛亥革命后，万源祠改为古田历史上第一所小学——和平小学。1929 年 5 月，红四军首次进驻古田，在此开展土地革命斗争，红军战士根据《少年先锋队歌》歌词“走上前去啊，曙光在前 …… ”把和平小学改名为曙光小学。

古田会议的会场正面墙壁上挂着“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

代表大会”会标、中国共产党党旗和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马克思列宁的画像。会场内四根红柱上张贴着“中国共产党万岁”、“反对机会主义”、“反对盲动主义”、“反对冒险主义”等标语。

为了集中精力开好会议，毛泽东、朱德、陈毅和李任予等人专门在会场设了临时的办公室，连中午也不回离会场只有一公里远的住地——八甲“松荫堂”和“中兴堂”，而是留在会场找代表谈话了解情况，共同批阅修改会议文件。

红四军党的九大与先后在龙岩、上杭召开的红四军七大、八大的气氛截然不同，大家精诚团结，踊跃发言，气氛热烈。

大会秘书长陈毅被大家公推为执行主席。他站在主席台的方桌前，双手按在桌上，望着台下拥挤的代表们都已找到座位坐下来后，示意大家安静下来。他高声说：“同志们，我们开会了。”陈毅把尾声拉得很长，但还是让代表们感觉到他的激动。的确，时过境迁，今非昔比，陈毅有幸主持全新意义上的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他能不激动吗？

与主持红四军党的七大的风格相比，陈毅这次主持九大显然自信了许多。他大声说：“各位到会的代表同志们，我们红四军在今天召开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最重要的是为着克服目前本军党内所发生的一切不良倾向，再者希求各位代表应积极地发扬我们党内的民主精神，用自己的布尔什维克自我批评的精神来检讨本军党内所发生的一切不良倾向，本主席对各位代表有下面几个要求：一、应严守大会的规定。二、应积极地发扬我们党内的民主精神和布尔什维克的自我批

评精神。三、应积极地不客气地将党内一切不良倾向作一合情的清算和斗争。四、应积极地来发表、讨论我党今后的工作。”

陈毅作过开场白后，便请毛泽东和朱德先说几句。陈毅自然是想把红四军党的九大真正开成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毛泽东首先上台作了会议动员。他说：“各位代表同志们，刚才大会主席陈毅同志已经报告了我们今天大会的意义和任务，此次大会的任务是为了提高红四军的战斗力量，同时也是为了克服我们红四军党内所发生的一些不良倾向，并要求大会决定我们红四军党内在今后的一切工作及奋斗的方针，我个人是非常赞同的。我在这里要先预祝大会胜利成功。”

军长朱德致词：“同志们，我们红四军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召开以后，到现在不知不觉又有两个半月的光景了，的确在这两个半月的过程中，在党的正确路线领导下，基本上是执行好了各项任务，当然不可否认也发生了许多错误，一些错误甚至是严重的，我想对这些错误，各位代表同志应积极地发表讨论，有必要与它作无情的斗争。”

军政治部主任李任予致词说：“各位代表同志们，今天的九次代表大会的召开是有它特别重要的双重意义的，我想除开有大会主席及毛书记和朱军长的明言之外，我们还应着重强调每个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对革命道德的服从，加强党团员的思想意识的锻炼是最重要的，所以要特别要求大会能号召全军的党员团员应以身作则地成为模范。”

李任予的这些话，对当时红军的建设、红军中党的建设、红军中团的建设，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等到红四军的几个主要领导都祝过词后，陈毅传达了中央“九月

来信”精神和中共中央关于反对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决定，并作了关于废止肉刑和反对枪毙逃兵问题的报告。

毛泽东作了政治报告《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的报告，还有多次讲话不仅谈到红军和苏区，还谈到国内局势和当时所了解的国际形势。毛泽东的讲话和报告内容丰富具体生动，深入浅出，说理透彻，代表们深受感染，受到极大的教育。

朱德作军事报告，从红军建军一直谈到目前。与会代表热烈讨论了中央“九月来信”和会议的各种报告，共同总结了党和红军建设的各种经验教训，统一了思想认识，一致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即“古田会议决议”），还通过了《废止枪毙逃兵决议案》、《接受中央指示决议案》、《拥护〈中央反对机会主义及托洛茨基主义反对派的决议〉的决议》、《士兵决议案》等项决议。

会上，李任予被选为红四军前敌委员会委员。前委委员有毛泽东、朱德、陈毅、李任予、黄益善、罗荣恒、林彪、伍中豪、谭震林、宋裕和、田柱祥等 11 人，杨岳彬、熊寿祺、李长寿 3 人为前委候补委员，毛泽东为前委书记。前委秘书长为黄益善，前委办公室秘书冯文彬。前委之下不设红四军军委。在前委委员中，李任予位列毛泽东、朱德、陈毅之后，成为红四军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这次大会，由于中共中央（主要是周恩来）的正确领导和红四军前委（主要是毛泽东）在会前作了充分的调查研究和准备工作，各方面条件成熟，所以，只开两天就圆满地结束了。它是一次坚持在马列

主义基础上的团结、胜利的大会，它不仅是红四军史上而且是中共建党和建军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古田会议的选举实行科学化，“一洗以前的痼习”主要是机械分配。“以前对委员成分常规定官长士兵为比例，认为是在培养士兵干部，现在也纠正了”。“以前不由指导机关提出名单，任由大会普选实行分配，现在是以整个党为单位，也纠正了从前的错误”。

新任前委委员和候补委员中至少 5 人是新担任的，是以“政治观念正确，工作积极，有斗争历史”等 3 项提拔条件为基础加以考察任用的。他们如黄益善、罗荣桓、宋裕和（湘南农民）、李长寿（独立团老兵）、田桂祥（湘南农民），这“5 位同志皆系做下层工作，以观念正确、斗争积极，经前委介绍而当选”。

大浪淘沙，在新任前委班子成员中，大部分都成长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栋梁之才。毛泽东是一代伟人，功高位显，可与日月同辉。朱德、陈毅、罗荣桓、林彪等人战功赫赫，名垂青史。1955 年，新中国第一次实行军衔制，在评定十大元帅光荣榜上，当年的红四军前委委员就占了 40%之多。

古田会议期间任红四军第一纵队二支队党代表的粟裕名列新中国十大将之榜首，曾任红四军前委秘书的谭政和时任红四军第四纵队参谋的罗瑞卿也成了共和国的大将军。

时任红四军第一纵队参谋长的萧克、第二纵队十二大队党代表赖传珠、红四军第三纵队副大队长陈士榘、红四军军部副官长杨志成、第一纵队辎重队队长赵尔陆、第三纵队七支队党代表朱良才、第三纵队

九支队支队长张宗逊、第三纵队政治部组织科长、士兵委员会党代表邓华、第三纵队八支队二十五大队副大队长郭天民等人成为开国上将。

时任红四军第二纵队参谋长郭化若、第二纵队四支队支队长毕占云、第三纵队部副官赖毅、第二纵队四支队十一大队大队长韩伟、红四军军部参谋聂鹤亭、第一纵队政治部秘书欧阳毅、第三纵队副官长张令杉、第三纵队七支队副支队长杨梅生、第三纵队八大队宣传队长王紫峰等人于 1955 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时任红四军第二纵队卫生队队长兼党代表叶青山、当时还只是红四军司号员参加保卫古田会议的俞炳辉等多人也于 1955 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谭震林、张鼎丞、康克清等许多古田会议的参加者则成长为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功勋卓著，名垂史册。

“古田会议决议”的中心思想是用无产阶级思想进行军队和党的建设。古田会议对党和军队的建设具有重大意义，它总结了自南昌起义以来红军的建军经验，划清了红军与旧式军队的界限，解决了如何把以农民和小资产阶级为主要成分的军队，建设成为无产阶级革命军队的问题。古田会议确定的建军原则，成为人民军队建设的伟大纲领，它不仅在红四军中实行，而且其他各部红军也按此执行，一项新型人民军队建设纲领从古田产生，由一支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军队所改造成的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从古田走了出来，成为一支无坚不摧、无往不胜的人民军队。

古田群众对红四军的再次到来，像见到久别的亲人，端茶送水，倾诉别情。他们纷纷腾出自家的房屋供部队居住，使部队指战员像回到自己的家乡。红四军进驻古田期间，官兵与乡民交往日密，感情益深。官兵帮忙百姓干活，群众更加热爱红军。古田地方党组织、赤卫队与群众一齐动员起来，配合红军站岗放哨，侦察敌情，使红四军在敌情紧迫中顺利地开完了具有历史意义的第九次代表大会。

1930年元旦，军民在曙光小学侧畔开阔的山坡上，举行了盛大的联欢会。舞龙灯、打船灯、演话剧、武术表演等文体活动丰富多彩，呈现出根据地一派军民团结的动人景象。十几年后，朱德在延安回顾这段历史情景时还激动不已地说：“那年收成很好，把地主赶跑以后分了田，农民不但够吃，还有余粮供给军队。他们成千上万地涌向了古田地区，人人带着铺盖和一星期的粮食，每到一处都给我们送礼。他们带来大批白米，还有鸡鸭，甚至还赶来猪呀、牛呀，让我们过年时吃顿好的……我们的队伍和老百姓一块做饭，一块儿吃，到了晚上，满街响起了锣鼓声、爆竹声，歌声四起。在几千只新灯的照耀下，彩龙飞舞，农民们一边游行、一边歌唱。呈现出一派军民渔水情的景象。李任予作为红四军政治部主任对红四军党的建设，对红四军中的思想建设，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五、用古田会议精神加强部队建设

古田会议后，李任予按照会议精神，认真整顿军队纪律，纠正错误思想，端正党的作风，为粉碎国民党军的“围剿”，率领部队转战

闽赣地区。

红四军离开井冈山根据地后，两度入闽，在闽西地方党组织、革命武装的密切配合以及广大工农群众的积极支援下，经过近一年的艰苦作战，开辟了以上杭、永定、龙岩为中心的闽西革命根据地，并在战斗中壮大了自己的力量。红四军在闽西以及在赣南的接连胜利，为进一步发展革命战争，实现以游击战为主向运动战为主的战略转变创造了条件，为以后形成中央苏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古田会议期间，蒋介石策划了闽粤赣三省军队“围剿”闽西革命根据地的计划。

1930年1月3日，为打破国民党军第二次三省“会剿”，实现争取江西的计划，毛泽东、朱德、李任予率领红四军从上杭古田出发，经连城、清流、归化、宁化县境，而后转战于赣西南，胜利打破了闽粤赣国民党军发动的第二次三省“会剿”，进一步沟通和密切了闽西与赣西南革命根据地的联系。

2月6日至9日，李任予在江西吉安县陂头参加了毛泽东主持召开的红四军前委和红五军、红六军军委及赣西、赣南特委联席会议（即二七会议）。会议听取了毛泽东关于政治形势和今后任务的详细报告，会议确定党和红军的当前任务是深入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政权和发展工农武装。会议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决定成立既领导赣西南、闽西、东江革命根据地党组织、苏维埃政府和地方红军，又指挥主力红军第四、第五、第六军的“前委”，前委委员由红四、五、六军和赣西南、闽西、东江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党政军领导人组成，毛泽东为前委书记。

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前委领导机关的成立，不但加强了闽粤赣边区党和红军的斗争联系及统一领导，而且为以后闽粤赣边区大规模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形成提供了组织上的保证。也成为当时闽粤赣边区各革命根据地的党政军最高领导机关。

2月7日，红四军重新成立中共红四军军委，朱德、潘心源、林彪、李任予、伍中豪、熊寿祺、罗荣桓为委员。

二七会议后，红四军和红六军一部协同作战，于2月24日、26日在吉安县水南、施家边全歼国民党独立第十五旅唐云山部近3000人，极大地震动了闽粤赣3省敌人。随后，红四、五、六军又进行了以歼灭国民党军有生力量和贯通闽粤赣边区各革命根据地为目的的大规模分兵游击活动。

4月下旬，毛泽东等率领红四军第一纵队从会昌县筠门岭进入寻乌县境内，先是消灭澄江的地主武装，接着于5月2日进占寻乌县城。在江西会昌筠门岭，红四军政治部主任李任予签署发布了《宣传员工作大纲》，作为政治部贯彻“古田会议决议”的重要实施意见，强调红军每到一地都要重视社会调查，有的放矢地开展宣传鼓动工作。6月5日，红四军政治部制定并发布了《红四军各级政治纲领》，明确规定了全军各级政治工作纲领，政治工作的基本原则，对红军军事系统与政治系统的关系作了规定。

1930年5月，爆发了空前规模的国民党蒋介石、阎锡山、冯玉祥军阀的中原大战。战火燃遍中原，南方各省的国民党各派军阀也纷纷调入中原互相厮杀，福建的地方军阀张贞、卢兴邦、刘和鼎之间竞相火

并，争权夺利。整个时局更加有利于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发展。

6月，乘蒋、冯、阎中原大战之机，毛泽东和朱德依照前委《通告》中关于3个月分兵最后会师闽西的计划，率领红四军从寻乌等地出发，沿赣粤边境北进闽西武平县境内，接连攻克武所、东留、下坝、中赤、岩前和武平县城。6月4日，红四军政治部发布《告武平劳苦群众》，提出红四军在武平要做好分田废债、取消苛捐杂税、消灭反动势力、组织赤卫队、巩固红色政权等项重要工作。红四军完成在武平的分兵任务之后，即由武平东进上杭，于6月7日在官庄、回龙突破国民党周志群旅的汀江防线并打败该旅，一鼓攻占汀江之滨的上杭县城。随后，红四军从上杭转兵北进长汀县境内，于6月中旬进驻汀州。此时，红四军全部和红六军一部，胜利会师于汀州，圆满结束了在闽粤赣边区3个月的大规模分兵游击活动。

第四章 留守闽西 扩大和巩固闽西苏区

一、任红二十一军政治委员

6月12日至22日，李任予参加了毛泽东、朱德在长汀县南阳龙田书院（今属上杭县）主持召开的红四军前委和闽西特委联席会议（即“南阳会议”），总结了闽西土地革命的成功经验，提出了“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分田办法。并通过了《富农问题》和《流氓问题》两个决议案。6月19日，“南阳会议”移至汀州，在长汀县城继续召开（即“汀州会议”）。中央代表涂振农在汀州会议上传达了中央《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会议决定将红四军、红三军、红十二军第二及第三纵队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路军（后改称第一军团），朱德任军团长、毛泽东任军团政治委员。

6月23日，红四军第四纵队与红十二军第一纵队在龙岩县城合编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一军，李任予任政治委员、军委书记，胡少海任军长。李任予同时还兼任中国红军军官学校第一分校（闽西红军学校）校务委员、校政治部主任。

1930年春夏，经过古田会议精神的学习与贯彻，粤赣闽边区各革命根据地的地方工农武装普遍进行整编和扩充，相继建立了政治、军事素质都比较好的军一级地方部队。其中赣西南革命根据地先后建立了红六军、红二十军、红二十二军；闽西革命根据地先后建立了红十二军、红二十军、红二十一军；东江革命根据地建立了红十一军。

6月25日，毛泽东、朱德按中央关于《中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为

进攻南昌会师武汉通电》命令，率红一军团在福建省汀州（长汀）南寨广场誓师向江西南昌开进。李任予领导的红二十一军奉命留在闽西，担负扩大和巩固闽西革命根据地的任务，为闽西革命根据地的扩展发挥了一个革命军事家应有的作用。

李任予就任红四军政治部主任这段时间是他人生中的一个辉煌时段。他曾经得到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的信任，进入红四军的核心领导层。

7月8日至21日，中共闽西第二次代表大会在龙岩县城召开，大会接受了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提出闽西党的政治路线是“集中一切革命力量，扩大斗争到广东去，首先夺取闽粤桂三省政权，争取全国革命胜利”。会议期间改选了闽西特委，选出新的特委执委23人，郭滴人任特委书记。

中共闽西二大以后，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理论与策略在闽西苏区开始全面执行。中共福建省委军委书记王海平等人拟定了红军再次出击广东的军事计划。7月上旬，根据闽西特委的决定，李任予与军长胡少海率领红二十一军剿匪，一个月内消灭了龙岩、万安、白砂、十八乡、漳平、永福等地国民党部队、地方民团、武装土匪，进一步发展了闽西革命根据地，为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的革命理论提供了成功的经验。

不久，永福逃亡地主请来闽南有名的土匪詹方珍，率部攻占永福，李任予与胡少海率领红二十一军及地方武装分两路夹击詹方珍部。在红军的强力攻击下，詹方珍放弃永福，退守溪边大炮楼。当时红军

将士纷纷要求强攻，但红二十一军刚成立不久缺乏攻坚武器，胡少海为了减少伤亡，制止了战士们的急躁行为。就在胡少海亲自到第一线查看地形，准备制定新的攻击方案时，一阵枪弹从炮楼袭来，胡少海腹都中弹血流如注，壮烈牺牲。时年 32 岁。

胡少海，湖南省宜章县人，1898 年生于一富绅家庭，1921 年投笔从戎，先后任连长、独立营营长、团长。他 1926 年参加北伐，1928 年 1 月参加湘南起义，并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 年 2 月任工农革命军独立第三师师长。井冈山会师后，部队整编，他任红四军二十九团团长、军委委员、第二纵队司令员、第四纵队司令员，1930 年 6 月任红二十军军长，后任红二十一军军长。

胡少海牺牲后，李任予继续率领红二十一军转向连城县姑田、梅村一带游击，并在姑田帮助建立了上堡、中堡、下堡革命委员会，巩固扩大闽西革命根据地。而闽西地方红军第二十军成立后，则分散到龙岩（一纵队）、上杭（二纵队）、永定（三纵队）、连城（四纵队）、长汀（五纵队）等县游击，巩固红色区域。但是不久以后，为了执行东江发展的路线，红二十一军不得不改变原工作计划，于 8 月 5 日回师龙岩集结待命。

二、率领部队出击东江

8 月 9 日清晨，红二十一军全体将士 3000 余人集中于龙岩中山公园召开进攻东江的誓师大会，军政治委员兼军委书记李任予、参谋长邓毅刚和中共闽西特委书记郭滴人相继发表演说，进行战斗动员。

晨7时，全军出发，开始了闽西红军第二次出击东江的行动，于8月中旬进入大埔、梅县、丰顺等县境内对敌作战。

1930年8月10日，闽西《红报》对红二十一军出发东江进行了报道：

中国红军第二十一军自成立后，战斗日见雄厚，前月全部开往连城古田，梅村附近一带游击，并帮助该处工农斗争，现该处工农斗争，已渐趋蓬勃，而各股散匪，也次第相告肃清。因根据总的政治路线，夺取广东革命先胜利，遂于5日全部回岩，加以整理训练。现训练已毕，昨（9）日早5时半全军3千余人，集中龙岩公园，听候训话，约6时许由军政治委员李任予，参谋长邓毅刚训话，后有郭滴人演说，武装战士个个静听，杀敌精神更从诸革命战士面间显露，革命空气，顿时充满全岩。时约7点，始从公园出发，精神之振作，步伐之整齐，足使敌人胆破心穿，远观之，蜿蜒似长蛇，此去与东江工农力量之配合，广东政权，必不难一鼓而取得也。又当该军出发时，有龙岩工友数百余人欢送云！

中共闽西特委在执行这一任务的时候，是有所保留的。他们采取了一些必要的措施，以保证苏区后方及出击部队的安全。一是并没有把两个军的兵力全部投入出击东江，只调了红二十一军出击，而把红二十军留置于各县，消灭反动团匪巩固苏区；二是在红二十一军出发前一天，派蓝为仁带信前往中共东江特委联络。中共闽西特委在这封信中说到，闽西红军过去曾经几次向东江进攻，但由于未能深入腹地与东江革命势力会合而半途退回。“现在中国红军二十一军全部由龙

岩出发向东江发展，配合东江各种革命势力，夺取广东政权，夺取全国革命胜利。”为了配合这一行动，希望东江特委与闽西加强联络，通报东江的政治形势与交通路线，给红二十一军入粤作战以各种帮助。

红二十一军出击初期很顺利，阮山率领先头部队自永定湖雷首先出动，邓毅刚率后续部队随后。8月12日抵苦竹，13日击败忠坑民团后，直入广东境内。8月15日，先头部队向大埔县的石云、摆侯进攻，经过3小时激战击败守军警卫队，占领了石云、摆侯。8月16日，部队从大埔边境继续南下，直趋韩江下游的重镇高陂、留隍，从留隍可远眺仅七八十公里远的汕头市。

8月19日晨，后续部队从象湖出击，进攻平和县城，守城的国民党军与民团闻讯，弃城逃窜。上午8时红军顺利进入平和县城，稍事休整后，即于中午12时出城向东江推进。

中共东江特委由于事先得到了中共闽西特委关于红二十一军准备再次出击东江的计划，因此，及时发动当地群众举行暴动，配合红二十一军的行动。于8月14日发动了丰顺县嶂背等地1000多农民的武装暴动，打败国民党军警卫队，占领了田圩。接着又调动东江地方红军第五十二团等部队，攻打寨下、南溪并占领南溪，击破南溪各乡地主武装的防守，打退从梅县前往增援的3个连敌人，迫使梅县守军张大旅退守兴宁，国民党平远县长罗俊超率领民团仓惶退往闽赣边区，加筑炮楼数十座固守待援。

红二十一军继续向潮汕推进时，所面对的国民党军是很强大的。

当时，在潮汕一带驻有粤军香翰屏的1个师2个旅，还有较强的豪绅地主武装，在闽南地区驻有国民党中央军新编第一师（后改为国民党陆军第四十九师）张贞部。初战节节胜利，似乎对战局很有利，然而，实现全国总暴动和夺取闽粤桂政权的实际条件毕竟尚未成熟。这时，两广战争已和缓下来，香翰屏师已移至东江。因此，当红二十一军占领了高陂山，准备向高陂发动进攻的时候，汕头守军立刻调动揭阳和潮阳所属部队，加上香翰屏师主力一部，迅速增援高陂。国民党军大军云集，红二十一军在高陂一战受挫，欲渡韩江又未成，部队于是从高陂后撤，向闽西转移，准备在平和、南靖地区打开局面。

8月25日和9月2日，红二十一军又连续两次向平和进攻，并经平和县大小芦溪向靠近南靖边境的东槐进击，以威胁漳州。张贞立刻调杨逢年旅堵截。红二十一军在兵力和武器装备均处于绝对劣势的情况下，兵力遭受很大的损失，而后被迫回平和县境内时，在大芦溪与张贞部队发生遭遇战，由于腹背受敌夹击再次受挫。

闽西红军连续两次出击东江失利后，士气大大低落，许多指战员反对继续执行向东江发展的计划。在此情况下，红二十一军只得于9月10日前后全部撤回闽西苏区。

三、任闽西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9月中旬，中央巡视员到达闽西。在中央巡视员的指导下，刚成立不久的闽西总行委与红二十一军军委举行联席会议，讨论闽西红军两次出击东江失败原因与目前行动问题。

闽西总行委是9月上旬新成立的一个领导组织，它是根据中央7月18日召开的全国组织工作会议精神，为从组织上保证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执行，而将“党与团的组织暂时统一起来，成为一个组织系统，按照各级组织形式成立行动委员会”的。8月5日，中共福建省委召开二届四次全会讨论党团合并成立行动委员会时，省委书记罗明和团省委书记王德等提出反对意见，认为这不利于团的工作，并且不同意把闽西苏区划归南方局领导。但是鉴于中央已作出决定，会议仍不得不确定党团省委合并，组织成立福建省总行动委员会，并指示各地分别成立行动委员会。

联席会议对今后工作作出两项决议。第一，坚决执行中央关于集中一切力量进攻东江的指示，“无论如何解决，不能动摇或变更这一路线。而且应该切实的纠正过去的一切错误，加紧这一工作的布置。”但是，根据目前红军屡遭失败，士气低沉，给养服装相当困难的情况下，在策略上作些调整，第一步先攻上杭，“打几个胜仗以提高勇气，充实力量，并解决一切困难问题”。第二步再进攻漳州以扩大影响，震动潮汕。这样就更有把握地进攻东江。为保证这一计划的成功，应将闽西全部武装编入红二十一军，充实红军力量。第二，为了加强军事组织领导，统一指挥作战，决定组织革命军事委员会，由李任予（红二十一军政治委员兼军委书记）、伍中豪（原红十二军军长、拟调任红二十一军军长）、古大存（东江红十一军军长）、张鼎丞（闽西苏维埃政府主席）、郭滴人（闽西特委书记）、卢肇西（红二十一军一纵队司令员）、邓子恢（红军学校一分校政治委员）、阮啸仙（红军

学校分校校务委员会主任）、王占春（漳州游击队长）、张家记（中央军事部南方办事处代表）等 11 人为委员组成。会议指定李任予为闽西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其目的是统一闽西南和东江的红军作战指挥。

会后，李任予写了一份《红二十一军军委书记李任予给中央军部南方办事处、广东总行委的报告——进攻东江经过及最近内部情况》，委派军政治部主任陈正前往中央军部南方办事处、广东总行委汇报。

（《红二十一军军委书记李任予给中央军部南方办事处、广东总行委的报告——进攻东江经过及最近内部情况》）

中央军部南方办事处、广东总行委：

关于二十一军此次入东江经过及二十一军最近内部情形，兹派陈正同志（军委常务、军政治部主任）前来兄处报告一切。

二十一军在东江及平和（注：福建省的一个县）失败后，退回闽西时，适中央派到四军的巡视员徐报装同志由四军折回闽西总行委开联席会议时，徐同志出席指导军委与闽西总行委，过去之争论得到相当解决，对二十一军目前行动问题也有决定。前次主要决议抄录如下，供讨论：

闽西总行委、二十一军联席会议，对于斗争策略路线之决议。此次联席会议，对于过去斗争路线和策略错误和缺点，对于以后的工作布置有如下决议：

1. 过去对中央“集中进攻东江”这一政治斗争路线的指示，确实没有详细的了解和执行，主要的错误，一方面是由于地方党部的保守观念不能坚决的冲破，“集中力量进攻东江”这一策略路线的执行，始终是动摇的，不坚决的，一方面是由于红军本身的单纯军事观念，一切行动不配合群众斗争。居此之故，以此延缓妨碍这一路线的执行，在工作方面，确实受了很大的损失，值得我们十二分的注意，必须坚决的纠正过来。中央这一集中进攻的路线，很明显的是应当先向着东江这一方面发动广大的群众斗争，在斗争中猛烈地扩大革命力量，红军有计划很迅速地集中一切力量进攻东江，决不是到东江游击、到东江报名，而是要扩大革命力量，要与东江的革命力量配合开展斗争局面，以致进攻广东，以闽、粤、桂等省暴动的胜利与湘、鄂、赣等省胜利，促成全国暴动的胜利。过去对于这样的政治任务，是没有看得清楚的，只是很机械的，以很少的力量、很少的红军开到东江去，结果不但没有消灭东江的敌人，而且不堪一击的一败再败的退回闽西，更增加了东江的困难。这是过去执行中央到东江去的路线，没有看清楚到东江的政治任务，决不是说很快的进攻东江，更不是一般机会主义者所说的，以目前政治环境不够还要等待缓缓的推进等说法。恰恰相反的，全国目前整个革命高潮日益迫近当中，集中力量进攻东江是愈快愈好。因此，可以说军委过去主张很快的进攻东江是正确的，而是在策略上的运用，没有集中力量，没有配合群众斗争是错误的。

过去闽西的党在斗争的路线和策略上，确实犯了严重的保守观念的错误，如打永福、打适中，主要是在闽西以局部立场上以为打永福、

打适中才能保障闽西政权，闽西政府巩固才可以保证红军向东江发展进攻，而不知扩大红军的路线向东江进攻，比打永福、适中的影响还要大，打下汕头等重要城市，失去了一年龙岩有什么要紧？何况在政治估量上，永福、适中之敌不过残余土匪，他们的扰乱赤色区域不过是其最后之挣扎。以致保守，决没有力量来拨动闽西的局面，甚至可以说：仅仅龙岩是有数十营赤色群众的力量也不敌来接防。

2. 闽西党对于集中武装始终动摇，至今仍是各县保留一个纵队。这便是十足的保守观念的表现，以致力量分散，都被敌人各自击破。二月来不但没有向外发展赤区域，反而因此而缩小。保守自杀政策……可以证明。

3. 一切工作布置没有中心，不把进攻东江的工作当工作中心，不集中红军力量，布置上坑、永定、平和等处的工作，都是保守观念没有冲破的原因。

4. 军委方面虽然站在全国政治环境分析，坚决主张要很快的进攻东江，与此南方党保守观念斗争是正确的，但在策略上的运用，充分犯了单纯的军事观念的错误。

5. 不从斗争中去解决问题，如开到姑田去解决经济。①去解决经济（军事）筹款，简直不做发动群众斗争工作。②不配合群众力量，如进攻高陂、东江。目前闽西党的斗争策略，不管闽西群众斗争发动了没有，好像……似的。离开闽西到东江去，又没有与东江特委发生联系，对于东江群众斗争的配合更无把握，结果是单纯的军事行动。③不问主客观的力量如何，一味的向高陂进攻，也是单纯的军事冒险

的表现。这样无论如何哪一方面都是妨碍中央路线的执行。都应比较坚决的切实纠正过来。

根据上述的理由和情形，更明白中央这个集中力量进攻东江都是正确的，无论如何解决，不能动摇或变更这一路线，而且应该切实的纠正过去的一切错误。加紧这一工作的布置，以便更好的把握到这路线的任务。因此，根据目前实际情形决定：

以后的工作布置如下：

1. 在目前红军本身屡次失败，影响到逃兵多，士气沉沉，同时给养、服装无论如何都要相当的解决，决定先攻上杭，发动闽西的群众斗争。打几个胜仗，以提高勇气，充实力量，并解决一切困难问题。

2. 攻下上杭后，找一力量比较薄弱的，以政治影响比较大的地方，以向外发展。（……）如进攻漳州张贞，当有胜利的把握，一方面可以与漳州斗争相配合，一方面更可以震动潮汕而更有把握进攻东江，在不能很快向东江时，策略上可以这样改变。

3. 攻上杭攻漳州的工作中，应即将所有闽西的武装集中，一律合编二十一军，充实红军力量。

4. 加紧发动群众。杭、龙、永、平等地群众斗争，从斗争中猛烈扩大红军，扩大地方武装。

5. 以后闽西党的工作、群众工作、政治工作都应向着这一个斗争路线加紧布置工作，一切工作人员要向东江方面来。

6. 红军行动必须时刻与群众斗争相配合，加紧政治的宣传鼓动工作，反对单纯的军事行动观念。

7. 要很快的与东委、闽省委取得联系，布置漳州、汕头的暴动工作。

组织军事委员会问题：

联席会议认为，要扩大政治影响，发动广大群众斗争，集中力量进攻敌人统一指挥起见，决定组织革命军事委员会，指定李任予同志（前任红四军政治部主任，现任二十一军政治委员兼军委书记）、伍中豪（前任红四军三纵司令官、十二军军长，现可调任二十一军军长）、左权（十一军军长、东江群众领袖）、张鼎丞（前任四军纵队政治委员，现任闽西苏维埃政府主席）、卢肇西（前四军纵队政治部主任，现任二十一军一纵队司令官，闽西群众领袖）、邓子恢（前任闽西特委书记、闽西苏维埃政府主席，现任红军学校第一分校政治委员）、郭滴人（闽西特委书记、闽西群众领袖）、张家记（中央军委南方办事处代表）、王右寿（漳州军民领袖）、阮啸仙（现任红军学校第一分校校务委员会主任、东江群众领袖）等十一人为委员，并指定李任予为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二十一军这次入东江，因主观弱点太多，致失败而退回闽西，但我们绝对不因此而对任务有所泄气，我们只有失败中坚决的纠正自己的一切错误，更要加紧的充分准备主观的条件，以期很快的再入东江，配合广东革命力量，完成我们争取广东革命首先胜利，而推动全国革命高潮的任务。

陈同志来，除面谈此间一切详情外，对于东江斗争及二十一军入东江的布置，军委会有意见由陈同志面商，请详指示。

二十一军内部许多困难，望兄处设法予以解决，并同时予以二十一军工作之大的帮助，敬致布礼！

红二十一军军委书记李任予

一九三〇年九月二十一日于上杭

会议结束后，疲惫不堪的红二十一军奉命攻打强敌据守的上杭县城，虽然靠强攻硬打勉强攻进了上杭城，但遭到了团匪钟绍葵部的伏击。伤亡惨重，被迫从九州方向退往连城。为了摆脱困境，红二十一军在连城的乡村进行筹款和整顿，以解决部队给养和恢复战斗力。

10月，为加强对地方党组织的领导，在红二十一军出击东江时，红二十一军政治委员李任予兼任中共上杭县委书记。这是李任予第三次出任中共上杭县委书记。

10月1日，中共中央派赴闽西苏区的施简抵达龙岩，于10月7日在龙岩主持召开闽西总行委、红二十一军军委和闽西红军学校校委联席会议。会上，施简传达了中央的指示，鉴于闽西苏区面临的严重局面，以及根据地广大干部群众对“左”倾错误的抵制和不满，联席会议决定暂时停止执行南方局关于马上再进攻东江的指示，转向闽南发展，夺取漳州，然后再寻机出击东江。

为了集中武装力量，提高战斗力，联席会议作出两项决定。（一）以红二十军5个纵队为基础，与红二十一军合编为红十二军（称新十二军），下辖3个团，共3000余人。左权任军长（在他未到之前由贺沈洋代理军长），施简任政委，李任予任政治部主任。闽西红军学校200多学生提前毕业，充实新十二军。（二）联席会议根据7月

全国组织会议关于在红色区域成立工农革命委员会的指示，决定成立闽西工农革命委员会，施简为主席。

联席会议虽然改变了闽西的斗争策略，但是，由于当时关于纠正李立三“左”倾错误的决定尚未传达到闽西，因此不得不执行中央和南方局关于闽西红军向东江进攻的指令，认为“打漳州总是入东江，策略上的改变非路线上的取消。”

10月20日，左权奉派抵龙岩，就任红新十二军军长。11月初，红新十二军成立并经过两星期的整训之后，又被调去攻打平和，准备迂回出击东江，虽然在大芦溪打败了闽南军阀张贞的一个营，俘敌百余人。但张贞随即调来援兵，广东军阀香翰屏也增兵大埔，红新十二军乃改向永定龙潭、苦竹进攻，但均遭失利。这样，闽西红军三次迂回出击东江之战，均以失利而告终。

12月下旬，李任予离开为之战斗了3年的闽西，前往中央驻地上海，被中央派往上海、南京从事城市地下革命斗争。

李任予是闽西革命根据地的主要领导者和创建者之一。他从1928年被党派遣到闽西领导开展农民武装斗争，在闽西工作了3年，由中共闽西临时特委军事书记逐步成长为红四军主要领导人之一。这3年时间里，正是福建闽西革命根据地从创建到发展壮大和红四军壮大发展的重要时期，李任予作为中共闽西临时特委领导人之一和红四军领导人之一，为创建闽西革命根据地，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闽西革命历史博物馆、古田会议纪念馆、连城县新泉革命纪念馆等都记载了李任予在当地开展革命斗争的历史和光辉的业绩。在闽西

中央苏区这片红色的热土上，留下了李任予战斗的足迹。

第五章 到北方开展革命斗争

一、在南京、上海开展革命工作

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东北挑起了九一八事变，蒋介石采取不抵抗政策，仅一个月的时间，东北三省大好河山和3000万同胞便沦落日本铁蹄奴役之下，华北亦危在旦夕。蒋介石这一卖国投降政策和日本军国主义对东北的野蛮蹂躏，激起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一场以反蒋抗日为中心的爱国运动在全国各地广泛展开。此时正在上海、南京一带从事革命工作的李任予，目睹祖国山河破碎、人民受辱的惨状，心急如焚，他一面向各界宣传反蒋抗日，一面准备到抗日前线参加抗日斗争。

南京是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和国民党中央政府所在地，在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中心城市领导开展革命斗争对于打击国民党反动势力，配合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1931年上半年，李任予受中央的委派前往南京、上海，活动于南京、上海城乡，发展党的组织，建立工会农会等进步群众团体，秘密领导工人农民学生开展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斗争。期间，李任予在上海与武汉军校出身的女党员陈竹君（福建人）结婚。会见过好友——国民党第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光鼐，结识了国民党高级将领冯玉祥和蔡廷锴。

九一八事变后，民族矛盾激化，国民党内部抗日反蒋情绪增长。李任予抓住这一有利时机，深入活动于国民党中上阶层，广交朋友，互倾爱国衷肠，共商反蒋抗日救国之策。国民党高级将领冯玉祥主动

提议李任予组建工农群众武装，并联系好友国民党爱国将领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相助。于是李任予拿着冯玉祥的亲笔信找到在南京沪宁路布防的蔡廷锴。蔡廷锴欣然应允提供一切便利并当即预支 1000 块大洋给李任予作为组建革命武装的经费。

冯玉祥，安徽巢县（今巢湖市夏阁镇竹柯村）人，曾任陆军第十六混成旅旅长，第十一师师长，陆军检阅使。后任国民军联军总司令，参加北伐，1926 年 9 月 17 日冯在绥远五原誓师，任国民革命军联军（后改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司令。

蔡廷锴，著名抗日爱国将领，曾任国民军十九路军军长。1933 年，在共产党抗日政策的影响下，他与红军订立抗日反蒋协定，并和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等成立福建人民政府，与南京国民党政府公开决裂，逐步地转向与共产党合作的立场。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国家体委副主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

从此以后，李任予与蔡廷锴紧密联系，互通情报，在南京、上海一带秘密发展工农武装力量，为开展大规模的革命武装斗争奠定了基础。

二、恢复北平党组织活动

1931 年，由于国民党反动当局强化了白色恐怖统治，加之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北平的推行，以及一些意志薄弱者的动摇叛变，使中共河北省委、北平党组织和党的外围组织连续遭到严重的摧残和破坏，党的力量遭到严重损失，至 1931 年 9 月，北平市仅有共

产党员 76 人。在中共河北省委、北平党团组织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况下，当年 11 月中共中央派李任予到北平参加组建北方地区党组织的工作。

北平（北京）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也是一座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城市。它是揭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序幕的五四运动的策源地，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重要基地，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发祥地之一。北平同时还是一座传播着人类伟大理想和伟大文明的城市，也是一座涌动着反抗邪恶和伸张正义大潮的雄伟城市。在北平党组织遭受重创的情况下，李任予临危受命，以中央特派员身份，肩负起中央交给的重任到北平恢复整顿党组织，他化名李德山与妻子陈竹君一起来到北平参加组建北平市委。李任予任市委组织部部长，陈竹君任市委秘书长兼妇女部长。中共北平市委隶属中共河北省委。当时的中共河北省委代行原中共北方局职权。

李任予到任后，即和其他委员一道投入恢复整顿党组织，领导北平各界反蒋抗日斗争。他深入到北平大学、清华大学等校了解情况，整顿发展党的组织，建立各种抗日团体，组织领导各种抗日救亡活动。他还与其他委员根据广大人民群众抗日爱国的要求，经过缜密部署，于 12 月初，与共青团北平市委共同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群众性反蒋抗日运动，并组织了由北平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及迁入北平的东北大学等院校几千名爱国学生组成的南下请愿团和示威团，冲破国民党当局的重重禁令，乘火车南下参加由南京学生发起的“送蒋北上抗日”运动。为加强对这一运动的领导，中共北平市委专门建立了

指挥组织，并作了具体分工，李任予负责组织南下请愿团的工作。12月4日，北平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及东北大学等院校几千名爱国学生到前门火车站登上南下的火车到南京请愿，受到反动当局的阻挠，李任予率领部分学生请求国民党北平市党部及奉系军阀张学良允许乘车南下，结果又被拒绝接见。于是李任予指挥请愿学生高呼口号，冲击国民党北平市党部，砸毁了市党部的牌子。由于当局拒不发车，学生们便不顾严寒进行卧轨斗争。

12月的北平，寒风呼啸滴水成冰。为了民族的存亡，学生们顽强地坚持卧轨斗争。学生的卧轨斗争，使北平与外地交通断绝，学生的爱国行动得到北平各阶层广大爱国群众的同情和支持，各界舆论一致遣责国民党当局的做法。许多市民和商会为学生送来饼干开水，端蚨祥等商号送来成捆的毛毯供卧轨学生御寒。在学生的顽强斗争和社会舆论强大的压力之下，国民党北平当局惊恐万状，为摆脱窘境答应了请愿团南下的要求。卧轨斗争取得了胜利，12月7日请愿团几千名学生顺利登车南下。

根据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青春之歌》就是以此为历史背景，真实地展现了从九一八事变到一二九运动（12月9日）这一历史时期，以北京大学生为中心的一批爱国进步青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道路，反对封建统治，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为拯救危难中的祖国而进行顽强的不屈不挠的斗争，当时大学生们走向街头举行大游行、请愿、示威等活动的场景，真实生动地再现了青年一代爱国的知识分子走向革命的必由之路。

12月下旬，李任予在积极组织反蒋抗日斗争的同时，还经常深入到北平大学、清华大学、辅仁大学等院校，了解情况，发展党的组织，并对青年学生和工人进行革命理想教育，勉励学生党员，要好好学习，多学一些革命理论，要下工夫进行钻研。在他的帮助下，许多同志进步很快，成为革命斗争骨干。他还和大学生党员一起研究探讨马列主义。一个入党最早的学生党员陶瀛孙说：“因为我们刚接触马列主义，觉得很新鲜，所以常常提出一些问题同亚克（李任予）争论。亚克（李任予）笑着说：‘你们真够调皮！看来跟大学生打交道不容易，我还得多学点马列主义。’”李任予还给学校支部党员布置任务，在工人中发展党员。

1932年春，北平西郊建立了公共汽车场。黄包车夫们一看，说：“不行！他们建公共汽车场，我们就得失业，不能让他们建。”陶瀛孙等党员和区委书记刘瑞森酝酿，准备组织工人砸掉汽车。这时，李任予知道了，忙着找他们谈话，对他们进行了耐心教育。他说：“有了汽车，是社会的进步，黄包车夫的敌人不是汽车而是资本家。我们要努力提高工人阶级的觉悟，使他们认识到，工人之所以贫困是由于资本家的残酷剥削和压榨，而不是公共汽车。”接着同他们一起研究了斗争方法。学生党员很佩服他的才能，夸他有较高的领导水平。在他的帮助下，同志们的觉悟有了很大提高。

李任予在北平市委工作期间，由于工作积极热情，待人诚恳，对敌斗争勇敢坚定，深受党内外同志的爱戴，虽然当时年纪不大，但同志们都亲切地称呼他“老李”。

1931年9月，北平全市所属党员仅76人。李任予在市委统一领导和部署下，重点抓恢复党的组织，逐步恢复了被破坏的区委和一些基层支部。到1931年底，党的基层组织有六七十支部，党员有300多人，其中大部分是学生。李任予在北平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近郊远野到处留下了自己的足迹，为北平市党组织的恢复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1932年1月8日，日本帝国主义开始实现“南北对进”侵占中国的战略计划，在不断从东北向关内派兵挑衅的同时，在上海制造了震惊全国的一二八事变（1月28日）。国民党驻上海守军十九路军3万多将士不顾蒋介石退让撤退的命令，奋起抵抗给日本侵略军重挫，后被迫撤出上海。日军进驻吴淞、闸北一带后，日本侵华的步骤又加快了一步，北平、上海相继受到日军的威胁。在这民族命运生死关头，中国共产党内又出现了“左”倾路线，要求全党贯彻执行“革命在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的错误路线。北方的各级党组织对王明错误路线给予坚决的抵制，反遭王明等人的排斥。他们指责北方党组织搞“北方特殊论”，从而又诬蔑北方党组织存在“北方落后论”的思想，强行要中共河北省委推行“用一切力量来准备三个斗争的支流——‘工人暴动，农民暴动，军事叛乱’合成的一个巨流”战略。中共河北省委面对王明一伙的压力，一面与王明路线的推行者进行周旋，一面与国民党反动势力进行斗争，根据北方各地的实际情况，经派人去上海请示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调整各级党团组织的领导干部，有计划、有重点地开展武装暴动工作。

1932 年 4 月，中共北平市委书记顾卓新调上海工作，将市委工作交给李任予负责。

第六章 领导保定二师学潮

一、改组保属特委

1932年5月，中共河北省委为贯彻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决定在国民党统治区开展工农和士兵革命运动，以配合红军夺取反“围剿”的胜利。在这种形势下，中共河北省委将李任予调到保定任中共保属特委书记，赴保领导保定地区革命武装斗争和学生运动，改组中共保属特委。

保定是一座历史文化古城，有着2300多年的悠久历史。是北平通往华北的重要城镇，东有碧水白洋淀，西临巍巍太行山，保定与京、津呈三足鼎立的特殊位置，构成相互对应之势。是自古以来军事、政治要地，历来都是兵家必争之地，素有“北控三关，南达九省”、“北平南大门”之称。

九一八事变和上海一二八事变（1月28日）发生后，保定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反蒋抗日斗争风起云涌。国民党当局为维护其反动统治，在保定城乡实行白色恐怖，残酷镇压保定人民的革命斗争。

共产党在保定地区早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前后就建立了党的秘密组织。容城建有特别党支部，完县建有县委，易县建有冯家庄党支部，定县建有特支……保定建有特支、县委机构，辖蠡县、博野、徐水、安新、满城5个特别党支部。以保定为中心，以容城、完县、易县、蠡县、博野、高阳、徐水、安新、满城等县城为重点，辐射2万多平方公里近两千个村庄，遍布着共产党的党团组织和党团积极分

子。革命的烈火已经越烧越旺。无论是先后成立又撤销、撤销又成立的中共中央北方局，还是反反复复调整的中共顺直省委，都对保定地区党的工作始终没有放松。中共河北省委组建后，进一步加强了对保定地区党的最高组织中共保属特委的领导。从1927年开始，上级党组织曾先后派郝清玉、徐云圃、张兆丰、薄一波、贾振峰、王义顺、韩永禄、李培准、张明远、湘农、李任予（黎亚克）等前来领导和开展保定地区党的工作。保定城内以河北省立第二师范学校（简称“二师”）、河北大学、清苑师范、景仁中学、同仁中学、第二师范附小、保定铁路为主建有党团支部。从城市到农村，到1932年初，中共党员发展到近600人，共青团员3000多人。在中共河北省委和中共保属特委的领导下，保定城乡建有大大小小规模不等的工人党支部、农民党支部、学生党支部。博蠡建立党支部10个，高阳县建立党支部6个，两县共发展党员近260人。一些进步团体也相继产生，成立农民赤色工会14个，农民自卫军、反帝大同盟、社联、左联、工济会等20多个进步团体。保定二师学校因该校校长张陈卿思想反动，禁止学生阅读进步书刊，甚至限制学生的自由，不准学生参与抗日救亡的游行集会，在学校党组织领导下，举行全校大罢课，驱逐了反动校长张陈卿，由此引发了以保定二师等学校为主的学潮运动不断爆发。原中共保属特委书记贾振峰接到李任予来保的通知后，找到六中党支部书记齐庆祥，让他到车站去接新任的特委书记李任予。齐庆祥问道：“这个李任予长什么模样，有什么特征？”

贾振峰笑笑说我也没见过，据说是高高的个子，长方脸，白白的，

二十七八岁，很儒雅，象个书生。

齐庆祥点点头说，那把接头暗号告诉我。

贾振峰把省委通知的联络暗号和李任予乘坐的车厢位置告知了齐庆祥，并嘱咐他因形势吃紧，一定要小心。

齐庆祥按照贾庆峰交待的联络暗号、车厢位置、李的打扮长相，找到李任予，先把他带到省立第二师范学校，后来住进东街路南一个胡同里。这位新来的特委书记化名李之道，身穿一件灰大褂，清瘦的脸上两颗炯炯有神的眼睛，操着南方口音，思维敏捷，像个勤勉书生，给人以精明强干、老练成熟的感觉。

齐庆祥直接把李任予带到二师与贾振峰见面。寒暄过后，李任予迫不及待向贾振峰等人了解市内学生运动和各县乡村农民运动的情况。贾振峰将保定的革命斗争形势，简明扼要地向李任予作了汇报。李任予听了保定的情况后，心里又高兴又沉重，高兴的是保定有这么好的群众基础，尤其是二师的学运情况，非常令人振奋；沉重的是他感到二师有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味道，爱国学生同国民党当局的一场暴风雨般斗争不可避免。

李任予到保定时，正值保定反动当局破坏二师的爱国学生抗日救亡运动。

保定二师始建于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9月，由著名教育家严修（1860—1929）创办。校名为“保定初级师范学堂”。1909年暑假后改名为“直隶第二初级师范学堂”。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后，更名为“直隶第二师范学校”（简称“直隶二师”）。

1928年6月26日随直隶省改称河北省，学校改名为“河北省立第二师范学校”。

二师是一所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学校。

早在1923年，保定二师的师生中就有了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后来党团组织逐渐发展壮大，成为河北省中部广大地区的革命策源地。二师学生中的党、团组织成为领导保定广大地区革命运动的核心。

1931年6月初，驱逐反动校长张陈卿的学潮取得胜利，教育厅派张腾霄（又名张云鹤）以督学身份、护理吏长的名义进入二师。他思想比较开明，对二师学生的革命活动持同情和维护的态度。学生们秘密外出从事革命活动，他不限制不干涉，为学生的革命活动提供了宽松便利的优越条件。对国民党当局密谋破坏革命活动的情报，只要他事先得知都能及时转告学生骨干早作预防。每当外出活动的学生遭到军政当局逮捕时，他都积极出面保护学生。学生们通过各种关系物色到的进步教师，他也愿意帮助聘入二师任教。

张腾霄对二师进步师生的革命活动有着无言的默契。优秀的进步教员在学生中广泛传播革命思想，使二师学生的思想非常活跃。学校建立了一些公开的学术会社，如：文学研究会、社会科学研究会、音乐研究会、美术研究会、武术社、书报贩卖部（贩卖各种进步书籍和刊物）。另外还开设有业余的日文学习班、世界语学习班（张腾霄校长亲自讲授世界语）。为了团结、教育、发动年龄小的同学们投入抗日活动，在校内建立了约40余人的童子军，设大队、中队、小队。童子军的

学生身穿黄绿色童子军服，佩带白蓝色领巾，手持童子棍进行操练。通过这些组织，把大部分学生团结在党的周围。这样，在二师学生中党、团员及各进步组织的成员约占全校 300 余名学生总数的 80 %，进步力量得到空前发展。由于二师五年级九班学生贾振峰时任中共保属特委书记，他多以二师为基地组织开展各项活动，使二师成为保定革命活动的中心，被誉为北方的“小苏区”。

九一八事变后，二师的学生不断走上街头，书写抗日标语，散发抗日传单，组织抗日讲演。反动当局多次想拘捕学生，阻止抗日活动都未能得逞。1932 年 5 月，便以“二师为共匪盘踞地”为由撤换了校长，开除了进步学生，提前两个月放假，驱逐学生离校回家，妄想以此摧垮共产党组织，扑灭抗日烽火。

李任予任特委书记后，为了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北方工作会议决定，便决心大干一场。他认为南方大干了几年，建立了广大苏区，照红了半壁江山，北方也不能落后。他对特委委员说：“小打小闹动摇不了反动统治，必须搞震动大的斗争，搞大的暴动，以摧毁反动统治，扩大党的影响”。面对反动当局镇压学生革命斗争的现实，李任予分析了二师矛盾的激化情况和党团组织基础力量，针对国民党反动派破坏二师学潮斗争的情况，决定因势利导，首先在二师发动一场争取抗日救国自由，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学潮斗争。他的决定，得到了同志们的支持。

为了以二师为基地，充分发挥学生党员的作用，燃起学校革命斗争的烈火，李任予吸收二师学生党员骨干曹金月任特委组织委员，杨

鹤声任宣传委员，贾良图任秘书长。组建了新一届中共保属特委。

二、开展护校学潮斗争

新一届中共保属特委成立后，李任予主持召开了特委会议，就通知二师学生返校、校内和校外的秘密联系方式和护校斗争的口号，以及组织二师学潮后援会等各方面的工作进行了研究和部署。二师学校便成了特委活动的机关，于是一场轰轰烈烈的二师护校学潮斗争在保定展开。护校斗争开始后，保属特委委员曹金月、杨鹤声、贾良图在二师校内负责组织领导，保属特委书记李任予在校外指挥。为配合二师护校斗争，李任予组建了中共保定中心支部委员会，在保属特委的具体领导下与校内取得联系，组织人力物力支援并动员组织各校爱国学生成立二师学潮后援会，广泛宣传学潮真相，争取社会各界群众的支援等，中共保定中心支部实际上成了保属特委的办事机构。

为便于领导二师的学生运动，李任予将保属特委机关设在离二师不远的法院街小高坡上的一个小院内。他以“律师”职业为掩护，开始了在保定的战斗生涯。在当时只能以“杂合面”维持生计的艰苦条件下，李任予彻夜不眠地领导二师学潮斗争。在二师校内，二师学生坚守阵地，严阵以待。在二师校外，学潮后援会的学生在保定城乡散发传单，广泛宣传，为二师捐款捐物，并组织宣传代表团分赴北平、天津、上海等各大城市、大专学校请求声援，保定各校学生得到充分发动。二师护校斗争实际上成了全市青年学生参加的一次反蒋抗日救国的大规模的革命斗争。

1932年6月20日，保定反动当局奉国民党河北省政府的命令，调集大批军警对二师护校学生实行武装包围，断粮、断电、断柴，断绝与外界接触，企图以武装威迫学生离校。二师护校委员会在保属特委领导下，带领全体护校同学，坚持斗争，粉碎了敌人武装包围、经济封锁等阴谋，同武装的敌人对峙了半个多月。

在保定二师的护校斗争进入艰难困苦严重时刻，中共河北省委从全局出发派白坚以河北省（共青团）驻保特派员的身份来到保定。这对刚上任的中共保属特委书记李任予来说无疑是一件利好的事情，他多了一个得力的帮手，加强了特委的领导力量，更有利于指导二师学生的护校斗争。白坚是调到河北省委才认识李任予的，也仅见过几面。在国民党统治的北平从事党的地下工作，领导与领导之间，除了举行重要的会议大家才能见面外，平时的工作大都是单独接头。沉痛的教训告诉每一个从事地下活动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对组织的无比信任不等于对某一个领导人的信任。党的领导，只有党内担任职务的同志和直接与领导在一起工作的同志才知道。白坚在北平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时间长，又多次领导和参与学生运动，在阎锡山统治北平的时期，因参与组织和领导纪念“八一”南昌起义3周年活动而被敌人逮捕入狱，用刺刀捅掉牙齿，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大无畏的英雄气概。白坚的名字和白坚的事迹，同样作为搞地下党工作的李任予是知道一些情况的。当然，白坚在党内的职务，在白坚还未调中共河北省委工作之前，李任予是不清楚的。由于党内高层领导不断有人叛变，给有些地方基层党组织带来毁灭性的破坏，因而党的组织几经遭到破坏

后，掩护下来的同志，出于对党的高度负责，对任何党内的同志都保持着高度的警惕。李任予对白坚是如此。白坚对李任予也是如此。白坚的到来，意味着保定地区的斗争形势是非常严峻的。往最坏处着想，如果现有中共保属特委全部遭到敌人破坏，领导成员一个不漏地被敌人杀害，或被捕坐牢，或叛变革命投敌，那么，特派员白坚就有权行使中共河北省委授予的权力，马上重建新的中共保属特委开展工作。李任予十分明白中共保属特委眼前面临的局势，特委临时机关设在保定二师学校，已经暴露在敌人的面前。国民党保定当局动用驻军包围了保定二师学校，名义上是为学生的游行示威、“护校”斗争与政府对抗而采取的“保护”措施，实际上是针对中共保属特委借用保定二师学生“护校”斗争为掩护而进行武装暴动所搞的军事镇压行动。

1932年7月初，鉴于国民党反动派武装包围二师的严峻情况，李任予和赵天绪到北平向中共河北省委汇报二师学潮斗争情况。临走时，李任予指示齐庆祥等在校外指挥斗争的负责人说：“你们要注意一个问题，看敌人是否要对二师实行残酷镇压。要看北平和青岛大学（此时两校学生也正在闹学潮）的变化。如果北平、青岛大学被镇压了，我们要赶紧拉出来，尽量避免牺牲。”并对二师下一步斗争进行了安排。由于当时北平各校已放暑假，李任予的北平之行没有将学生充分发动起来。李任予的指示也因封锁严密未能及时传到学校。

就在李任予离开保定的第二天，1932年7月6日晨，国民党反动当局命令驻保部队十四旅旅长陈冠群对手无寸铁的二师护校学生

实行军事镇压，制造了震惊华北的七六惨案。

惨案发生后，李任予一方面组织校外党团组织和进步学生揭露反动当局的暴行，安抚受难战友的家属，另一方面向中共河北省委汇报惨案情况。中共河北省委为弘扬二师学生抗日爱国的革命斗争精神，于7月8日发出了《为保定惨案告民众书》，强烈谴责国民党反动当局残暴屠杀爱国学生的罪行，号召全省人民进一步组织起来，掀起反蒋抗日斗争更大高潮。南方苏区《红色中华报》对这一事件也及时作了报道并给予了评价。《民国日报》、《华北日报》、《导报》、《大公报》、《益世报》等全国各大报纸也多次作了报道。二师学潮斗争所产生的政治影响是深远的，在北方乃至全国均引起了巨大反响，唤醒了河北全省人民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热情，扩大了共产党的政治影响，为保定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

首先，二师护校斗争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反动统治。在斗争中，二师学生敢于斗争，威武不屈，百折不挠，连连挫败了反动当局的阴谋诡计，有力地打击了敌人的猖狂气焰，暴露了国民党当局的虚弱本质。同时护校学生通过灵活多样的宣传活动，深刻揭露了国民党当局的可耻罪行和反动本性，使国民党当局彻底暴露出其残杀人民的刽子手的真面目，从而教育了广大人民群众，使广大人民群众对国民党反动政权更加仇恨，使敌人更加孤立。

二师护校斗争鼓舞了人民群众革命精神，推动了抗日救亡运动的进一步发展。二师学潮发生在反动力量强大的保定，影响波及平、津数省。爱国学生高举抗日救国大旗，向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

进行勇猛冲击，给北方人民以极大的鼓舞，唤起了广大青年和人民群众积极投身革命洪流。护校斗争发生后，保定附近的高阳、蠡县、清苑、望都、完县、定县、唐县以及行唐、平山革命斗争蓬勃发展起来，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政权。同时对南方的武装斗争，也起到了有力的配合与支持作用。就是在二师校内，革命斗争也并未因反动派的镇压而中断。新任反动校长肖汉三，不久也被革命学生逐出了二师。二师党组织和革命师生发扬了该校的革命传统，始终坚持同国民党反动当局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

二师护校斗争使广大青年知识分子受到了锻炼和教育。学潮斗争失败后，他们并没有被敌人的恐怖政策所吓倒，而是认真地总结经验教训，坚定地走上了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他们在党的领导下，深入农村，宣传革命，发展组织，与广大农民一起积极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在河北大地上播下了革命的火种。七七事变后，他们更是战斗在抗日战争最前线，领导发动群众，创建抗日武装，成立抗日政权，成为抗日的中坚力量。

二师护校斗争，进一步扩大了共产党的政治影响。在护校斗争中，爱国学生深入宣传共产党抗日救国主张，使党的政治主张进一步为人民群众所理解、拥护。同时在斗争中，他们愤怒揭露国民党反动派投降卖国及残害人民的罪行。广大共产党员、革命青年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将生死置之度外的革命精神，也教育了广大人民群众，扩大了党的影响。二师学潮失败后，虽然敌人一再破坏，党组织却在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并继续领导保定人民同国民党反动派和日本帝国主

义，展开了不屈不挠的英勇斗争。

七六惨案发生后，整个保定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为了更加隐蔽地进行对敌斗争，李任予与在清华大学一起工作过的女学生（共产党员）陶瀛孙组成假家庭，以掩护特委机关的工作。

1932年7月下旬，陶瀛孙在校外办民校，因宣传抗日，暴露身份被特务盯上。李任予了解到这种情况，征得中共北平市委同意，便找到陶瀛孙，动员她到保属特委工作。李任予对陶瀛孙说：“你在这里工作已暴露，再继续下去恐怕不安全，保定需要你，这是组织的决定。”陶瀛孙表示服从。李任予把陶瀛孙带到在北平的家中，与爱人陈竹君（省委妇委书记）接待了她。李任予给陶瀛孙交待了工作任务，讲了党的纪律和怎样进行秘密工作。还介绍了保定二师学生英勇斗争和壮烈牺牲的情景，鼓励她要勇敢顽强，为党工作。

据陶瀛孙回忆，“到保定后，住在高坡上边（法院街）一个小院内，这个小院共住着五个人：黎亚克（李任予）、我（陶瀛孙）、一个姓张的妇女、还有婆媳俩（据考证是韩永禄的母亲和妻子）。亚克（李任予）对我介绍说：那个媳妇的丈夫是共产党员，为革命牺牲了，暂时住在这里，我们好照顾。这五个人一块起火吃饭。当时生活很苦，只能买杂合面吃。由姓张的那位妇女和婆媳俩操持家务。从表面上看就像一个大家庭。”

为了保证机关的安全，李任予不准陶瀛孙上街，只让她做起草信件、翻译密码、刻印文件等秘书工作。有时还用木板刻印的旧书翻印书信，然后再装订好，这样不易暴露。陶瀛孙说：“黎亚克（李任予）

讲话很风趣。一次他见我印文件弄了满身油墨，便笑着说：“小陶，你这身衣裳很有价值，将来要把它送到博物馆去。”

二师学潮的失败，使李任予一度陷入极度的痛苦之中。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屠杀，如何领导人民群众进行斗争，他不由地追忆起在南方领导武装斗争的历程，从南昌起义、广州起义到闽西领导农民武装斗争，从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剿匪到工农武装割据的建立……武装斗争的经历使他深深感觉到枪杆子的重要性。他缅怀几年前跟朱德、毛泽东在闽西用枪杆子创建苏维埃红色政权的半壁江山。他忍住悲痛与同事一起认真总结了失败的教训，一是对国民党当局会采取血腥镇压的行为估计不足，没有及时做好学生的撤离工作。假如能让曹金月、贾良图、杨鹤声他们和更多的党员、团员、进步学生，采取巧妙的方式，先撤离学校，等敌人撤退后，再组织爱国学生进行反蒋抗日爱国活动，也不会发生七六流血惨案。二是必须尽快武装自己的队伍。对国民党反动政府和反动军队，不要抱有任何幻想，今后的武装暴动，没有工农群众的参与，没有枪杆子是不行的。只有建立起我们的武装，有了自己的军队，才能和敌人打仗，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

李任予痛定思痛，决心化悲痛为力量，振奋精神，重整旗鼓，运筹新的武装斗争。紧接着，他召开了中共保属特委扩大会议，各县党团组织的负责人列席会议，着重就如何开展游击战争、发动武装暴动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和研究。根据中共河北省委的指示，重新改组了中共保属特委、团保属特委领导班子：“中共保属特委书记李任予，委员李永茂（李树文）、赵典模（鲁夫）、姚春荣（姚关志）。团保属

特委书记马永岭，委员杨文明、范承浚。”

随后，安排组织营救被捕的二师学生，发展壮大革命力量，准备东山再起。

第七章 领导高蠡暴动

一、受命发动高蠡暴动

李任予在保定干的第二件大事就是领导和发动了震惊华北的高蠡暴动，名著小说《红旗谱》就是以此真实历史事件为背景而创作的，它真实再现了当时暴动的情况。

1932年7月25日，李任予和赵天绪（保属特委秘书长）到北平西河沿饭店，参加了中共河北省委为贯彻中央北方各省代表联席会议精神召开的省委全会和县委联席会议。会议由中央巡视员晓山主持。会上，晓山极力推行中央李立三“左”倾路线，严厉批评“北方落后”论，强调有利的革命形势和新的革命斗争高潮到来。会议在晓山的坚持下，促使中共河北省委通过了《河北省委接受北方各省委代表联席会议决议》。会上把认为“创造苏区和红军的客观条件还不成熟”的观点斥之为“北方落后”的机会主义，进一步提出“在河北发动游击战争，创建新的苏维埃红军，已经是摆在议事日程中的中心任务”，为此省委决定：用最大力量在京东、保属，直中、直南等地组织全省暴动，扩大罢工运动，组织同盟罢工，组织兵变，发动游击战争，建立红军，创建北方苏区。这些决定，燃起了李任予和赵典模心中的革命烈火。在讨论中，省委领导把眼光转到来自闽赣粤苏区富有工农武装斗争经验的红军领导人李任予身上，建议李任予率先在保定发动武装暴动，创建北方苏区。李任予因二师惨案本来就怒火满腔，加之省委领导的期盼和中央的指示精神，使他试图与国民党反动派大干一场

的想法更加坚定，于是组织一场大规模的高蠡农民武装暴动的计划和盘托出。省委领导听了李任予的计划非常高兴，充分肯定了他的想法。会间，中共河北省委与李任予一起研究了在保定地区组织发动游击战争的问题。

随后，中共河北省委机关报《北方红旗》发表了《为创建一个北方苏维埃而奋斗》的重要文章，表明了河北省委发动暴动的决心。

省委会议结束后，李任予返回保定，立即召集党团特委成员传达中央和省委会议精神，根据保属各县情况，决定在高阳、蠡县一带发动农民暴动，派保属特委成员习从真去定县任县委书记，组织定县一带开展秋收斗争，以牵制国民党反动派，配合高蠡暴动。

李任予自接到省委提出的“发动高蠡农民武装斗争”的任务后，心情一直处于兴奋状态，食不安，寝不宁，时而思考如何组织、领导暴动，确保暴动万无一失；时而想像暴动的壮观场面，憧憬胜利后的未来。他思来想去，决定亲自到高阳、蠡县走一趟，把情况掌握得更具体些，以便因地制宜，适当制定行动计划，避免失误。

二、高蠡两县亲察民情

为清楚了解高蠡农民的发动情况，他和白坚于8月8日分别由特委秘书长赵典模和省委秘书徐云圃陪同，到蠡县、高阳一带的30多个村庄交叉进行巡视、调查和指导。

在宋洛曙的安排和陪同下，李任予先后到蠡县的宋庄、林堡、博野的吴王庄，清苑县的李庄、王盘等村巡视，接触了部分党员、团员

和赤色群众，向他们讲了国内外的政治形势，强调革命高潮已经到来；又谈到南方红军取得的伟大胜利，使在场的党员群众受到革命激情的感染。

有的说：“赶快暴动吧，共产党不暴动，我们就饿死了。”有的说：“共产党不暴动，我们没有出路，只有当土匪去。”

听到这些话，李任予十分高兴，心想：“这不是群众有了思想觉悟，有了夺取政权的决心吗？看来这里暴动的条件已经成熟。”

8月13日，李任予怀着满心的激奋同赵典模、宋洛曙迎着初秋的朝阳，嗅着秋禾的郁香，踏着泥泞的乡路，谈笑风生，直奔蠡县东北区的南玉田而去。南玉田是中共组织发展较早的村庄，1930年12月就成立了以田慎德、王凤斋为正副书记的村党支部。东北区也是全县党组织发展较快的一个区，为准备发动农民武装暴动，1932年2月成立了以王凤斋为书记的中共蠡县东北区委员会。东北区党的活动比较活跃，自然是李任予此次巡视必到的地方。

他们来到王凤斋的家里。王凤斋见特委书记大驾光临，自然十分高兴，忙着座倒茶，叫家人端来半盆凉水，递上毛巾，让3位贵客洗脸，并派人去告知田慎德，而后把客人安顿在他家的西屋。这是王凤斋秘密发展党员、召开党的会议和谋划革命活动的地方。

宋洛曙指着王凤斋对李任予说：“凤斋同志是区委书记，地方上很有威望的农民领袖，共产主义信仰十分坚定。”

“知道，知道，早有所闻。”李任予笑着说，“所以我们才到这里来了。”

王凤斋抢过话茬说：“都别客套，有什么指示，说吧！”

李任予挥挥手说：“没有指示，是求援来啦！你们可要劳神相助哇。”

赵典模解释道：“是这样，省委决定在保定发起农民暴动，为了万无一失，确保胜利，亚克（李任予）同志决定亲自到暴动地区深入巡察，了解情况，把握控制局势，做出决策。”

“太好啦！”王凤斋兴奋地说：“想了解哪些人，我给你去找；想了解什么情况，我给你们介绍。”

“那就拜托你们啦！”李任予表示感谢。

此时田慎德进屋来。寒暄过后，王凤斋说：“我和慎德同志汇报汇报东北区的情况吧。”

李任予点点头说：“好！”

王凤斋说：“我们东北区下辖北齐村、南齐村、南玉田、北界、布里高小5个党支部，有党员67人，各支部还通过各种关系到周边十几个村秘密发展党员。”

李任予翘起大拇指说：“就得这样，一个共产党员就是一颗革命的火种，让我们的党员遍布每一个村庄，我们的党就可以燃起燎原烈火。”

“我们的党组织还干了两件事，”王凤斋笑咪咪地看看李任予接着说：“一是进行革命宣传，利用晚上的时间，神不知鬼不觉地到各村去贴传单，贴小报，宣传党的政策。二是利用护秋的名义，组织武装训练，如打枪什么的。”

“好啊！”李任予兴奋起来：“你们为暴动开始做武装准备啦！”

王凤斋肯定地说：“是的，大家一交流，一讨论，军事知识还都有提高呢！”

宋洛曙插话道：“全县各区都有这样的准备。就等上级一声令下，我们就开始暴动！”

听到大家的发言后，李任予露出满意的笑容说：“再谈谈青年和农民的情况吧！”

王凤斋说：“那请慎德同志谈吧，他负责这方面的工作。”

“先说共青团的情况：共青团蠡县东北区委是今年3月份成立的，下属南玉田、南齐村、布里高小3个团支部，现有团员49人。活动形式和内容与党的活动情况相同。暴动起来，团员们都是骨干力量。”田慎德看着李任予快速记录的笔，停了一下接着说，“农民协会的情况就更好了。我区的农民协会下辖南玉田、北玉田、南齐村、北齐村、荣家营、荆邱、大曲提、布里、北界河，还有潞泷河南边的西莲子口等几个村农协会，会员达749人。农民协会经常和当地织布工人联合起来搞活动，同地主豪绅作斗争，广大贫苦农民、织布工人，都盼望着我们党带领他们翻身闹革命呢！”

“贫苦农民是我们的依靠对象，有他们的支持，革命就有希望。”李任予看看宋洛曙问：“农民协会有多少会员？”

宋洛曙如数家珍地回答道：“4个区农民协会，会员达3600多人。”李任予一边点头，一边进入沉思。他思考这3600多个贫苦出身的农协会会员对暴动是个什么概念。

作为特委秘书长的赵典模一直在考虑这次行程的具体安排，于是

他打断了李任予的思考说：“基本情况都知道了，现在商量一下这次活动的安排吧。”

为了保密起见，大家商定了行动方案：白天三级领导一起讨论问题或找骨干群众到王凤斋家交流情况，晚上深入农户或到同围村庄体察民情。

当日晚，王凤斋陪同3位领导来到本村王志国家。得知来意，王志国惊诧不已，特委书记微服私访体察民情，竟不请而至来到自己的家，这是他做梦也没想到的事情，除了受宠若惊的感动之外，就是对这位年轻特委书记的崇敬。他恭恭敬敬地急步上前握住李任予的手说：“可把上级领导盼来啦！快听听咱穷苦百姓的心声吧！”

李任予见此情景，对眼前这位朴实的农民产生了极大的期望，客气地说：“那就把你们的心声说说。”随即松开与王志国紧握的手，示意王志国坐下讲话。

“贫苦的人挣扎在饥寒交迫的死亡线，”王志国见李任予听他诉说边在笔记本上记录，受到了鼓舞，心情平静了许多，就放慢了语气继续说：“有的准备扶老携幼去逃荒，有的期待着革命风暴的来临，人们三三两两私下里叨念着只有起来闹革命才是唯一的出路。”

李任予问：“你知道穷人在死亡线上挣扎的原因吗？”

“那还用说，日本侵华对我们经济上拼命掠夺，土布卖不出去了，和织布有关的行业都没饭吃了。”王志国有些愤恨道，“还有就是官府的欺压，苛捐杂税。”

听到这里，李任予停住忙于记录的笔望着王志国说：“持这种

看法的人有多少？”

“不少呢！你可以问问凤斋同志，他是领导，比我知道的多。”

王志国看看李任予看看王凤斋。

王凤斋会意地点点头。

李任予又问道：“咱们的穷哥们希望这革命什么时候来临呢？”

“当然是越快越好啦！”王志国期待地说，“明天就来才好呢，革命的风暴来了，人们都投入到革命当中去，就不用再扶老携幼流浪他乡了。”

王凤斋接着说：“有这种想法的人很多，不只是贫苦农民，还有织布工人，手工作坊的人等等，一旦革命来了，大家都会投入革命的。”

李任予说：“农友、工友的革命要求，我们要支持，党的基层组织要保护农工的利益，为改善他们的生活多做实事，让他们感受到只有共产党才是他们翻身做主人的领导力量。”

王凤斋说：“是呀！我们曾经组织七八十个人，在一宿之间掐光本村地主的6亩高粱，还组织以织布工人为主的60余人掰过陵阳朱家的棒子（玉米），还揪过一家地主的苜蓿，都分给穷哥们充饥了。

王志国接过话茬说：“这都是凤斋同志组织大家干的。他为人好，既有胆量又有武功，好交朋友，人们特别是穷人都很尊敬他。在他的带领下，和我们一起参加活动的人越来越多。

李任予眼里闪着赞许的光，看看坐在对面的宋洛曙和赵典模说：

“我们只有时刻为劳苦农工民众谋福利，我们的党在农村才会有根基。什么时候也不能忘记这一点。”

在坐的人都默默地点头。

首次入户巡访，李任予非常高兴。使他更深切地了解到了穷苦农民的生活状况和思想状况，增加了他发动农民暴动的决心。

次日，他又在周边地区进行了巡访。

晚上，借着月光（时在农历七月中旬）王凤斋和田慎德把本村和附近村的党团员组织起来进行军事操练，听说是给上级领导看，大家演练起来分外认真，队列站得很整齐，个个情神饱满特别卖力。李任予看了之后连声称赞。

第三天的早晨，吃过早饭，几个人不约而同地来到王凤斋家的西屋，李任予美滋滋地从头到尾一遍一遍地翻弄他那笔记本，时不时地发出“不虚此行，不虚此行”的感叹。

赵典模最了解李任予的心情，翘着二郎腿笑咪咪地说：“咱们冒风雨、顶烈日，不分昼夜地忙碌，不就是为了这个吗？我猜你是想转移阵地到高阳那边去了。要不明天咱们就过去？”

李任予停住翻笔记本的手，望着赵典模说：“明天就晚了，要去，咱们今天就去，一会儿就走。”

田慎德说：“看你，说急的就来快的，下午再走也不迟呀！”

王凤斋摆摆手说：“不行，下午也不能走。现在水还没有退，越往东地势越洼，道路不好走，还隔着一条潞泷河，而且民团、警察活动频繁，很不安全。我的意见是派个人过去，通知那边，让他们来向你汇报。你看行不行？”王凤斋看着李任予，像是等待他的决定。

李任予沉思片刻，望望赵典模，而后朝王凤斋点了点头，以示同

意。

宋洛曙指着李任予拿笔的手说：“你这么着吧，写个纸条儿让人带过去。”

王凤斋摇摇头说：“用不着写条，这样不便于保密，我派何景茹过去就行了，她是我们的秘密交通员。”

蠡县东北区和高阳东南区有着地理上的渊源，同饮潞泷河的水，共食潞泷河的鱼。在河水断流的季节，两岸大地连成一片，两地百姓交往密切。高阳东南区最早的共产党员蔡泮林、蔡汝松、王涛等都是由市里高小党支部的于浩川、李子逊等人发展入党的。而市里高小党支部隶属以王凤斋为书记的蠡县东北区区委管辖，两地的党组织有着天然而紧密的联系。再者，何景茹身份特殊，她婆家是高阳县西演村，是蔡泮林、蔡书林兄弟的族婶。在中共处于地下活动，单线联系的特殊时期，何景茹受王凤斋的指派担负起高蠡两县秘密交通员的任务。在高阳只有她同蔡泮林、蔡书林、王涛等党的主要负责人秘密联系，传递信息，别的党员她不认识，认识的也不知是不是共产党。

就这样王凤斋找来了何景茹，让她通知高阳的王涛、蔡泮林，立即前来会面。正是雨季，30 来里路，还隔着一条潞泷河。

何景茹不辱使命，顺利地通知了蔡泮林，蔡泮林又告知了王涛。下午何景茹和田慎德在村口迎接蔡、王，并把二人带到王凤斋家与李任予会面。

号称小诸葛的蔡泮林见到李任予喜出望外，半是激动半是调侃地说：“李大人啊，李大人，我蔡泮林可把你盼来啦！”

李任予有些摸不着头脑，诧然道：“此话怎讲，什么李大人？”

其他人也以疑惑的目光看着蔡泮林。

只见蔡泮林两手一摊说：“此言浅而易懂。都知道大清朝有个李中堂，名鸿章字少荃。他曾坐阵保定府，办过洋务，开过矿山，造福河北人民。他还开展过东南互保运动，使河北、山东的百姓免受八国联军的侵扰之害。如今共产党派你由北平来保定坐阵，你不就是共产党的李中堂李大人吗？”

听过蔡泮林的话，大家都释然地笑了

李任予边摇头边摆手笑着说：“不，不！咱们共产党还没有执掌保定的政权，就是掌了权，也不会有什么李中堂。我姓李，可我不是李鸿章，自然就没什么李大人。”

哈哈！大家都仰面大笑起来。

李任予收住笑，看看蔡泮林和王涛说：“你们高阳啊，是个英雄辈出的地方，明朝有个孙榜眼——孙承宗，一身忠骨，一腔热血，是著名的抗清英雄。清军围困高阳城，他率领全家老小和城内百姓闭城据守。城破被擒，自杀殉国，伟哉！壮哉！”

李任予的慷慨陈词，使在场的人都肃然起敬。

李任予缓和了些口气接着说：“往事如烟，英雄堪赞。今天我们领导穷苦农民闹革命，也需要这种精神，也需要这样的英雄啊！”

“是非成败转头空，今朝我们就是要当老百姓赞赏的英雄！”王涛深吸一口气发言：“言归正传吧，我先讲讲党组织的发展情况，要当英雄还得靠我们的党员创造业绩呢！”

李任予笑着点点头，其他人也为李任予和王涛的精彩对答叹服地笑了。

王涛侃侃而谈：“高阳那边的党组织和蠡县相比发展的较晚，但发展得很快。1930年2月在市里高小（当时属蠡县）由于浩川、李子逊介绍我和蔡泮林、蔡汝松同时加入共产党，开始在高阳建立党支部，蔡泮林任书记，王涛任组织，蔡汝松任宣传，由博蠡中心县委领导。10月改组为中心支部，负责人不变。1931年初，由中心支部改组为高阳特区区委，仍由蔡泮林担任书记、王涛担任组织、蔡汝松担任宣传。1932年4月，经省委决定改建高阳县委，归保属特委领导，将高阳城西北安新县所属牛角村的组织划归高阳县委领导，由特委翟树功担任县委书记，王涛担任组织，蔡泮林担任宣传。县委会议决定工作后，仍旧分别领导。高阳西北区由翟树功就近领导，高东南一带仍由王涛、蔡泮林领导。这一年多的时间里，我们大量地做了发展党组织的工作，先后建立了李家庄等20多个村党支部，发展党团员300多名。党的组织在高东南区连成一片。”

李任予停下速记的笔，称赞道：“你们的工作很不错，可以与这边相比美呀！”

高蠡两县的领导都得意地笑了。

蔡泮林抿住笑：“我们还成立了县团委，高东区区委和区团委。蔡汝松、张庆生、侯建民、蔡茂林、张玉生、李振南、侯君枚、蔡书林、侯八元等一批党员骨干力量都担任了不同的领导职务。我们还决定到敌人内部去开辟‘第二战线’，要求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利用

各种关系同地主老财、豪绅家的长工和看家护院的人交朋友，以便搞清财主们枪支和弹药的情况。同时还物色优秀的党团员骨干打入北辛庄国民党南区区公所、公安局、保卫团和县立第三高小。侦察、掌握敌情动态，控制他们的要害部位，瓦解敌人的武装力量。”

这近乎神话般的故事使李任予听得入了神。他惊讶地问：“你们还打入了国民党的区公所、公安局？”

王涛连连点头说：“是的。这都是泮林同志深谋远虑，亲自谋划领导的。泮林同志首先自己打入区公所，当了文书，他同区长和豪绅们混得很熟，他们都很信任他，区长不在的时候他就掌管了区上的一切。”

李任予以惊叹的目光看着蔡泮林说：“怪不得大家称你小诸葛呢！真是深谋大略呀！”

蔡泮林矜持地笑了笑说：“这都是大家的智慧和功劳，没有同志们的团结协作，我个人是难有作为的。王涛同志也到保卫团当了大队长，他把保卫团的班长、团丁几乎都发展成了共产党员。团长是区长兼任的，当区长不在的时候，他就统管了保卫团。保卫团这支小武装被我们党掌握了。”

李任予越听越有精神。他停住笔，挺直了腰板目不转睛地看着蔡泮林。

蔡泮林感觉到他讲的内容引起了特委书记的重视。他看了看宋洛曙、王凤斋等人的表情，然后把目光移至李任予的身上，接着说：“我们还把西演的张树荣同志派到区公所当了助理员，把蔡世平、张阁文

安插在区公安局当了警察和文书，把北辛庄的共青团员张玉楼安排到了县立第三高小。可以说整个国民党南区的区公所、公安局、保卫团都被我们监视、控制了。”李任予指指蔡泮林和王涛说：“你们可够胆大的，敢在老虎身上拔毛！”

王涛有些兴奋说：“还有呢，为了提高大家的军事素质和战斗能力，我们利用合法身份把公安局和保卫团联合在一起组织军事训练，练习打靶。我们的同志特别卖力气，射击水平大有提高。蔡书林同志枪法最好，张士楠也不错。这样的活动，还得到公安局长的支持和肯定。”

李任予用笔在本上连敲了3下说：“好哇！好哇！太不可思议啦！”他缓和了下口气接着说：“你们在国民党的政、警机关内部搞这么大的动作，千万要注意保密呀！万一走漏了风声，后果不堪设想，会有人头落地的危险，那就真成孙承宗啦！”

“从目前情况看，还没有走漏风声的迹象。”王涛略带轻松地说，“前不久，泮林同志经区长同意，以“商讨防共大计”为幌子，召开了一个地主豪绅的座谈会。会上有的说“还是井水不犯河水为好”，有的说：“别招惹他们，要不，打了孩子娘出来。可见，他们对共产党的活动还一无所知。”

李任予满脸挂着笑，看看这个，看看那个，却没有说话。他陷入了沉思：高阳蠡县的同志们太了不起啦！对党忠诚，大智大勇，有这样的老同志做领导，农民暴动何愁不成！随后他又仔细地翻阅他那心爱的笔记本。在场的人都知道李任予在思考深层的问题，谁也不敢说

话，怕打断他的思维，只好默默地等。

李任予翻阅着笔记本，群众中那“赶快暴动吧，共产党不暴动，我们就饿死啦！”“共产党不暴动，我们没出路，只有当土匪去。”“人们期待着革命风暴的来临，革命才是唯一的出路”的声音回响在他的耳畔，一张张焦急的面孔，企望的目光出现在他的脑际。他收回奔驰的思绪，询问宋洛曙：“老宋，一旦发起暴动，你能组织多少人马？”

宋洛曙对形势做了简短的分析后，说：“蠡县、高阳、博野三县一旦同时暴动起来，三天之内可以发动起 5000 左右农民和青年学生，包括国民党乡村地方政府的人员参加红军队伍。单蠡县也可以充实一个师的兵源。”宋洛曙顿了顿补充说：“我们党的一些骨干分子已经搞到了几十条长短枪。只等上级一声令下就能把蠡县、高阳、博野三县的国民党地方政府的民团和地主武装一举歼灭。”

宋洛曙这位农民出身的县委书记有如此大的气魄，令李任予兴奋不已。他挥动着握笔的手面向在坐的农友激动地说：“通过巡视，我得出结论：在蠡县东北区与高阳东南区，地方暴动的条件已经成熟，现在应组织并领导群众暴动，夺取政权。”他即刻指示高阳、蠡县积极发动游击战争，并做了具体部署：

一、加紧扩大宣传工作。宣传分地主的粮食，抢割地主、富农的庄稼；反官盐税，反硝磺局，反对一切苛捐杂税；号召群众自动武装起来，提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打倒国民党反动派、拥护苏联、拥护红军等政治口号。要求各县委照此印发传单，各区委、支部、党员书写散发传单或口头宣传给群众。

二、武装准备工作。在 5 天以内，每个党团员或群众各自准备一种武器。有钱的买枪，无钱的准备梭镖大刀。各区挑选部分可靠的同志，集中一部分武器，秘密收缴反动武装的武器。在 7 天以内，把所有的群众组织起来，每 5 人为 1 小队，3 个小队为 1 个中队，3 个中队为 1 个大队，5 个大队为 1 个支队。高阳和蠡县东北区各成立 1 个大队，蠡县北区、西北区、南区、博野区合并成立 1 个大队。各村都成立破坏队和交通队，负责破坏敌人的交通，担负游击队的通信联络工作。

三、加紧进行以下斗争：

分粮斗争。立即领导广大贫苦群众分豪绅地主的粮食，比较落后的村庄可先从借粮入手，然后发展到分粮。

反盐店斗争。领导群众进行游行示威，砸毁官盐店和硝磺局。秋收斗争：村支部组织穷人抢收地主的庄稼。

这次汇报会也成了高蠡两县的联席会，一直开到深夜才结束。王涛、蔡泮林次日早晨才返回高阳。

白坚也由宋洛曙和蔡书林陪同在蠡县、高阳进行了巡查，并同宋、蔡等两县的领导进行了深刻的交谈。

三、布置蠡县高阳游击战争

1932 年 8 月 18 日，李任予、白坚结束巡视回到保定。在对所巡视情况进行分析时，两人产生了认识上的分歧。他们一致的意见是：应该贯彻中共河北省委在高、蠡地区发动武装暴动的战略思想，走江

西井冈山毛泽东、朱德红军的道路，建立工农红军武装，开辟华北地区第一块革命根据地；在发展壮大红军武装力量的同时，成立苏维埃人民政府，进行土地革命，没收地主、土豪等一切剥削阶级的土地，废除苛捐杂税和取消高利贷，号召所有力量一致抗日，反对卖国投降。但是，在对武装暴动参与的人员数量、武器、后勤供应保障等问题上有着不同的看法。

白坚认为，蠡县、高阳、博野3县的群众参加革命的情绪高涨，有一批党团骨干力量，如果组织、纪律、政治思想工作搞得扎实，发动群众的工作跟得上来，暴动一旦开始举行，在三五天内组织起一支上千人的队伍是完全有把握的。问题是，暴动的参加者大都是农民，没有工人的参与，也没有国民党军队中倾向革命的力量同时行动，武装暴动的战斗打响后，军事指挥很难统一行动，战斗力会减弱。这次武装暴动与去年7月的“平定兵变”不同，“平定兵变”是由我们党派军事领导人打入国民党的内部，策反国民党军队而举行的武装起义，并成立了红二十四军。虽然红二十四军最后被打败，但这次兵变性质的起义本身是成功的。后来的完县五里岗、蠡县万安镇暴动以及二师的学潮，其失败的原因是组织准备工作不扎实，凭单纯的热情进行的冒险行为，而且低估了敌人的力量。目前，蠡县、高阳、博野3县的贫苦农民迫切地希望建立自己的武装和政权。在华北大地上搞出一块“平原上的井冈山”来，这种愿望和设想是美好的。但是，武装暴动的准备工作要做实做细，尤其是要提前训练军事骨干，培养一批军事指挥员，多筹集一些枪支和弹药。

李任予的看法是：蠡、高、博3县的党团员合起来有3500人之多，加上苦大仇深的农民和其他力量，至少可以组织整编一个师。武装暴动的第一枪打响后，在党团员的带头下，成千成百的群众会揭竿而起积极响应，一夜之间会把红旗插遍蠡县、高阳、博野大地的每一寸土地之上。而当地的土匪、民团、警察等所有持武器的敌对武装，将像一群乱飞的马蜂，被武装暴动的革命烈火吓破胆。甚至会不做任何抵抗就缴械投降。在暴动之前军队的编制至少要以1个师3个团的番号出现，要给敌人造成心理上的压力，产生不战而乱的现象。李任予认为暴动的时间不宜推迟，只能加速进行，否则夜长梦多，万一让保定国民党驻军得到消息，情况就复杂了。

暴动的曙光总在李任予的眼前闪动，他让人把在完县巡视的原保属特委书记贾振峰叫回保定，向贾通报了他和白坚巡视后的感受和发动高蠡武装暴动的设想。

8月20日，李任予召集在机关的习从真、贾振峰等特委成员开会，介绍这次巡视所掌握的高阳、蠡县的情况以及在南玉田村对两县委所布置的工作。经讨论认为：“在蠡县东北区与高阳东南区地方暴动的条件已经成熟，现在应组织并领导群众暴动，夺取政权。”接着又研究组建武装的问题，决定按三三制形式建1师3个团，争取扩建为军。并且明确：蠡县东北区为第一团，团长由东北区区委成员南齐村的杨万伦担任，团特委书记王义顺任政治委员；高阳东南区为第二团，由高阳县委成员王涛任团长，特委委员赵天绪任政治委员；蠡县北区、西北区、南区，由蠡县县委代管的博野区合编为第三团，前任

特委书记贾振峰任政治委员，团长待定。师长由特委委员兼高阳县委书记翟树功担任，王凤斋任副师长，李任予任政治委员。待部队扩编为军后，由李任予任政治委员，军长待定。

8月21日，李任予奋笔疾书，以保属特委的名义向中共河北省委作了《保属特委为布置蠡县、高阳斗争致省委的报告》。这份报告着重就武装暴动的准备工作和部队编制事宜作了比较详细的叙述，并提请省委审查后尽快做出批示，以实施武装暴动计划。

中共河北省委收到报告后，立即召开省委紧急会议。省委书记孟永祥、组织部长赵声、军委书记湘农等20多人出席会议。会议未作认真研究通过了李任予以保属特委名义给省委写的报告并做出决定，让军委书记湘农到保属特委，代表省委负责指导一切工作。

四、省委军委书记湘农来保指导

湘农带着紧急任务立即动身，于8月22日下午到达保定，随即参加了特委会议。因会议已经开了一半，湘农只传达了省委发起暴动的指示，未对暴动问题发表任何个人意见。

湘农的到来，出乎李任予和白坚的意料。两人只认为这是省委对保属特委工作的重视和支持。

湘农，湖南人，35岁左右，参加过1927年9月的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有着武装斗争的经验。秋收起义夺取长沙的计划失败后，他没有跟随保存下来的主力红军去井冈山，而是受党组织直接委派，来到北平参加组建北方地区党组织的工作。

8月23日，对高蠡暴动来说，是一个非同一般的日子。这天在湘农的建议下，由李任予组织召开了保属党团特委联席会。第一次对高蠡暴动的发动，在有广泛人员参加的会议上进行认真而有实质性的讨论。湘农代表省委，白坚代表团省委，李任予代表保属特委共同主持了会议。

会议是在保定西门里（现法院街）朱家四合院召开的。这座隔绝了内外来往的小院是一律师的住宅。院子虽不宽绰，但青砖红椽透着几分华贵，门楣上的砖雕，磨面的墙角使人感到别致而高雅。

黄昏时分，与会人员按时到会。博蠡中心县委、高阳、定县、完县的县委书记们列席了会议。

湘农首先传达了中共河北省委的指示。他清瘦的脸上罩着些许严峻肃穆和疑容：“同志们，从今天参加会议的众多人员来看，大家可以知道这次会议的重要。我们将在这里决定高蠡两县农民武装暴动的命运。省委收到了保属特委8月22日的报告，同意特委对高蠡地区革命形势的分析和对暴动工作的部署。高蠡地区举行武装暴动的条件已经成熟，应抓紧时间尽快暴动，建立红军和苏维埃政权。省委指示我们，按中央北方会议精神和《河北省委接受北方各省委代表联席会议的决议》的精神，大胆地在蠡县、高阳一带组织发动农民战争。但省委指出，任命统治阶级的财政局长做军长，特委的同志都到红军中去，把暴动和游击战争混为一谈是错误的。”

接着，保属特委书记、暴动的总策划人李任予就高蠡暴动的部署，指挥机关的组成以及队伍的编制等问题，向会议做了报告。他的讲话

充满信心，语言手势坚决果断。

会议按议程进行。

出乎李任予所料，大家对高蠡地区革命形势的估计却产生了严重分歧，争论得非常激烈。

李任予胸有成竹地说：“目前，统治阶级已经到了不可能继续其统治与纷乱崩溃的地步，统治阶级都存在着‘五日京兆’，有今天没明天，赶快搜刮以便逃跑的心态。而我们的力量在蠡县、高阳一带有很大的发展。蠡县已经建立4个区委和35个基层党支部，共有党员490人。同时建立了4个团区委，23个团支部，有345名团员。还有4个区农民协会和46个村农民协会，3668名会员。除此之外，还有大批在共产党政治影响下提高了阶级觉悟，迫切要求参加革命斗争的劳苦大众作我们的后盾。在我巡视中他们亲口对我说：‘共产党再不起来暴动，我们就会饿死。共产党不暴动，我们就没有出路，只有当土匪去。’这足以说明当地的群众已经有了夺取政权的要求和决心。综合两方面分析，在蠡县、高阳地区发动武装暴动的时机已经成熟。我们党应该审时度势，立即领导他们暴动。这是摆在我们当前的首要任务。看不到人民群众的力量，就是右倾……”

特委委员习从真坐在那里直嘬牙花。他了解当地群众的情况，二师学潮中在反动派屠刀下喋血的惨状在他脑海里翻滚着，虽然听到“右倾”二字有些心悸，但他还是说话了：“依我看，目前组织暴动还有许多困难！统治阶级尽管腐败，但还照旧不变地维持着自己的统治，他们是腐而未败。他们手里还有军队，还有警察。他们刚刚镇压

了二师学潮，制造了‘七六惨案’，说明他们还有力量，还会同样地来镇压蠡县、高阳的农民暴动。生死成败之际，不能不虑。”

李任予听到反面意见，但没有马上进行反驳。他愣了一会儿，见没人发言，便开口道：“大家还有什么意见，可以发表。”但仍没人发言，他咳了一声说：“从真同志提出的问题，省委在指示信中早已分析过；在蠡县、高阳，阶级敌人的武装不统一，商团只有 300 人，警察一般是八人至十一二人。枪支半数是坏的，子弹很少。有的地方的警卫团在我们的工作下，一般团丁都很动摇。至于驻军，两县境内都没有。保定、定县的驻军大部分开去应付刘桂堂还未回来……”

“对！”有人支持李任予的意见。

姚春荣闷不住了，他放下手中摇动的破芭蕉蒲扇说道：“高阳、蠡县虽然没有驻军，可那里的警察局却有全副武装的警察、保安队，下边还有保卫团……距两县只有几十里的保定和安国还驻守两个旅的兵力，时刻都有镇压革命的可能，”姚春荣喘口气，用舌头舔一舔干燥的嘴唇，正要继续讲下去，话茬却被人抢了过去：“搞暴动不是闹着玩的，没有成功的把握千万不能‘动’，一旦失败，就会人头落地。我们党在蠡县、高阳近十年发展起来的本钱，就全砸进去了。”

“对，可不是闹着玩的。”

“赔本的事咱可不能做。”

习又发言说：“亚克（李任予）同志看到的只是我们党内同志和我们周围少部分赤色群众的情况。大多数群众虽然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不满，但是不一定就有建立革命政权的觉悟和决心。暴动起来以后，

我们的同志大部分都当红军去了，在地方上没有广大群众的支持和帮助，我们就像鱼离开水一样，寸步难行……”

两种观点，越争辩越激烈。

宋洛曙这位来自暴动漩窝里的县委书记能够列席这次会议，心里有几分激动。他本来是主张暴动的，因为自春季以来做了大量党内、党外的革命宣传和组织发动工作，不都是为了这次暴动吗？但是听着委员们的争辩，有些茫然，他没有发言，一边听，一边皱起眉头想。

白坚开口提出了缓兵之计：“我看大家认识难以统一，建议先歇一会儿吧，这个热劲的。抽锅烟，放放风。”

湘农闻此，放下手中的笔说：“好，就休息一会儿吧，不要闹出动静。10 分钟后继续开会。”

灯熄灭了，挡窗的黑布帘被摘下，夜风扑进闷热的小屋。

大家离开了自己的坐位，抽烟的抽烟，方便的方便，有的打个舒张，伸伸胳膊，有的不停地扇蒲扇、擦汗。但他们的神色却像这夜色，沉沉的，没有一点轻松感。

10 分钟后，与会者各自就位。

还是李任予首先发言：“博古同志早就说过全国性的革命高潮已经到来，我们不要低估了北方的革命形势，不要怀疑党的路线，不要动摇省委对发动高阳、蠡县农民战争的决心，在这样大好的政治形势下，任何的消极等待观望态度，都会使我们的党犯下机会主义的错误！”他越说越激动，说到“机会主义”的时候竟然用手拍起了桌子。

“我们谁也不愿犯机会主义错误”，又是习从真发话了，“可我

们也不能被少数人反对国民党的激烈言辞所迷惑，目前的实际情况是广大农民中只有少数先进分子革命情绪比较高涨，大部分人的政治觉悟还没有提高，从整个运动来看，蠡县、高阳的革命高潮即将到来，但还未到来，还需我们去做大量群众工作。”

白坚边听大家的发言，边思考着问题。他认为只要发动工作做得好，在蠡县、高阳组织上千人的队伍发起暴动是没有问题的。但又考虑到参加暴动的人员都是当地的农民，武装暴动打响以后，在军事上很难做到统一指挥，战斗力不会很强，没有把握取得军事上的胜利。于是，他说道：“武装暴动的准备工作要做深做细，否则在敌人高度戒备的情况下仓促起事，是有风险的，其结果会适得其反。我们进行暴动的目的是摧毁国民党反动政权，解放劳苦大众，如果我们当前还没有这种能力，与其仓促起事，还不如先领导群众开展日常斗争，为暴动创造条件，待条件成熟后再发动农民举行暴动，这样才能确保万无一失。”

他的发言引起了更激烈的争论，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各执一词不能统一，会议由大会发言变为小组议论。湘农一边听着人们的争论，一边反复琢磨着双方的意见：以李任予为首的人认为统治阶级即将崩溃，中间阶级动摇，广大群众有了夺取政权的决心，发动游击战争的条件已经成熟。而以习从真、姚春荣为代表的人认为：高蠡地区的群众还没有推翻国民党统治和建立自己政权的决心，统治阶级也没有崩溃，而除去部分学生外，看不出中间阶级动摇的事实。因为湘农刚到保定，还没有到下面了解实际情况，他听了双方的意见后，认为李任

予等人的观点脱离实际。他经过权衡利弊，慎重比较后提出：“你们准备的并不充足就这样仓促地暴动，高蠡两县豪绅地主有3万支枪，打折扣15000，再打折扣7500支枪，消灭我们绰绰有余，其结果将是一场我们大家都不愿意看到的一场失败的暴动。”他接着说：“动摇不定的中间阶级还没有达到善意的中立。”

湘农得出结论：“高蠡两县正处在暴动的前夜，应加紧更全面的准备工作，发动农民的日常斗争，如分粮吃大户，抗租等等，在一切斗争中团结引导好群众，健全党的领导组织，等待暴动条件成熟，再发动游击战争。”

湘农的这一观点，现在看来无疑是实事求是的，但在当时动摇了省委的初衷。

湘农还提出“敌我武装力量对比之悬殊”和“高蠡两县纯系平原没有山岳可恃作为掩护”的理由试图说服李任予，却被李任予一一驳回。他质问湘农：“你说我们搞革命，是靠群众还是靠山岳？”这使湘农张口结舌、无言以对。李任予接着又强调说：“我们搞游击战争，主要是靠人，而不是靠山。我们红军游击队的根据地必须建立在广大群众基础上。主要条件不在地形有山无山。如果说没有山就不能打游击，这是绝对错误的。这种观点发展下去，只会取消在北方可能建立的根据地。只会取消在条件成熟的地方立即开展游击战争，创造新的红军与苏区的任务。这是极其危险的右倾消极主义观念……”

会上，为顺利发动高蠡农民战争，还对红军游击队的纲领进行了讨论，在这个问题上，湘农与李任予又发生了意见分歧。湘农主张：

不宜写得过于复杂，简单写几条，让群众一望而知最好。李任予主张：既然是纲领，就应该多写几个方面，以全面为好。否则就不称其为纲领，不能有效地指导红军的斗争。

经过争论湘农同意了李任予的意见。

紧接着在纲领条文的书写顺序上，两人又出现了争论。湘农说：“先写土地问题和一般农民的迫切要求，后写反帝、反国民党等离农民切身利益较远的问题。农民最迫切的是土地，反帝不是农民最迫切的行动口号。”李任予的意见则相反，他主张先写反帝、反国民党，这才是革命的大事。

湘农被李任予的激奋和热情所感染，又同意了李任予的意见。

最后在湘农的提议下中共保属特委通过了主要的人选任命，报请中共河北省委批准备案。

湘农担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七军第一支队司令员；

宋洛曙担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七军第一支队副司令员；

会议决定武装暴动一旦开始，随即建立地方苏维埃政府。湘农任主席，宋洛曙任副主席。

会上李任予总结大家的意见，讲了暴动的准备和行动计划：

一、成立由特委书记李任予等7人组成的保属革命委员会，作为开展游击战争的总指挥机构。

二、保属革命委员会政治纲领的基本内容是夺取反动派的武器，武装工农，建立红军，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建立苏维埃政权，实现耕者有其田，改善农民生活；工人减少工作时间，增加工资。这也是

未来所发布告的基本内容。

三、根据省委指示，建立输送大队，负责接收外地向暴动地区支援的人员、武器和物资。输送大队大队长由省委派人担任，省里负责筹划；副大队长由保定市中心党支部书记齐庆祥担任，负责完善输送和接收体系。

四、湘农任高蠡暴动的总指挥。李任予、白坚、姚春荣坐镇保定，负责特委的全面工作。贾臣任蠡县西北区特派员，王义顺任蠡县东北区特派员，赵天绪任高阳东南区特派员。习从真到定县领导秋收斗争，策应高蠡暴动。

五、在高阳、蠡县分3个地区组建农民武装。高阳东南区为第三大队（团），蠡县东北区为第二大队（团），蠡县西北区为第一大队（团）。3个大队编为一个支队，番号是二十七军第一师。每个大队下分3个中队，每个中队下分3个小队。武装斗争以高阳东南区、蠡县东北区、西北区为根据地，在这些地区建立地方苏维埃政权，进行土地改革与肃反工作，组织赤卫队、少先队、童子团等。游击区为高阳、蠡县、肃宁、任丘、安平、深泽、博野7县。如果遭受敌人大的“围剿”，游击队实在不能立足于原定区域时，便从平汉路向西退至完县（今顺平）一带靠山的地方。

最后湘农代表总指挥部宣布：由他和宋洛曙亲率参加暴动的武装人员到蠡县、高阳前线指挥暴动和作战；李任予、白坚在保定特委机关负责指挥，随时观察和掌握暴动进展，并与河北省委随时取得联络。

湘农代表省委、保属特委做出的这一决定，应该说还是有一定道

理的。湘农认为，他是省委军委书记，担任暴动的司令员和总指挥是理所当然的。他应到最危险的前线亲自指挥作战。宋洛曙是本地人，熟悉地利了解情况，担任暴动副司令员和暴动成功后出任苏维埃政府副主席也在情理之中，体现了民众的心愿。他和宋洛曙配合起来，一定会取得暴动成功。对于李任予和白坚在举行武装暴动中的作用，主要是放到“总指挥部”坐镇与前线 and 北平保持联系。湘农是懂得军事作战理论的，在他看来，蠡县、高阳、博野是“前线”，保定是“指挥部”，北平是最高“首脑机关”。“前线”与“指挥部”与“首脑机关”三者之间的关系，在作战时是一个战役的整体。省委军委书记就是元帅，元帅当然要亲自挂帅。指挥部嘛，当然很重要，是元帅前线作战的大本营，留一小部分武装人员和文职机关领导干部就行了。湘农印象中的李任予，工作热情，对党忠诚，最大的缺点是浪漫主义过重。可他又喜欢李任予的浪漫主义，经不住李任予浪漫主义色彩的渲染。总而言之，李任予是个“秀才”，作党务工作可以，带兵打仗不行。至于白坚嘛，陕北后生，21岁，从西北地区跑来北平闹革命，精神可嘉，搞学生运动，与北平的反动军警“捉迷藏”是有些本事，对这个从陕北走出来的学生领袖不能放到主帅的位置，给他和李任予这个“秀才”，各挂个指挥的头衔在总指挥部留守大本营也让他们人尽其才吧。

会上，李任予宣布了特委委员的分工；省委军委书记湘农和特委委员贾臣（贾振峰）去蠡县宋庄；特委委员赵典模（赵天绪、鲁夫）到高阳东南区；团特委书记王义顺到蠡县东北区；特委委员习从真去

定县一带成立定县中心县委，并在定县、曲阳、唐县、望都、安国、深泽等县组织秋收斗争以配合高蠡暴动；团省委特派员白坚、特委书记李任予和特委委员姚春荣，留在保定主持全面工作。

特委委员们根据分工，随身带上列宁、斯大林论暴动的书籍，各自奔赴暴动的第一线，共同去做“高蠡暴动”的大文章。

五、组织高蠡暴动，建立红军

冀中平原那一望无垠的青纱帐，使人看不到青纱帐内和青纱帐对面所发生的一切。但是它并没有遮住国民党的耳目，他们还是嗅到了共产党紧锣密鼓地布置高蠡暴动的政治火药味。8月25日天津《大公报》、《意识报》都公开刊登了“在蠡县南玉田村有共匪潜伏，并有大批枪械企图暴动”的消息，并加紧了对共产党员的搜捕活动。政治、军事形势非常严峻，高蠡暴动有被镇压而流产的可能，因此特委决定8月25日晚召开高阳、蠡县紧急会议。

湘农8月25日来到宋庄，向宋洛曙讲了召开紧急会议的意图，让他马上通知有关人员参加会议。

这天宋洛曙家异常地繁忙，低矮的土坯房内空前的热闹。不仅本村本地的党员骨干穿梭来往，而且湘农、贾臣等陌生面孔的出现更给村民增加了几分神秘和疑惑。

太阳已经躲到太行山的西边，来人渐渐地少了，这座简陋的农家小院显得豁亮起来。宋洛曙夫人宋大嫂忙着准备晚饭，因为天气炎热，她为大家做了顿凉面——当地叫“冷汤”，面条是用高粱面做的，同

挂面比较起来显得又厚又粗。刚把面条捞到泥瓦盆里，忽然走进两个人来，一进院便说：“大家都好啊。”湘农立刻迎上前去握住前面人的手说：“你们怎么来啦？不放心呀。”

这两人就是保属特委书记李任予和团省委特派员白坚。他们为参加今晚的紧急会议，是在保定南关大车店雇一辆地下党的大车赶来宋庄的。他们带来省委对高蠡暴动的指示。

“先喘口气，准备吃饭。”宋洛曙赶忙张罗起来。

“洗把脸吧！”宋大嫂把脸盆放在矮墙上，又将一条毛巾泡在脸盆的凉水里。

在李任予、白坚洗脸的同时，宋大嫂在土坑上放一个油漆已脱落，桌面裂了口子的小饭桌，让湘农、李任予、白坚等人准备吃饭。

李任予吃一口凉面，称赞道：“宋大嫂真是个巧大嫂啊！高粱面能擀出这样的面条来，得有上等的功夫。”

宋大嫂听到表扬声，虽是40多岁的人了，却表现出不好意思的腼腆，微微一笑道：“这高粱面里头掺了榆皮面（榆树根的皮肤碾成的面），要不，可擀不出面条来。”

说话间她见宋洛曙蹲在台阶旁吃凉面，便随手拿了一张凳子，“你干么蹲着吃呀，给你凳子坐下。”

宋洛曙从妻子手中接过凳子，塞到屁股下面。边大口大口地吃着凉面汤，边不无感慨地说：“这穷苦的年月，也把人们逼得手巧了！”

“老宋你进来。”是李任予的声音。

宋洛曙端着半碗凉面汤，走进屋里。见李任予已吃完饭，坐在炕

东头一张橈子上，湘农、白坚、贾振峰等人坐在炕沿上还端着碗吃饭，便说：“饭食不强，大家吃饱。”

“不用客气，我们在你这儿还拘束吗？”湘农说。

贾振峰将碗向桌子上一放，“饱了，就等着暴动啦！”

大家都笑起来。

“我们今天是带着省委的指示赶来的。”李任予用右手轻轻地拍两下胸脯：“我建议今天的会分两步开，第一步先开一个核心人员会，大家碰碰情况，看有哪些该注意的问题，防止丢三落四，保证正式会议开得成功，让大家明白回去后怎么行动。”

大家都同意李任予的意见。

核心会议开始前，因宋洛曙家橈子少，宋宪章从家里搬来一把太师椅，对李任予说：“你坐吧！”

“不、不，你坐。”李任予推辞。

“我不能坐，帅不离位，你是帅呀！”宋宪章先摆摆手，然后指着椅子说。

李任予指指湘农说：“那应该湘农坐，他是总指挥。”

这般推辞，逗出大家一阵笑声。

预备会议开始了。

首先由李任予传达了省委的指示，他看了看湘农和宋洛曙，咳一声，极为严肃地说：“省委和中央代表对我们这次暴动非常重视，同时也有些担心，所以再次指示我们，要相信高阳蠡县的群众基础是好的，党在群众中的影响是很大的，我们的力量远远超过了敌人的力量，

我们要坚定信心，坚决地加紧布置地方暴动，越快越好。”

李任予看看大家都在聚精会神地听他讲话，脸上露出一丝笑意，继续说道：“省委还指出，不要把游击战争和武装暴动对立起来。在高蠡二县发动游击战争的条件早已成熟，过去没有发动游击战争，是我们受北方落后论的影响，对游击战争产生了错误认识。省委要求我们必须以最大的力量立刻在高蠡二县发动游击战争，并积极布置地方暴动……”

这时林堡的暴动领导人王海源走进来，李任予停住发言向王海源轻轻地点点头。王海源感到会议气氛很是严肃，没敢说话，见宋洛曙给他使个眼色，便在门口拿一个蒲墩，在隔山门旁坐下。

李任予接着说：“暴动成功以后，应建立并巩固在蠡县和高阳的根据地……总而言之，立即布置暴动，建立游击队和苏维埃区。”

宋洛曙听了颇为振奋，激动地说：“是呀，马上暴动，穷弟兄们就等这一天呢！”

与会者们议论开了，都为暴动所鼓舞，情绪很激越。

李任予和白坚耳语两句，然后说：“大家静一静，还有事情呢。”

大家停止议论，会场立刻静下来。

李任予说：“关于建立工会组织，争取白军士兵以及群众等工作与我们目前的暴动没有直接关系，这里就不讲了。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传达。”李任予的表情神秘起来。他压低声音继续说：“这就是

万一暴动失败了怎么办？省委对这个问题已有安排。万一暴动不如人意，而遭到镇压和失败，我们就把队伍拉到迁安县长城以北的地方。原因是：第一那里偏僻，比较安全；第二那里有个山大王叫马五，他不靠近国民党，这个人有一支 100 多人的队伍，比较中立，我们已派人打进去做争取工作，很有可能同我们合作；第三那地方与东北义勇军相邻，可以相互支援，万不得已的时候，可以合入义勇军，继续进行斗争。”

因为这一条以前没有听说过，大家觉得很新鲜，深感省委想得周全，所以大家听得非常认真。

李任予讲完后，湘农深沉地说：“虽然我们的暴动不想失败，但这件事不能轻视，我想是否先派人到迁安县做些准备。”

大家都同意湘农的建议，由宋洛曙、宋宪章、王海源等本地人当场议定派北大留下的共产党员于振海先期到迁安，以防不测。

紧接着湘农谈到召开暴动紧急会议的相关问题，及必须决定的事项，然后大家对这些问题进行了讨论补充，最后确定紧急会议的主持人。

约莫 9 点钟，该到会的人都齐了。

出于安全的考虑，对下一步的会议宋洛曙提出了非常好的建议：“如果会议还在我家这小屋里开，万一让敌人发现，堵了咱们的窝，可就全完了。我建议下一步的紧急会议到青纱帐去开。”

“好主意！”湘农当即表示支持，“可具体在什么地方开呢？”

宋洛曙沉思片刻，突然眼睛一亮：“就在我家坟上吧。周围全是

高粱地。有情况也好分散。”

就这样，紧急会议的会址决定了。

宋洛曙家的坟莹在村东约一公里的地方，坟头不多，几棵柳树长势茂盛，湮没在一片青纱帐中，往南约一公里处是林堡通往宋庄的土路，便于监视国民党军警的动静，的确是召开秘密会议的好地方。

布置好以后，先由宋宪章提一把未点亮的围灯，带一部分人出南街口向左到宋家坟等候，约 20 分钟后由宋洛曙带领第二部分人出北街口向右到宋家坟集中。

人到齐了，有的在坟上找块砖头，有的掰一把高粱叶子，大家无序却很集中地围坐在一个坟头的北侧，点上围灯，准备开会。

为了安全起见会议还安排两层岗哨，宋庄的王玉春等人是外围岗哨，主要任务是警戒蠡县警察局、小陈警察分局军警的动向；由李建等人做内哨，在会场周围进行警戒。

参加会议的人除湘农、李任予、白坚、贾臣、宋洛曙外还有赵典模、王义顺、宋怀欣、宋宪章、曹承宗、李甲臣、王海源、王怀桓、蒋一洪及部分蠡县县委委员，约 20 来人。

会议是由李任予、湘农和宋洛曙主持的。首先李任予简短地传达了省委指示，强调高蠡两县应立即发起暴动。

最后湘农讲了当前国民党有可能向我们动手的种种迹象和暴动的发动、发展及编制等问题。

湘农发言后，大家对暴动的许多具体问题进行了反复的讨论，尤其对国民党近期屡屡派人下乡搜查共产党人，集中民团进行整训等活

动分外担心。大家认为：这是统治阶级已经开始向我们主动进攻的信号，共产党应该先于敌人而动，马上发动游击战，不能等反革命来先发制人压迫我们，导致削弱群众斗争的勇气。

经过反复讨论磋商，大家意见基本取得一致后，核心成员又做了研究，而后由湘农为代表宣布会议决定：

鉴于敌人已采取了先发制人积极向革命进攻的步骤，我们只有采取武装斗争的方法来回答敌人的武装进攻。特委决定：（一）于8月28日早，分3区同时发动武装暴动。组织3个大队：蠡县西区为第一大队，蠡县东北区为第二大队，高阳东南区为第三大队。潞泷河南和蠡县北区可晚期发动，配合主力单独行动。暴动发起后在东北区集合，然后再有联络地进行分散游击。逐渐通过博野、望都向唐完山区转移。

（二）成立农民起义军，番号为河北红军游击队二十七军第一支队，下设3个大队，实行“三三制”编制。广泛宣传没收地主财产，取消官盐店，废除高利贷和苛捐杂税，组织农民武装，实行十大纲领。

（三）立即准备必需品，委派曹承宗等人立即去保定搜集置办枪支、弹药、医具、望远镜、手电筒、红布等用品。（四）28日起义，湘农和贾臣留在宋庄，组织第一大队；王义顺到蠡县东北区，组织第二大队；赵典摸到高阳东南区，组织第三大队，三路游击队在南玉田集合。

湘农借着灯光，扫视一下与会者，又嘱咐大家：“回去后利用26、27两天抓紧做好准备工作，召开各级党的会议，统一全体党员的认识，广泛地发动群众，组织好起义队伍。游击队一开始就应逮捕

当地的豪绅地主，分粮分财，同时宣布我们的名称和政纲，鼓舞唤起民众的热情，同仇敌忾，打击敌人。”

湘农宣布完后又强调说：“我们永远是胜利者，然而革命就会有流血牺牲，不流血的革命即使成功了也不会巩固的。反动政府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不会立地成佛，也不会大发慈悲放下屠刀。要斗争，要共赴国难。”

宋洛曙说：“不与国民党对着干，坐等胜利是不行的，干革命就得靠枪杆子，也就是走井冈山的道路。”

李任予见会议开得很成功，大家想得很周到。他以振奋的心情，坚定地说：“革命理想不是可有可无的点缀品，那是一个人的生命动力，有了理想就等于有了灵魂。我们是有理想有灵魂的队伍，暴动一声枪响，胜利必然是我们的。”

紧急会议整整开了一个通宵，散会时已是 26 日凌晨 4 点，东方的天边露出鱼肚白。各路英豪马不停蹄返回各自的岗位。李任予、白坚也因工作需要即刻回保。

8 月 26 日中午李任予、白坚回到保定后，一直烦事不断。

中共河北省委收到保属特委有关暴动的计划后，基本是同意批准了，只是对武装暴动打出“红二十七军第一支队”的人选配备提出了一些补充决定。湘农担任红二十七军第一支队队长，宋洛曙担任红二十七军第一支队副支队长，省委是同意的。既然是打出一个支队的部队番号，那就不只是两个人，还应配备政治委员、参谋长等领导成员。于是立刻派人去保定送达省委有关红二十七军第一支队领导任命的

口头补充决定：李任予为红二十七军第一支队政治委员，白坚为红二十七军第一支队参谋长。省委的这一补充决定传达到保定的时候，已经是8月26日下午。谁能料到当天晚上宋洛曙已经在宋家庄开始了行动。

李任予和白坚见到河北省委的任命后，心里是非常激动的。他们认为这个决定说明省委大多数领导是了解他们的，信任他们的，对他们的能力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两人反复考虑着省委的这一人事口头补充任命决定，不只是对他们两人能力的肯定，更重要的是省委对红二十七军第一支队所寄予的期望。作为一个政治委员和参谋长，那就是要从整体上为暴动之前和成功之后，为全体官兵的政治、思想、纪律等综合素质的提高，发挥重要的作用。白坚也向李任予、宋洛曙建议过，暴动之前，先要组织一支300人左右的懂军事、政治素质较好的骨干，一旦战斗打响，既有作战的主力部队，又有动员、组织农民参军的政治和军事干部。一个支队的兵源，来自于农民，而这些农民大部分连枪都没摸过，更不要说是马上开到前线去打仗。这些一般性的军事常识湘农同志比他懂得多。湘农去蠡县、高阳暴动前线临走时，也听白坚讲过这些问题。湘农对白坚说，搞一支精干的小部队和加强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只能在暴动的战场去做了。时间不允许，现在已经来不及了。实际上，在白坚看来，组织上任不任命自己为第一支队的参谋长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自己应该到前线去指挥战斗。湘农是一位军事人物，可是光他一个人去了前线与宋洛曙一起指挥还是力量不够的。他向李任予说了

自己的想法，请李任予在“总指挥部”坐阵指挥，他立刻动身去蠡县宋家庄村见湘农，一并向湘农传达省委补充决定的精神。李任予不同意白坚去，说自己是政委，应该到前线同湘农并肩指挥作战。两人争来争去，谁也说服不了谁。后来，白坚含着笑容以新任红二十七军第一支队参谋长的身份向李任予以作指示的口气说：“黎兄（李任予），这一回，你还得听我的，我要行使一回特派员和参谋长的权力。总指挥部必须有一位领导负责留守，你就在保定城耍一耍共产党领导下的红二十七军第一支队政委的威风。我是参谋长，不能离开部队，我要连夜赶到蠡县与湘农、宋洛曙一起指挥暴动。”“你的意见我是必须无条件服从，还是有商量的余地？”李任予明白白坚的话意，总指挥部的重要，一次大的军事行动，指挥员不能都去第一线冲锋。目前的局势表明，蠡县、高阳、博野一带的战斗一旦打响，保定城内就是整个战役敌我双方的总战略基地，甚至保定城也变成前沿阵地。李任予摇着头风趣地对白坚说，“我这个保属特委书记，既要执行省委军委书记的命令，也要服从省团委特派员的调度。好吧，特派员同志，那我就要在保定城唱一出‘空城计喽’。哈哈……”

“哈哈……你当诸葛亮，我们都去做王平、马岱、廖化……”

白坚见李任予同意了他的意见，也诙谐地夸奖李任予。

8月26日黄昏的时候，李任予给白坚挑选了4名具有一定作战经验的特委机关的保卫人员，随白坚一起赶到蠡县、高阳暴动前线。白坚他们趁黑来到南门，只见城门已关闭，城门的城墙周围都部署有大批的军警人员，已经禁止任何人出进。白坚一行5人，都化装成到乡下

购买蔬菜的菜贩子。他们赶着一辆马车，另外人拉着一辆架子车，到了离南门 100 米的地方停下来。敌人早有了准备，出不去。他们又绕到东门，情况和南门一样，城门也关闭了，灯光通明，巡逻摩托车一辆接一辆来回奔驰。白坚叫一位队员走到街道旁还没关门的小商店一打听，方知保定城的东西南北四门都已从下午 5 点起禁止行人出入。也就是说，蠡县、高阳暴动前线还没有打响，保定城的敌人已经提前 3 天得到了消息。这样大的军事行动，很难不漏风声。李任予多次表示：不要怕农民公开抛头露面，农民暴动就是要有声势，搞得轰轰烈烈，使敌人感到到处是我们的暴动力量，到处是我们的红军。在北平搞地下活动的白坚，对于这种还未到暴动时间就大造声势的做法提出了自己的不同看法，但是，实际上是不能挽回局面的，就是湘农、李任予、宋洛曙他们也无法阻止早已暴发出来的群众斗争的大潮。

“卖报、卖报，天津出版的当天《大公报》，共产党分子在蠡县举行暴动，抢走了大批枪支弹药……”一个十几岁的小报童用土布兜子提着一捆报纸，亮开嗓子叫卖。

白坚一听，大吃一惊，忙叫一位队员过去买了一份。他展开报纸头版，中间一块位置，一则消息的标题十分醒目。白坚借着灯光看下去：共产党激进分子在蠡县南玉田村企图组织暴动，蠡县县长陈中岳亲自带领警察去镇压。当场抓捕该村党支部书记田慎德等两名为首分子……

白坚心急如火，居然连国民党天津的《大公报》都登出了蠡县暴动的消息，而暴动总指挥部的指挥员还不知道。明明规定 28 日凌晨

3点钟举行暴动，怎么会在25日就发生这种事情呢？昨天湘农刚开完暴动准备会议。是敌人提前发现了暴动行动，还是情况有变，湘农、宋洛曙改变了行动计划。看来混出城的希望不大了，他必须立即把这一情况告知李任予。他们调转马车，回到刚搬迁来十几天的保属特委机关——保属革命委员会“高、蠡、博暴动总指挥部”。白坚一边叫李任予看《大公报》，一边把城门紧闭，敌人戒严的情况告诉李任予和总指挥部的其他工作人员。保定城实行戒严的情况李任予刚刚知道，但是对天津《大公报》刊登蠡县农民开始暴动且有人被捕的消息还是感到震惊。开始行动啦，大好事。我们的红军队伍，马上就要在华北平原上出现。他这个新任命的红军政委也该放开嗓子，唱几声老家的客家山歌了。

李任予激动过后又跺着脚骂起来。无组织，无纪律，不到总暴动时间，怎么可以随便提前行动，这会给暴动带来多大的困难。白坚又出不了城，暴动前线的情况不了解，这等于总指挥部与暴动前线被切断联系。湘农、宋洛曙他们怎么样了，会不会受此影响，提前暴动还是被迫宣布暴动流产。两种可能性都会发生。白坚和李任予等人挤在房子里，讨论着暴动前线可能发生的种种好的和不好的情况。国民党的报纸登出了暴动的消息，那么，北平、天津、唐山、张家口、石家庄等地的读者都会看到这一消息。省委领导也一定会看到的。省委领导看到后又怎样考虑？着急啊！没有电话，更没有电台，情报人员又出不去进不来，等于总指挥部就是一部失灵的机器、瘫痪的病人。当然，前线发动暴动，指挥打仗，全靠湘农、宋洛曙他们。白坚向李

任予分析了暴动前线将发生的情况，认为暴动时间肯定要提前，无论是任何一个指挥员都会这样发出紧急命令的。他相信湘农和宋洛曙一定会这样做的。现在不是时间提不提前的问题，而是被国民党反动派逼得不得不提前了。如何应对发生的意外情况，湘农是有能力应变的。在军事战术方面，大家谁也不如他。如果参加暴动的农民在两天之内能达到上千人，有一半人员搞到枪支，就可以投入战斗，与蠡县、高阳、博野3县的民团、警察、地主武装较量一番，而后消灭他们是有绝对优势的。我们的3个大队，一个大队按500人计算，也是一支不小的战斗武装。如果湘农、老宋他们组织得好，指挥有方，可以取得暴动成功。白坚最担心的是，保定城全被封锁，说明保定国民党驻军和其他军警人员已接到上级命令，做好城内与城外配合行动的准备。如果湘农、宋洛曙他们暴动顺利，占领了预定的地方，保定国民党驻军的十四旅陈冠群部，还有安国县白凤翔的十七旅，一定会派重兵对我们党刚刚组建的红二十七军第一支队进行南北合围，全力“围剿”。那时，后果将不堪设想，许多共产党员、共青团员，无数参加红军的新战士，参加革命的贫苦农民，鲜血要染红蠡县、高阳、博野大地。华北平原不是井冈山，红军队伍还未壮大发展起来，苏维埃政权刚刚诞生，敌人会把我们很快吞噬掉。白坚分析了眼前的局势，向李任予和其他同志提出了两条紧急应变措施：

“暴动打响后，取得胜利，建立起苏维埃政权，红军主力成了敌人正规军围剿的主要目标。除一小部分武装在平原上打游击外，主力迅速开到太行山建立根据地，凭借有利地形，依靠晋冀边界接壤处的

人民群众，做好与敌人斗争的长期准备；为了策应湘农、宋洛曙在蠡县、高阳、博野暴动取得胜利，牵制保定城内的国民党驻军陈冠群十四旅对暴动构成威胁，想方设法拖住陈冠群的十四旅不要出兵。这个艰巨的任务只能由保定的总指挥部来完成。”

“对，不管是暴动成功与失败，到太行山建立根据地打游击，这是一个好主意，走的是井冈山朱、毛红军的路子。最麻烦和最艰巨的任务是如何牵制住陈冠群的十四旅，还有安国县的白凤翔的十七旅。”李任予看着白坚，显得无可奈何。“陈冠群的十四旅，‘七·六’惨案出动了近两个连的兵力参加包围保定二师学校，枪杀我们的同志和爱国学生，要想牵制这支部队不参加反捕我们的红军武装暴动，除非蒋介石、张学良下达‘不打内战、一致对外’的命令。否则，保定驻军是十有八九会出兵的。”

“我们还可以想一想别的办法。比如我们造成满城、唐县、徐水西北一带搞暴动的假相，搞一个‘声西北，击东南’的战略，把敌人的注意力吸引过去，以减轻湘农、宋洛曙他们的压力。”白坚皱着眉头，用手比划着对李任予说，“要么我们还可以来个以‘堡垒迷敌解外围’的战术，靠我们保定城内现有的力量，打出红二十七军第一师（第一支队）下面3个团的部队番号，到处张贴传单，大造舆论，给敌人造成一种我们在保定城搞武装暴动的声势。”

“好，这个主意不错。我同意，马上行动。”李任予又乐观起来，双手挥动着举过头顶，“这个任务就交给保定中心党支部、保定中心团支部来完成，组成200名的党团骨干，化装后每天到城内每条

街每个胡同每个院落散发传单。”

“如果这样进行舆论攻势还牵制不住敌人，我们可以临时组成若干小分队，在探听到敌人出兵去蠡县、高阳时，到敌人的营房进行偷袭。”

“甩几个手榴弹，打一阵子枪，看敌人不乱才怪呢！”

“特派员同志，制止和牵制保定城内的国民党驻军不出兵，这个办法也是唯一的办法。只要能拖延一天的时间，暴动就多一份胜利的把握。暴动的农民和红军战士也就会少流一些血。”

白坚的意见得到了李任予等人的赞同。大家开始行动起来。

保定军警几天来的关闭城门和戒严，引起城内居民的愤慨，大部分居民断粮断菜，又不能出城购买，纷纷集合起来到市党部静坐示威，迫使当局和军警不得不开了城门，经过盘查后，允许群众出入采购粮食、蔬菜等生活用品。白坚和李任予趁机组织一批党团骨干和武装人员化装后分成若干小组，打出红军部队和游击队的番号，搞“声西北，击东南”战术。保定驻军果然不敢轻举妄动，在接到蠡县、高阳等地农民暴动，有大批红军攻击地方政府的情报后，出兵驰援，又担心共产党保定地下武装借机袭击大本营。敌人收查到大量宣传品看后，更加摸不透共产党保定地下组织到底要搞什么花招。怎么一下子就冒出了一个整编师、3个团的红军部队番号？看来，共产党此次是要从城市到农村一起行动，与国民党进行一次较量。保定国民党当局和驻军举棋不定，惊恐不安，为湘农、宋洛曙他们在蠡县、高阳一带组织农民暴动、发展红军武装、建立苏维埃政权，赢得了时间，阻挡了来自

保定敌军的强大军事压力。

李任予虽然未和湘农在一起指挥红军游击队，但他十分惦记暴动的发展情况，遂于 30 日深夜（31 日凌晨两点），又发出了《保属特委关于游击战争的指示》，再一次强调指出“战争的条件和基础主要是群众，而不是地形有山无山”，“要坚决地相信群众的力量，执行特委指示。坚决地反对逃跑和上山主义！”可惜，这一指示未等送到湘农手上，暴动就失败了。

同是 31 日，李任予和白坚对湘农、宋洛曙能否按计划取得暴动的彻底胜利，心里非常担忧和着急；红二十七军第一支队成立后，到底部队人员能扩大到多少，枪支能搞到多少，各级指挥员一下子能配齐吗？还有地方政权的建立，需要不少有斗争经验的同志去工作。李任予的思维快速飞转着。他突然对白坚说：“湘农和宋洛曙在前线指挥暴动，责任重大，我们中共保属特委和暴动总指挥部是否应该拿出紧急应变方案，组织一些党团干部和武装人员，迅速赶赴暴动地区，一边开展建立政权的工作，一边参加战斗，巩固暴动和革命的成果呢？”

白坚低着头，看也没看李任予，说：“是该做些工作，可从哪下手呢？情况不明，不好决断啊！”

李任予又说：“也许暴动成功了，咱们还没得到情报。这么大的行动，不可能不引起敌人的重视。湘农、宋洛曙一定要指挥游击队化整为零，分散游击，否则有被敌人围歼的危险。”

白坚用佩服的目光看看李任予说：“你才是个好参谋长呢！无论如何，这些想法应该转告湘农、宋洛曙他们。”

李任予说：“那怎么告诉他们？又出不了城。”

白坚站起身来说：“还是老方案，你留在保定坐阵指挥，我率人出城去找湘农。”

李任予一拍桌子说：“只有如此啦，那就赶快行动。”

就这样白坚率领 20 多名党团骨干，通过地下党“内线”搞来军警便衣人员的证件、衣服、枪支，化装成国民党的一支军警便衣队在光天化日之下，大摇大摆地混出了城。

下午四五点钟，他们过了高阳县城，南行 10 多里，听到前方有枪声传来，偶尔看到失散的队员逃跑的身影，白坚断定红军队伍肯定被敌击散。他吩咐随行人员分散逃离，自己到清苑县的东阎村的张培植家暂避。

8 月 26 日，李任予派人向湘农通报了敌方的活动和意见，要湘农当机立断，迅速行动。湘农等鉴于高蠡暴动的计划已经被敌人探知，并在《大公报》上披露，蠡县国民党政府已经派警察到南玉田开始搜捕的情况，便决定提前行动，以武装斗争的方法回击敌人的进攻。

8 月 27 日，一场轰轰烈烈的高蠡农民暴动首先在蠡县宋家庄发起，随后，蠡县东北区、西区和南阳县东南区的农民纷纷起来响应。1000 多农民举起了刀枪，公开向国民党反动统治宣战。

暴动队伍所到之处，张贴保属革命委员会第一号布告，向群众公布游击队十大纲领，发动群众，扩大队伍，收缴反动武装的枪支，打

土豪、斗地主、分粮仓、砸盐店、废除高利贷和苛捐杂税，深受群众欢迎。8月30日，游击队采取里应外合的战术，缴获了高阳县北辛庄保安团、公安局、区公所等处敌人的长短枪40余支。当晚，湘农在北辛庄召开紧急会议，宣布建立地方苏维埃政府，湘农任主席，宋洛曙任副主席，同时整编了游击队，正式成立河北红军游击队第一支队，下设3个大队，共300余人，湘农任支队长。

苏维埃政权和河北红军游击队第一支队的建立，极大鼓舞了食不果腹的贫苦农民，许多饱尝疾苦的农民纷纷起来协助游击队打土豪，收缴地主武装，踊跃加入红军行列，使农民武装迅速扩大。高蠡暴动的枪声震惊了保定国民党反动当局，即令驻安国县国民党部队连夜火速对红军游击队进行“围剿”。8月31日，当红军在高阳县西演村获胜班师返回北辛庄召开大队长、政治委员军事会议时，被国民党驻安国县白凤翔骑兵团包围。在高阳县北辛庄，红军游击队奋力抵抗，由于暴动队伍武器不足加上缺乏必要的战斗经验，终因敌我悬殊当场牺牲17人，被捕19人。大部分队员突围后在数倍敌人的追击下被打散。暴动失败后，另一支博野暴动农民40余人在向主力汇集的途中也遭到保定派出的国民党部队“围剿”，20人被捕，其中19人被枪杀，只留下一个最小的16岁暴动队员刘青山。敌人打散暴动队伍后，保定特种公安局和驻保十四旅联合行动在保定市内和高阳、蠡县、安新、青苑、博野等暴动地区全面“清剿”，穷凶极恶地捕杀暴动队员，保定城乡一片血雨腥风，处于更加严重的白色恐怖之中。至此，一场由共产党领导的农民革命武装暴动失败了。

高蠡暴动是保定地区高阳、蠡县一带的广大农民，在中共河北省委和保定特委直接领导下，掀起的一场震撼华北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大规模农民武装斗争，是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北方党组织创建红军、建立苏维埃政权的一次伟大尝试。这次暴动虽然失败了，但震撼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社会基础，打击了敌人反革命气焰，唤醒了劳苦大众的阶级觉悟，扩大了共产党在人民心目中的影响，播下了革命火种，为冀中平原在抗日战争时期开展武装斗争，建立红色政权积累了经验，奠定了群众基础。

高蠡暴动失败，李任予痛心不已。他不顾敌人的搜捕、屠杀，强忍悲痛继续指挥战斗。他一面派人秘密到暴动地区，慰问暴动队员家属，安葬烈士；一面组织保定及周围各县党团组织寻找保护暴动失散人员，并亲自督促检查党的保密工作，以最大限度减少损失，待机再行暴动。

第八章 被捕入狱 坚贞不屈

一、用生命保护党组织

1932年9月30日下午1时许，李任予等两人来到保定基督教青年会馆阅报室转移特委机关油印机、誉写板等物时，由于叛徒出卖，被埋伏在阅览室的特务抓捕。

李任予被捕后，国民党反动当局如获至宝，军政宪特都想邀功请赏，最后由保定特种公安局、清苑县政府和驻保陆军十四旅联合给河北省政府、平津卫戍司令部、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发电，请求处理办法。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回电责令驻保十四旅军法官曹桢、保定特种公安局局长于锡藩和清苑县县长金良骥组成审判小组，就地严加审讯。受宠若惊的曹桢等3人，遵照其主子的旨意亲自出马，昼夜审讯，企图从他口中获得保定地区党组织、河北省委及北平市委最高领导人的情况，以彻底摧毁整个北方的共产党组织。国民党反动派对李任予施以鞭打、火烫、压杠子、灌凉水、手指钉竹签等种种酷刑的摧残和折磨，妄想迫使其屈服。李任予深知国民党反动派的狡诈凶残，自从被捕以后，就作好了用自己生命保护党组织的思想准备。因而，在敌人的法庭上，不论是严刑拷打还是叛徒出场对质，得到的只有李任予“来保寻找朋友，其他一概不知”的供词。他的妻子陈竹君到狱中探望，看到李任予浑身伤痕累累，瘦骨如柴，失声痛哭。李任予百般安慰，鼓励她坚持斗争，并对陈竹君说，组织上现正在设法营救我，万一营救不成，死而无憾。他曾通过妻子陈竹君给河北省委秘密传出

一张纸条，其上写道：“我受刑很重，指甲都被拔掉，十指溃烂，但我的口供只有三个字：‘不知道’。”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坚贞不屈、视死如归的革命意志。

李任予被捕后，中共河北省委为营救李任予，向多方筹措资金，打通各种关系，但由于“案情重大”都未能如愿。最后联系冯玉祥、蔡廷锴等有声望的国民党爱国高级将领面见蒋介石力保。蒋介石均以“李之道是中共保属特委书记，组织领导高蠡暴动有据”而拒绝通融。①经过一个多月的审讯，当时化名李之道的李任予始终缄口不言。审判小组黔驴技穷，只有以“李之道已抱定为共党牺牲之决心，多次审讯，茹供不吐”为由，“拟依照《危害国民紧急治罪法》判处死刑”的请示，得到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既证据明确，准照执行”的批复。

1932年11月27日早晨，国民党军警秘密把李任予从牢房提出，押往保定城外小西门刑场。军警害怕李任予沿路宣传，便将李任予放平躺在车上，叫两名犯人压在身上，使其不能说话。刑车在军警的严密看押下驶向保定城外小西门水闸水窑处。当军警把李任予推下刑车后，李任予面对死亡，昂首挺胸，在“红军万岁”、“共产党万岁”的高呼声中倒在血泊里。人民的好儿子，中国共产党的坚强战士，红军早期的领导人李任予为了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和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自己年轻宝贵的生命，牺牲时年仅29岁。他的英名将名垂千古。他一生的奋斗精神和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立下的丰功伟绩，将永远激励着后人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前仆后继勇往直前！

12月1日,《天津益世报》以“保定共党领袖李之道等昨枪决”为题报道了李任予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的消息。18日,中共河北省委致中央信中,汇报了中共保属特委书记李任予英勇就义一事。中共河北省委曾在党内刊物发表了《悼念亚克同志》的文章,省委书记孟永祥也在北平市委的一次会议上,介绍了李任予为党献身的英勇事迹,号召大家学习他的革命精神,踏着烈士的血迹前进。

李任予作为中共保属特委书记,在保定任职到英勇就义仅6个月零1周的时间,但他胸有朝阳心怀壮志,满腔激情不怕艰险,深入劳苦大众作出了一番波澜壮阔、惊天动地、彪炳千秋的伟大事业,用自己年轻的热血和短暂的生命谱写了他的革命生涯的壮丽诗篇。他领导了全国闻名的“二师学潮”,发动了震惊华北的“高蠡暴动”。这次暴动的前后,虽然导致47名革命志士壮烈牺牲,但他们的英勇事迹鼓舞激励了河北人民的革命斗志。当时在高蠡地区农民中间,广泛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不怕你杀,不怕你砍,大兵走后还共产。”

高蠡暴动中先烈们的革命精神,鼓舞着广大民众继续完成他们未竟的事业,正如当年冬天中共保属特委组织悼念保定二师学潮和高蠡暴动殉难烈士们所唱的《悼念烈士歌》:

你们为革命而牺牲,
留下了光荣的死,
你们长眠在坟墓中;
残暴的强权还在行凶,
我们踏着这一条血路而前进,

继你们的志以慰你们。

残暴的强权还在行凶，

我们踏着这一条血路而前进，

继你们的志以慰你们。

二、彪炳史册 英魂长存

英雄已逝，英魂长存。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年2月，高蠡人民怀着对先烈的崇敬心情，在高阳北辛庄竖立了烈士纪念碑，碑文刻下了李之道（李任予）和其他烈士们的光辉名字。1957年又在此建造了高蠡暴动殉难烈士纪念塔。1978年后重新修葺改名为：辛庄烈士陵园、高蠡暴动烈士陵园、高蠡暴动纪念馆。

由于李任予少小离家，参加革命后使用化名多，家乡人一直不知他的下落。新中国成立后，1953年3月23日，其父亲李名伍写信给毛泽东主席，查询李任予的下落。中央人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秘书处于4月24日复信说：“你3月23日给毛主席的信已转我处处理了。关于查询李任予同志下落问题，因时间相隔甚久，部队建制变动很大，短期无法查到，我们拟印发军属寻人名单发至部队，广泛寻找，待查明下落后，当即去函告知。”

1956年，李任予弟弟李任辉（李安闯）又写信给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查询李任予下落。10月某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信访办公室以总政秘群字第6211号复信：“关于查询你哥哥李任予的下落问题，据纺织工业部蒋光鼐部长回忆：你哥哥在1924年国

共合作时，曾任广州教导团政治指导员。蒋光鼐部长离开该团时，曾介绍他到广州市公安局工作。以后蒋部长曾在上海见过他。后来他在华北区作地下工作，被当时的反动政府拘捕入狱以后就无消息。因时间相隔甚久，而且没有适当的线索，我们无法查明他的下落。特复。”

①

1957年，新丰县人民委员会民政科部署对革命烈士进行调查，新丰县城东乡人民委员会派员找到李任予的同乡、族兄弟李寿祺（曾在民国时期任过县政府教育局局长）进行查访。李寿祺于当年10月写出回忆，谈到李任予到北平时曾与他通过信，以后无消息。调查后，新丰县人民委员会意见：应称为失踪革命工作人员。

1959年6月4日，时任民革中央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蔡廷锴写给中共保定党史部门杜毅的信：

杜毅先生：6月1日来函收悉，关于李志道烈士生前事绩问题，事隔20多年我还不十分清楚和了解，事情是这样，李烈士于1931年冬带有冯玉祥先生介绍信到南京见我，乃是第一次会晤亦非同学。那时因九一八事变，日寇不到一星期占领我东北三省，时间未久李烈士痛恨国亡无日，对蒋介石反动政府不抵抗主义恨之入骨，我当时仍率领十九路军在沪宁路一带布防，我与李烈士见面后往来甚密，共同密商抗日反蒋救国大计。他说是党员，河北人，愿意回北方策动群众组织抗日反蒋救国团体，请我帮助。我即给其大洋1000元，回去以后时常均有情报。1932年被特务破获机密被捕，宁死不屈。不久，接其妻△氏（忘记姓名）来电请援救。我与冯玉祥先生向蒋贼交涉，

均以共党暴动有据。出尽九牛二虎之力均属无效。我与李烈士经过是如此，但李烈士这种英勇不屈的精神，永远不能磨灭。惟当时与李烈士相处时间不多，没有将其履历搞清楚，深表遗憾，特复。此致敬礼。

蔡廷锴手启

1959年6月4日于北京府前石碑胡同三十五号

李任予是云髻山飞出的雄鹰，是新丰江水孕育的传奇英烈。为了解李任予的失踪之谜，1984年中共新丰县委党史办公室成立后，进行了长达20多年的追踪调研，曾多次派员到福建、上海、北京、河北、南京、天津等地查找李任予史料。直到1999年底，追认李任予为革命烈士的各种材料才得以齐备，新丰县人民政府即以《关于要求追认新丰籍红军早期领导人李任予革命烈士称号的请示》（新府〔1999〕164号）向广东省人民政府呈请报告。

2000年5月12日，经广东省人民政府批准，追认李任予为革命烈士。

李任予不仅是新丰人民的光荣，也是广东人民甚至是全国人民的光荣。李任予为党的事业，为中国人民的解放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队伍建设作出了贡献。他的传奇事迹，为党和国家、军队留下了不朽功绩，为人民尤其是为新丰人民增添了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他是共产党员楷模，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传奇人物。生活在新丰江两岸的家乡人民将永远怀念他。

2002年4月，中共新丰县委、县人民政府为纪念红军早期领导人李任予，在新丰县城南门塘文化广场竖立起李任予烈士的铜像，并

将该广场命名为“任予广场”。

附录

红军早期领导人李任予烈士追认纪实

为人民做过有益工作的人，人民不会忘记。为革命英勇牺牲的烈士，人民更不会忘记，其业绩彪炳千秋。红军早期领导人李任予牺牲近 70 年始被追认革命烈士就是明证。

李任予出生于 1903 年 11 月 4 日，广东省新丰县城东车田围人。早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广州起义失败后辗转 to 闽西，参加“平和暴动”，先后任中共闽西军委主席，红四军政治部主任，红四军前委委员，红二十一军军委书记、政委，中共北平市委组织部长、中共保属特委书记。参加革命后曾用名李之道、李力一、李德山、黎亚克。由于少小离家，较早牺牲，家乡人一直不知道他的下落。

新中国成立后，1953 年 3 月 23 日，其父亲李名伍写信给毛泽东主席，查询李任予的下落。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秘书处于 4 月 24 日复信说：“你 3 月 23 日给毛主席的信已转我处处理了。关于查询李任予同志下落问题，因时间相隔甚久，部队建制变动很大，短期无法查到，我们拟印发军属寻人名单发至部队，广泛寻找，待查明下落后，当即去函告知”。

1956 年，李任予弟弟李任辉（安闽）又写信给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查询李任予下落。10 月某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信访办公室以总政秘群字第 6211 号复信：“关于查询你哥哥李任予的下落问题，据纺织工业部蒋光鼐部长回忆：你哥哥在 1924 年国共

合作时，曾任广州教导团政治指导员。蒋光鼐部长离开该团时，曾介绍他到广州市公安局工作。以后蒋部长曾在上海见过他。后来他在华北地区作地下工作，被当时的反动政府拘捕入狱，以后就无消息。因时间相隔甚久，而且没有适当的线索，我们无法查明他的下落。特复”。

1957年，新丰县人民委员会民政科部署对革命烈士进行调查，城东乡人民委员会派员找到李任予的同乡、族兄弟李寿祺（曾在民国时期任过县政府教育局局长）进行查访，李寿祺于当年10月写出回忆，谈到李任予到北平时曾与他通过信，以后无消息。调查后，新丰县人民委员会意见：应称为失踪革命工作人员。此后，20多年无人问津。

1984年，中共新丰县委党史办公室成立后，于同年冬派员外出调查李任予史料，先后到南京、北京、上海等地进行查询，均无所获。

1985年新丰县志办公室成立，与党史办公室合署办公，又派了二位同志到北京、天津、上海等地的党史、档案部门进行查找。在当时的解放军海军学院，找到了编写《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汇编》的王健英老师。他提供了许多情况。他说：“李任予，又名李力一，他在福建闽西从事革命活动，先后担任闽西军委主席、红四军政治部主任、红二十一军政委等职，但到1931年后就不知去向了，建议你们到闽西去查找。”

回来后，中共新丰县委党史办公室和新丰县志办公室以“两办”名义向全国各省市的修史、修志部门发函查询，陆续收到了一些信息。最有价值的是时任福建省政协副主席傅柏翠的复信。他证实李任予以1928年到福建，参加了平和暴动，左腿受过伤。1929年在闽西组建

红四军第四纵队时，他任纵队长，李任予任党代表。

1987年，中共新丰县委党史办公室和新丰县志办公室再一次派三位同志前往闽西，在龙岩、古田、查阅了《闽西文献资料》、《闽西革命斗争史》等书，找到了李任予于1928—1930年期间，从事革命活动的大量资料和《红二十一军军委书记李任予给中央军委南方办事处、广东总行委的报告》，以及整编后第十二军政委施简、军长左权于1930年12月19日给中央的报告。报告中提到同意李任予的要求，前往上海找党中央。

根据线索，调查的同志便到了上海找了有关部门，但一无所获。接着又马不停蹄得前往北京、天津，查遍了许多档案资料，但都找不到李任予的名字。

外调回来后，李任予的弟弟李任辉提供，解放前听韶关潘允和（李任予的知交）说，李任予20世纪30年代在保定被国民党逮捕杀害，国民党报纸都登过。于是，1989年，中共新丰县委党史办公室、新丰县志办公室联署去函中共保定市委党史办公室和市志办公室，请他们提供李任予的情况，信发出后，未有回音。

1991年7月，中共河北省保定市委党史办公室来函新丰调查李之道（又名黎亚克）史料。1992年5月，中共保定市委党史办公室派两位同志前往惠州查核李之道（李任予）籍贯，当他们了解到新丰曾归惠州管辖后，便转到新丰查找。他们说：“1932年在保定任特委书记的李之道（又名黎亚克）因组织领导高阳、蠡县农民暴动失败，给叛徒出卖，被国民党当局杀害。他们党史部门从1957年起就进行

调查，只知道他是于 1931 年从上海党中央派到河北，由中共河北省委派到北平市委，以李德山名字任北平市委组织部长。1932 年 5 月，又改为李之道，到保定任特委书记。根据当时共事的同志说，只知道他是广东人，是哪个县的就不知道。据查国民党保定特种公安局档案材料，都说李之道“供词闪烁，多方狡辩，籍贯一项，忽而安徽，忽而广东。”原收到新丰来函，是查李任予下落，名字对不上号。于是，两地党史部门通报了调查的情况，经过研究，双方初步确认：李德山、李之道就是李任予，主要根据是：新丰人。

1. 特征相似。福建傅柏翠说：“李任予左腿受过伤。”保定查询当时任北平市委书记顾卓新说：“李德山左腿有点瘸。”

2. 年龄相仿。家里人说李任予 1903 年出生。保定调查当时在北平一起共事的同志说 1932 年时，李德山（李之道）30 岁左右。

3. 经历相同。保定调查当时在北平、保定曾与李之道共事的同志都说李之道是广东人，而时至今日，广东并无他县去查过此人。又说李之道懂军事，当过红军。这与他在闽西的革命活动相符。

4. 李任予知交提供重要线索。他家里人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就已听韶关潘允和说过，李任予以 20 世纪 30 年代在保定被国民党逮捕杀害。

经过分析，两地党史办负责人共同签署了认定书。中共保定市委党史办公室并邀请新丰派人前往保定商议共同上报中央备案。后来，由于机构、人员的变动等原因，这件事停了下来。

《广东党史》1999 年第一期刊登刘子健撰写的《青山何处觅忠

魂》一文，提到“李任予牺牲 60 多年后，家乡的群众才得悉他早已血洒冀中大地。然而，时至今日，烈士的称号尚未得到正名，这不能不让后人发出感叹：烈士魂安何处？”

1999 年 4 月，中共新丰县委、县政府健全了党史研究室机构，落实了人员，并于 1999 年 10 月批拨专项经费，委派县委党史研究室的二位同志前往河北省保定市、石家庄市、天津市、北京市调查李任予史料。中共保定市委党史研究室给予了大力支持，并派人协助，提供了大量史料。但按史料记载杀害李任予烈士的行刑文，由于年代已久，原保定地、市合并，材料只见目录不见内容。到保定市民政局、档案局等单位寻找也没有。在石家庄市，由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介绍到河北省公安厅寻找，他们告知民国时期敌伪档案已上交河北省档案馆，到河北省档案馆翻阅了大量材料还是没有。根据中共保定市委党史研究室提供的李任予牺牲的报道出自民国时期《天津益世报》的线索，调查人员又匆匆来到河北省图书馆、石家庄图书馆、石家庄日报社等单位查找《天津益世报》，均无所获，万不得已，只好返回保定市到河北大学图书馆、保定图书馆，可惜一时也难找到。因经费有限，只好采取两种办法，一是请他们继续协助查找，二是到其他地方寻找。

随后到天津大学图书馆、南开大学图书馆、天津市图书馆，好不容易在天津市图书馆找到所需的材料——《天津益世报》。这张报道李任予牺牲经过的报纸，为追认李任予烈士称号提供了充分的原始依据。此外，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图书馆等也提供了李任予有关史料。

外调回来后，中共保定市委党史研究室来电告知，杀害李任予烈士的行刑文已找到。这样，为追认李任予烈士的各种材料才得以齐备。中共新丰县委、县政府即以《关于要求追认新丰籍红军早期领导人李任予烈士称号的请示》（新府[1999]164号）向省报告。

2000年5月12日，广东省人民政府批准李任予为革命烈士。

本文为李美通、李伟才、张弘、李石星合撰发表于《广东党史》2001年第2期。

追寻红军早期领导人李任予的足迹

为了在国内外进一步宣传红军早期领导人李任予烈士的英雄事迹，我们专门成立了调查组，前往韶关市、广州市、福建省龙岩市、河北省保定市、北京市等李任予曾经战斗过和工作过的地方，进行资料补充调查、认定，共拍摄珍贵图片 600 多幅，采访知情人和研究者 20 多人，收集有关书籍资料 50 多份。

一、李任予的革命经历十分丰富，生前化名多，追寻其下落过程曲折复杂

我们首先到了李任予出生地——新丰县城东村车田围，采访了他的侄子李广文和他的乡亲们，了解清楚李任予的家庭情况和成长经历。而后，我们在新丰县档案馆拍摄了几份珍贵资料，它们分别是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秘书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在 1953 年前后代表毛主席和朱德给李任予父亲李名伍的回信，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信访办公室在 1956 年 10 月给李任予弟弟李任辉的复信，李任予的好友李寿琪 1957 年写给城东乡人民委员会的回忆录。这些重要信件提供了李任予早期革命的部分经历，为寻找他的下落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接着，我们在新丰县史志办公室的资料室拍摄了该办 30 多年来收集到的书籍、相片、实物等珍贵资料。

由于李任予的革命经历十分丰富，生前化名多，追寻其下落过程

曲折复杂。第一阶段的寻找是在上世纪 50 年代，在 1953 年 3 月的时候，他的父亲就写信给毛泽东主席，当时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秘书处也都回了信。还有一次，就是 1956 年，他的弟弟也写信给解放军总政治部，查询他哥哥的下落，当时也回了信，但是，当时了解到的情况都不多。到了 1957 年，新丰县在填写革命烈士登记表时，因为找不到他的下落，将其列为失踪的革命军人。重新恢复寻找是 1984 年 3 月，中共新丰县委党史办公室成立后，于同年冬派员外出调查李任予史料，先后到南京、北京、上海等地进行查询，均无所获。1985 年新丰县志办公室成立，与党史办公室合署办公，又派了二位同志到北京、天津、上海等地的党史、档案部门进行查找。在当时的解放军海军学院，找到了编写《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汇编》的王健英老师。他提供了许多情况。回来后，中共新丰县委党史办公室和新丰县志办公室以“两办”名义向全国各省市的修史、修志部门发函查询，陆续收到了一些信息。最有价值的是时任福建省政协副主席傅柏翠的复信。他证实李任予于 1928 年到福建，参加了平和暴动，左腿受过伤。1929 年在闽西组建红四军第四纵队时，他任纵队长，李任予任党代表。1987 年，县委党史办公室和县志办公室再一次派三位同志前往闽西，在龙岩、古田、查阅了《闽西文献资料》、《闽西革命斗争史》等书，找到了李任予于 1928—1930 年期间，从事革命活动的大量资料和《红二十一军军委书记李任予给中央军委南方办事处、广东总行委的报告》，以及整编后第十二军政委施简、军长左权于 1930 年 12 月 19 日给中央的报告，报告中提到同意

李任予的要求，前往上海找党中央。根据线索，调查的同志便到了上海找了有关部门，但一无所获。接着又马不停蹄得前往北京、天津，查遍了许多档案资料，但都找不到李任予的名字。外调回来后，李任予的弟弟李任辉提供，解放前听韶关潘允和（李任予的知交）说，李任予 20 世纪 30 年代在保定被国民党逮捕杀害，国民党报纸都登过。于是，1989 年，县委党史办公室、县志办公室联署去函保定市委党史办公室和市志办公室，请他们提供李任予的情况，信发出后，未有回音。1991 年 7 月，中共保定市委党史办公室来函新丰调查李之道（又名黎亚克）史料。1992 年 5 月，中共保定市委党史办公室派两位同志前往惠州查核李之道（李任予）籍贯，当他们了解到新丰曾归惠州管辖后，便转到新丰查找。他们说：“1932 年在保定任特委书记的李之道（又名黎亚克）因组织领导高阳、蠡县农民暴动失败，给叛徒出卖，被国民党当局杀害。他们党史部门从 1957 年起就进行调查，只知道他是于 1931 年从上海党中央派到河北，由中共河北省委派到北平市委，以李德山名字任北平市委组织部长。1932 年 5 月，又改为李之道，到保定任特委书记。根据当时共事的同志说，只知道他是广东人，是哪个县的就不知道。据查国民党保定特种公安局档案材料，都说李之道‘供词闪烁，多方狡辩，籍贯一项，忽而安徽，忽而广东。’原收到新丰来函，是查李任予下落，名字对不上号。”于是，两地党史部门通报了调查的情况，经过研究，双方初步确认：李德山、李之道就是李任予，是广东新丰人，主要根据是：1. 特征相似。福建傅柏翠说：“李任予左腿受过伤。”保定查询当时任北平市

委书记顾卓新说：李德山左腿有点瘸。2. 年龄相仿。家里人说李任予 1903 年出生。保定调查当时在北平一起共事的同志说 1932 年时，李德山（李之道）30 岁左右。3. 经历相同。保定调查当时在北平、保定曾与李之道共事的同志都说李之道是广东人，而时至今日，广东并无他县去查过此人。又说李之道懂军事，当过红军。这与他在闽西的革命活动相符，4、李任予知交提供重要线索。他家里人早在建国前就已听韶光潘允和说过，李任予于 30 年代在保定被国民党逮捕杀害。经过分析，两地党史办负责人共同签署了认定书。至此，李任予的下落终于查明。

二、李任予不仅仅是新丰的光荣，不仅仅是韶关的光荣，而且是我们广东人民的光荣

离李任予家乡新丰县只有 150 公里的花城广州，作为广东省的首府，是中国近代革命的重要策源地之一。根据史料记载，1924 年，时年 21 岁的李任予到广东甲种工业专科学校就读，下半年，他毅然放弃学业，初在广州市工会工作，受到工人运动领袖苏兆征、邓中夏、李森等人的启蒙教育，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任北海中队长，辑获走私、罚巨款等，充作办学，曾登报广闻。不久在国民革命军蒋光鼐部教导团任政治指导员，协助蒋光鼐训练军队。1927 年 4 月，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广东处在白色恐怖之中，李任予在党组织的安排下，暂时离开广州到江西等地从事革命活动。11 月，他闻悉党要发动广州起义，便不顾个人安危返由赣绕道而返，途中被检

查，化装脱险，回到广州，全身心投入起义准备工作之中，12月11日广州起义打响后，李任予勇敢地参加了战斗，同敌人进行殊死搏斗。广州起义后，李任予根据党组织的安排离开广州，后到福建工作。李任予在广州度过了重要的4年时光。他在这里参加学运、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走上革命道路。

在广州起义纪念馆回来后，我们采访了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的领导和有关研究专家。在采访中，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巡视员、广东省权威党史专家陈弘君说：“李任予是著名的革命烈士、杰出的共产党员，广东省人民政府在2000年5月已批准其为革命烈士，现在许多由中共党史出版社、解放军出版社等权威部门公开出版的书籍都有其记载，他是红军早期领导人，无产阶级革命家。与此同时，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将对李任予的事迹挖掘和宣传也十分重视，将在今后采用书籍出版等形式在国内外对李任予的事迹进行宣传。近期，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已明确同意将红四军早期领导人李任予事迹编入即将出版的《中共党史人物传》一书中。《中共党史人物传》是中共党史研究室出版的国内最权威的、影响力最大的党史人物书籍，至今已出版80多辑，计划出版100辑。中共新丰县委十分重视李任予史料的调查工作，县委党史研究室和省委党史研究室刘子健同志为此付出了艰辛而成效卓著的劳动。”

在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我们采访的另一位重要对象就是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副巡视员、原编辑出版处处长刘子健。他是省内研究李任予的权威专家。在1998年，他曾经作为省委党史研究室

派驻扶贫干部到新丰县工作一年，正是他以敏锐的目光和党史工作者的责任发现了李任予研究的紧迫性和重要性。那时，李任予还未落实烈士的称号。他于1999年1月在《广东党史》杂志发表了《青山何处觅忠魂——记红军早期领导人李任予下落》一文，在文中他提到“李任予牺牲60多年后，家乡的群众才得悉他早已血洒冀中大地。然而，时至今日，烈士的称号尚未得到正名，这不能不让后人发出感叹：烈士魂安何处？”此文发表后，马上得到时任中共新丰县委、县人民政府主要领导的高度重视。县委迅速健全了党史工作机构、批拨专项经费、派人奔赴李任予曾经战斗过和工作过的地方，进行资料调查和申报烈士工作。最后，广东省人民政府于2000年5月12日批准了李任予为革命烈士。可以说，刘子健为红军早期领导人李任予事迹的挖掘和研究是立下了汗马功劳。

接受采访时，他对我们侃侃而谈。他说：“上个世纪90年代接触到李任予的材料，是他弟弟寄来的一些信件，反映烈士的情况。要求党史部门弄清楚他哥哥的去向。作为红四军的政治部主任，这么重要的一个人物，居然不知道他的下落，这确实是个大问题。于是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我就写了《青山何处觅忠魂》一文。李任予革命烈士不仅仅是新丰的光荣，不仅仅是韶关的光荣，而且是我们广东人民的光荣。他的一生可以划分为六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投身革命洪流（从出生到参加广州起义）；第二阶段就是到闽西（特委军事书记）；第三阶段就是在红四军的工作（古田会议、拥护毛泽东的建军思想）；第四阶段受中央委派，到南京、上海、北平做地下工作；很多影视作

品对这一阶段北京的学生爱国运动都有反映，我们却一直不知道，其领导人就是我们广东的李任予；第五个阶段就是在保定领导高蠡暴动；第六阶段就是他壮烈牺牲，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时年仅 29 岁。”

三、红四军主要领导成员李任予对红四军党的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

福建闽西（即现在的龙岩市）是著名的中央苏区，是中国较早开辟的革命根据地，其在中国革命史上具有无可比拟的地位，它是一批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锻炼成长的摇篮。

闽西为中共早期建党、建军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得到了世人的公认，而这里面也有李任予的一份功劳。据史料记载，李任予从 1928 年春受中共福建省委指派到闽西地区领导农民开展武装斗争，其历任中共上杭县委书记、中共闽西临时特委常委、军事书记、红四军第四纵队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红四军第二纵队党代表、纵委书记兼政治部主任，红四军政治部主任、红十二军政治委员、红二十一军政治委员、军委书记、代理军长，闽西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新十二军政治部主任等职。到 1931 年春离开闽西，被党中央派往上海、南京等地领导城市地下斗争时，李任予共在闽西工作了 4 年。这 4 年时间里，正是福建闽西革命根据地从创建到发展壮大和红四军壮大发展的重要时期，李任予作为中共闽西临时特委领导人之一和红四军领导人之一，为此辛勤工作、呕心沥血，做出了重大的贡献。纵观其一生的革

命经历，闽西是其重要的同时也是最为辉煌的经历。

在中共龙岩市委党史研究室的档案室里我们找到了两份珍贵的资料，一份是中央档案馆和福建省档案馆编写的《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书中“中共福建省委给中央的报告——关于闽南闽西暴动等问题（1928年3月15日）”，如实记载了“1928年3月8日，作为‘福建总暴动的信号’平和暴动爆发，福建临时省委得到暴动即将发动的报告即派李任予和刘端生（中学巡视员）为特派员‘前往帮助该地工作，并将省委的指示转给平和党部，并设法打通平和与省委的交通’”，这是我们目前找到最早记载有关李任予在福建参加革命活动的资料；另一份是福建人民出版社1990年出版《中国共产党福建省龙岩地区组织史资料（1926年夏—1987年12月）》，里面记载了“为配合红四军入闽，1929年3月28日，福建省委决定恢复闽西特委，指派李任予在上杭城水南主持召开岩、永、杭、汀、武闽西五县代表会议，恢复建立闽西临时特委，邓子恢任特委书记，李任予任特委常委、军事书记。”这份资料让我们更清晰地了解到，李任予作为闽西地方武装最高负责人，领导闽西地方武装，贯彻省委工作大纲，发动群众开展武装斗争，积极配合红四军的行动，为红四军再次入闽开辟苏区奠定了良好的武装斗争和组织群众基础。此外，我们在古田曙光小学古田会议旧址里展示的12位红四军前委委员里发现有李任予的介绍，其排在毛泽东、朱德、陈毅后的第四位；在古田八甲村松荫堂红四军政治部旧址里，我们发现其二楼有李任予旧居，这是李任予任红四军政治部主任时与毛泽东、陈毅等率红四军进驻福建上杭古田时

居住的地方，旧居里摆设有李任予曾经用过的办公桌等，旁边是贺子珍的旧居；在古田会议纪念馆第六展览厅里，我们发现有一份国家一级文物 1930 年 6 月 19 日“红四军责令土豪筹集军饷布告”，里面有红四军政治部主任李任予的亲笔署名；在第六展览厅里，我们还发现了由李任予创办的红四军军报《浪花》，经考证该报为我军正式出版的最早军报之一；在古田会议纪念馆的文物储藏室里，我们也发现了李任予曾经用过的油灯。

此外，我们分别到与李任予工作有关的闽西革命历史博物馆、连城县新泉革命纪念馆、上杭县南阳会议旧址、上杭县博物馆、上杭县保安宫旧址、龙岩市中山公园、龙岩师范、苏家坡闽西特委机关旧址、红十二军军部旧址、闽西肃反委员会旧址等处拍摄，并采访了古田会议纪念馆馆长傅柒生、该馆文物资料科科长吴锡超、副科长陈发来、连城县新泉革命纪念馆馆长黄丽珍、中共上杭县委党史研究室主任江树高、中共龙岩市委党史研究室宣编科科长李元健、永定县虎岗乡宣传委员吴剑等领导 and 研究人员，收获颇丰，拍摄和采访到了许多珍贵、重要的资料。其中，闽西革命史研究专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研究员、古田会议纪念馆馆长傅柒生的一番谈话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说：“大家都知道，1929 年 12 月 28 到 29 号，毛泽东、朱德、陈毅，就在上杭古田的曙光小学，领导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也就是彪炳史册的古田会议。在这个会议上，李任予同志不仅是参加了，而且是做了发言，还被这次会议选举为前委委员。在毛泽东、朱德发表讲话后，红四军政治部主任李任予代表政治

部致词。他说‘各位代表同志们，今天的九次代表大会的召开是有它特别重要的双重意义的，我想除开有大会主席及毛书记和朱军长的明言外，我们还应着重强调每个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对革命道德的服从，加强党团员的思想意识的锻炼是最重要的，所以要特别要求大会能号召全军的党员团员应以身作则地成为模范。’我觉得，李任予同志的这些话，对当时红军的建设，红军中党的建设，红军中团的建设，都起了重要的作用。李任予同志当时是任红四军政治部主任，对红四军党的建设，对红四军中思想政治工作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所以我们说，李任予同志在古田会议上作出重要贡献的。李任予同志在闽西活动期间，是积极开展革命斗争的，而且是卓有成效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的，对古田会议的胜利召开也是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毛泽东回到红四军领导岗位是在长汀，从苏家坡经蛟阳回到长汀，1929年11月28号回到长汀，李任予去接待他，而且还让毛泽东给红四军官兵讲课，发表演讲，鼓励广大官兵要积极上进。”

李任予就任红四军政治部主任这段时间，是他人生中的一个辉煌时段。他曾经得到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的信任，进入了红四军的领导核心层。现在公开出版的《毛泽东从韶山到中南海》、《陈毅传》、《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史》、《中国工农红军事件人物录》、《星火燎原》等权威书籍对此都有记载。著名的将帅罗荣桓、林彪、谭震林等在当时曾经成为他的老同事，他在闽西的老同事张鼎丞、邓子恢在解放后，都担任了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等要职。1931年春，受中共中央派遣，李任予离开了他为之付出了3年心血的闽西，

被派往上海、南京等地领导城市地下斗争。

四、李任予临危受命，为壮大发展北平市（今北京市）的党组织和发展党员做出杰出的贡献

1931年11月，中共北平市委遭破坏急需派员进行恢复、整顿，受党中央派遣，李任予化名李德山任中共北平市委组织部长，其妻子陈竹君任市委秘书长兼妇女部长。李任予上任后，即和其他委员一道投入恢复整顿党组织，领导北平各界反蒋抗日斗争之中。他深入到北平大学、清化大学等单位，了解情况，整顿发展党的组织，建立各种抗日团体，组织领导各种抗日救亡活动。12月4日~7日，李任予参与领导了著名的“爱国学生南下请愿卧轨斗争”。1932年4月，中共北平市委书记顾卓新调上海工作，将市委工作交给李任予负责。

李任予在中共北平市委工作的时间虽然不长，却做出了重要的成绩。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处副处长周进向采访组准确又全面地评价了李任予在这几个月的工作。他说：“在1930、1931年的时候，北平市委发展的状况，由于受‘左’倾错误的影响，还有罗章龙另立中央这件事的波及，北平成立了河北省紧急会议筹备处。后来中央派陈元道来北京整顿组织，加上当时个别市委委员的叛变，导致北京党组织和党员受到很大的损失。很多组织遭到破坏，很多党员失去联系。最严重的时候，是在1931年11月，在黎亚克（即李任予）到北京任组织部长之前，北京当时所属的党员只有76人。1931年11月，北平当时叫城区委，改为北平市委，这时黎亚克（即李任予）被

任命为北平市委组织部部长。他上任以后，最重要的一项任务就是要恢复党的组织。这一点，从 11 月份的 76 个党员，到年底就发展到 300 多人，基层党组织也达到了六七十个。应该说，黎亚克（即李任予）这方面功不可没。”

五、李任予作为一个党的高级领导干部，把生命献给了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他的精神会永垂千古，激励着全国人民不断地前进

英雄古城——保定，因为我们的杰出英烈李任予长眠于此，故与我们结下了深深的情缘。1992 年 5 月，我们与中共保定市委党史研究室的同行最终认定他们几十年来寻找的李之道（黎亚克）烈士和我们几十年来寻找的李任予就是同一个人。20 多年来，我办多次派人前往保定市调查和了解李任予的有关资料，在他们的大力支持下，我们的调查了解工作取得了重大的进展，为 2000 年 5 月顺利向广东省人民政府申报批准李任予为革命烈士的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因此我们对中共保定市委党史研究室同行的帮助一直心怀感激。他们也于 1992 年 5 月派出了安忠国和朴子荣两位领导到新丰县来调研。

这次在保定的调研重点是李任予领导的“二师学潮”和“高蠡暴动”两个重大历史事件和李任予为革命牺牲前的有关事件。中共保定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李丙申对我们的来访十分重视，首先安排了该办的党支部书记朴子荣接受我们的采访。他说：“1991 年下半年组织把撰写李之道人物传记的任务交给了我，交给我以后，我查阅了大量资料，到北京中央档案馆，访问跟李之道一起战斗过、工作的战友，

同事，然后从中央档案馆的线索里面，就发现李之道是广东新丰县人，然后就和我们安主任一起到广东新丰县，惠阳市，广州市，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还有黄埔军校有一个协会，先后走访了有十几个单位，收集了大量的材料。在新丰同党史办的陈主任，还有一个叫李石星，这两个老同志领着我们找到了李任予的家，叫车田围村，离县城很近，县城郊区，到那见到他弟，当时接待我们的是他弟弟，他弟弟当时都七十多了，他弟弟回忆他哥走的一些情况，就是当时那个年龄，身份、特征，跟我们所掌握的那个李之道是同一个人。实际上我们调查走访的过程，也是学习的过程，同时也是受教育的过程，李之道作为一个党的高级领导干部，把生命献给了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他的精神会名垂千古，激励着全国人民不断地前进。这么多年来，每每想起烈士为革命光荣而悲壮牺牲的情景，我的眼泪就情不自禁的流下来。”

李任予来到保定后，首先领导了轰动全国的“保定二师学潮”。保定二师即现在的保定学院。学院党委副书记苏宗印向我们介绍“学潮”的时候，学生在里面搞护校，军警在外面，荷枪实弹的，开始是包围了学校，因为学校跟外面的交通断绝了，里面没有吃的了，市民也是有组织地往里面投大饼，支援学生，中共保属特委当时也组织各方面力量进行支援，7月6号那天国民党就出动军警把围墙给推到了，把学生杀了13个人，先后42人，其中有3个还是特委委员，也是学生，宣传部长、组织部长、秘书长，都牺牲了。”

在保定工作和居住的地方——法院街，中共保定市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卢金婷接受我们的采访说：“1932年5月，李任予受河北省

委派遣，到保定任保属特委书记，他来到以后，首先改组了原来的保属特委，他上任之前的原保属特委书记贾振峰曾派齐庆祥到车站去接他，据后来齐庆祥回忆，李任予是操着南方口音，高高的个子，长方脸，白白的，给人印象是一介书生。但是他表现出来的是特别成熟稳练，挺精干的那么一个人。他当时来了以后就住在法院街，他当时是跟清华大学的一个学生陶瀛孙，组成假夫妻，他们是5个人组成一个家庭，陶瀛孙是做他的机要秘书，陶瀛孙是个怎样的人，1987年我们去采访她，她离休前是上海中学的一个校长，她回忆就说，当时她和李任予在保定，人们都叫他老李。他待人特别亲切和蔼，但是在工作上有严格要求，陶瀛孙原来是负责油印什么的，经常会弄到油污满身，他还跟她开玩笑，风趣地说，将来你的衣服可以进博物馆了，当时她们的生活很简朴，经常吃杂和面，老李曾说，我们现在吃杂和面，为的是让穷困的人将来都能吃上白面。”

李任予在保定领导的另一大件事是高蠡暴动，名著《红旗谱》就是以此真实事件为背景而创作的。高蠡暴动是保定地区高阳、蠡县一带的广大农民在中共河北省委和保属特委直接领导下掀起的一场震撼华北的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大规模的农民武装斗争；是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北方党组织创建红军、建立苏维埃政权的一次伟大尝试。这次暴动虽然失败了，但它是在我国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的时刻爆发的，它面对强大的国民党反动势力，英勇地高举革命红旗，在敌人的心脏华北腹地，掀起了一场浩大壮烈的红色风暴，为而后冀中平原的抗日游击战争奠定了群众基础，为中国革命播下了火种。我们想李

任予在当年领导这场斗争时，应该没有想到它日后会产生如此大的作用，同时让他没有想到的是，他会在这场斗争付出生命的代价。

卢金婷副主任领着我们顺利找到了当年李任予被捕的地方——保定基督教青年会和当年李任予被害的地方——西城墙根下的水闸处。她说：“1932年9月30日，保属特委书记李任予被捕以后，敌人组成那个联合审判小组，对他进行所谓的审讯，敌人还对他施以各种酷刑，鞭打、灌辣椒水、压杠子，竹签扎手指，他后来从监狱里面捎出一张纸条，陶瀛孙从他爱人那见着了，写道：‘我受刑很重，竹签扎到手指里，十指溃烂，但是我只有不知道三个字’。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坚贞不屈的革命精神。他爱人到监狱看望他，看到他骨瘦如柴，在那里哭，但是他还鼓励她，安慰她，为了革命。当初河北省委跟保属特委都想方设法想营救他，他的老朋友冯玉祥、蔡廷锴、蒋光鼐出面跟蒋介石担保，但是蒋介石不予通融。11月27日，敌人将他们押赴刑场，就是保定小西门外的水闸，水闸水窖处，这就是当年那个水闸，英勇就义。杀害的时候有个细节，敌人骗他要转移，要将他带到北京去，有三个犯人，有两个犯人是压住他，怕他宣传，他嘴里又塞着纸条，带到这边的时候，就把他推下来，推下来他就喊了，红军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这些是根据当时行刑的敌人，后来解放后供词说出来的，所以我们觉得他是一个坚贞不屈，大义凛然，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

听说李任予牺牲后，人们把他安葬在离保定市区约60多公里外的高阳县北辛庄村的高蠡暴动殉难烈士墓里。该烈士墓石碑刻有李任

予等殉难烈士的英名。该处后来改为高蠡暴动纪念馆。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车程，我们来到了高蠡暴动纪念馆。该馆占地10500平方米的，里面有烈士纪念塔、碑亭、烈士墓、烈士纪念碑、展室。该馆负责人边镇江十分热情。知道我们要来采访后，他早早在纪念馆等候，并为我们准备了一些资料。他对我们说：“高蠡暴动发生在1932年8月，这个事是在红军第三次反围剿胜利之后，中央决定在中国北方发动一次大的暴动。经过河北省委研究，认为在高阳蠡县一个交界的地带，也就是现在这个位置，这一带组织一次暴动。暴动前夕，也就是8月8日，黎亚克同志即李任予当时的身份就是保属特委书记，他在高蠡地区巡视了11天以后，认为暴动已经成熟，就给省委写了一个报告。省委接到报告以后，于是23日派河北省委军委书记湘农以及团省委特派员白坚两个人到高蠡地区来组织这次暴动。历史上有次会议叫‘8·23会议’，这个会议是在宋洛曙住的一个房间召开的会议，决定在8月28日暴动，8月27日提前爆发，为什么提前爆发呢？因为敌人已经有所察觉，只能是提前爆发。爆发以后，成立了3个大队，发了120多根枪，300多个人，当时参加的群众有几千人，在这一带打土豪分田地。由于反动政府派了一个骑兵连，骑兵连是国民党白凤翔七十六旅的一个连来镇压，于西边，南边和东边形成三面包围，用机枪封锁大门，因为当时红军没有作战经验，毕竟是土枪土炮，装备落后，没有训练，准备仓促，致使这次暴动失败。失败之后，当场在那牺牲了17个人，前后牺牲了47个人。黎亚克同志在保定被捕，在保定是青年读书会，出了叛徒，叫他接头，把他抓

了。他被捕以后，坚贞不屈。高蠡暴动虽然失败了，但是播下了革命的火种，也成就了一部历史巨著《红旗谱》，《红旗谱》也就取材于高蠡暴动这件事情。关于黎亚克的死，死得非常壮烈，当时在敌人的刑堂上，在审讯他的时候咆哮公堂，在敌人的刑场上宁死不屈，喊共产党万万岁！因为他的赤化宣传，敌人十分惧怕，在行刑的时候，给他戴上马嚼子，用两个人把他压着，押到车上，杀害于保定西关门外，死得非常壮烈，非常悲壮。咱们纪念馆里，也有他的一些事迹，后人，他的战友也有一些回忆录，下来提供给各位，希望做个借鉴吧。给历史一个交代，也给亚克烈士一个说明吧”。

在纪念馆烈士墓前，边馆长指着竖立在烈士墓前、高约 1.3 米的石碑对我们说，这就是 1946 年 2 月建起来的纪念碑，里面刻有李之道（即黎亚克、李任予）的名字。

在碑的左上方，确实有一条名字李知道，我们觉得很奇怪：“怎么叫李知道，是否刻错了，应该叫李之道才对。”他说：“真惭愧，这是个历史遗憾的错误，当时立这座碑时是 1946 年 2 月，当时还没有解放，资料比较少，人们根据口音把李之道的之字错刻成知字，因为是原始的碑，很难改，所以一错再错，真是很对不起烈士，我们只有在其他文字介绍材料方面来纠正。”

在纪念馆大门悬挂有白克明书写的“革命先烈 精神长存”，边馆长向我们介绍，白克明是李任予当年一起领导高蠡暴动同事白坚的儿子。白坚当时任河北省团省委特派员、保属团特委书记。白克明是现任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主任，曾任人民日报社社长、中共海南

省委书记、中共河北省委书记等职。他对高蠡暴动纪念馆十分关心，这是他 2006 年 4 月时任中共河北省委书记到高蠡暴动纪念馆视察时的题字。没错，为广大人民群众谋幸福、为共和国的解放事业、为了共产主义事业牺牲的革命先烈的精神将永远长存！

在我们圆满完成 20 多天的调研采访，即将离开保定市时，我们情不自禁地想起一首与我们的李任予烈士有关的歌词，“你们为革命而牺牲，留下了光荣的死，你们长眠在坟墓中；残暴的强权还在行凶，我们踏着这一条血路而前进，继你们的志以慰你们。残暴的强权还在行凶，我们踏着这一条血路而前进，继你们的志以慰你们。”这是 1933 年春，在“高蠡暴动”失败后，中共保定特委组织悼念保定二师学潮和高蠡暴动殉难烈士们唱的《悼念烈士歌》。

朴子荣说得没有错。李任予把生命献给了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他的精神将会名垂千古，将会激励着我们永远跟着党走，不断开拓！不断前进！

本文为李美通、张文聪合撰发表于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红广角》2013 年第 5 期。

李任予生平年表

1903 年 诞生

11 月 4 日（农历九月十六日） 李任予出生于广东省新丰县丰城城东车田围村，乳名亚桥，辈名济道，曾用名李力一、李德山、李之道、黎亚克。

1909 年 6 岁

李任予随父读私塾，在父亲的严格管教下开始接受启蒙教育。

1911 年 8 岁

读书期间，李任予母亲由于终年操劳积劳成疾，虽经精心调治最终因医治无效撒手人寰。遭此变故，他只好放弃学业回家承担一些家务劳动。生活上的艰辛促使他萌发了对贫富不均现状的愤慨！

1912 年 9 岁

李任予由外公带到新丰县诸家镇塘陂岭（今新丰县梅坑镇大岭村）寄养，在这种艰辛的环境中度过童年，从小就饱尝了生活的艰辛和穷人的疾苦，磨砺出他坚强的意志和吃苦耐劳的精神。

1913 年 10 岁

李任予随舅父潘庚平（新丰县梅坑大岭人、清末秀才）读私塾。他聪明伶俐，自幼养成了爱问好学的习惯，求知欲很强，发奋读书，各科成绩都名列前茅。

1919 年 16 岁

5 月 4 日，北京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五四爱国运动，震撼整个中国，揭开了中国现代史上伟大的一页。在反帝反封建爱国运动影响下，各

种新思想、新文化，唤起了人们特别是青年一代知识分子的觉醒。李任予被新兴的潮流所鼓舞，长久以来压抑在胸中的激情从此振奋起来。

1923年 20岁

为了更好地吸收接纳新思想，寻求救国报国之路，李任予离开家乡前往广东韶州（今韶关市），在其舅父潘庚平好友潘允和（当时在韶州开药店）的帮助下，到韶州府神道学校就读。他参加了该校进步组织，经常组织同学们讨论反帝反封建等社会问题，同这些具有革命意识的同学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并很快成为该校进步活动的骨干。

1924年 21岁

神道学校学生发起反对学校当局压制进步活动的学潮斗争，李任予因积极参加学潮，被校方开除。李任予是个有抱负的热血青年。他并未因校方开除而消沉，反而更加坚定了救国救民的决心。

1925年 22岁

春，李任予到广东甲种工业专科学校就读。

6月 李任予耳闻目睹帝国主义列强对游行队伍的镇压以及封建军阀的黑暗统治，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无比的愤慨使他产生了强烈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主义思想。工人们反帝反封建的英勇壮举，激发起他放弃学业，加入工人运动的念头。

8月，李任予告别读书生涯，投笔从戎，在广州市从事工会工作，领导工人开展罢工斗争。不久，他担任北海中队长，缉获走私，罚收

巨款，充作办学，曾登报广闻。他还积极参与发动广西北海的革命群众运动，与黄敬云一起在北海指导开展“援助省港罢工周活动”，募捐款项支援省港大罢工，同时还将作恶多端的英帝分子驱逐出境。

10月，在苏兆征、邓中夏、李森等工人运动领袖的培养教育下，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他成为一名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

1926年 23岁

李任予在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十师蒋光鼐部任团政治指导员，协助蒋光鼐训练军队。

1927年 24岁

4月15日，广东的国民党反动派按照蒋介石指令，发动了四一五反革命“清党”大屠杀，广州弥漫着血雨腥风。为保存革命火种开展新的战略转移，李任予在党组织的安排下，离开广州到北江（今韶关市）及江西等地从事革命活动。

11月26日，中共广东省委根据党的八七会议精神和中共中央指示，决定在广州发动起义。李任予不顾个人安危由江西赣州绕道返回广东，途中遭遇检查，他化装脱险来到广州后，全身心投入广州起义的准备工作中。

12月11日，广州起义打响后，李任予勇敢地参加了战斗，同敌人进行殊死搏斗。

12月13日，广州起义失败后，李任予根据党组织的安排，前往闽西任职，几经周折后找到中共福建临时省委。

1928年 25岁

春，李任予参加中共福建临时省委的领导工作，在福建西部地区领导农民开展武装斗争。

3月，平和暴动暴发，中共福建临时省委接到平和临时县委即将举行暴动和要求派得力同志来指导帮助的报告后，立即“派李任予和刘端生（中学巡视员）两人为特派员，代表中共福建临时省委前往该地协助工作，将省委的指示精神转给平和党部，并设法打通平和与省委的交通（线）”。二人经过艰难跋涉绕道永定到平和，找到平和党组织和农民暴动队伍。从此，“省委与平和建立了完善的交通（线）。”

李任予到闽西后，与当地党组织密切协作，为创建闽西苏区，建立工农武装作了大量工作，受到党组织和人民群众的好评。

11月，中共福建省委候补书记罗明从龙岩来到上杭传达中共六大会议精神。会议对中共上杭县委领导机构进行了改组，增选委员7人，其中常委3人，候补委员2人。李任予任中共上杭县委书记。

李任予任中共上杭县委书记后，依照中共六大精神和罗明的指示，带领上杭县委致力于农村争取广大群众，积蓄和发展革命力量，并转入分散和隐蔽的游击战争。恢复和扩大各区乡党的组织，建立党的基础；积极准备第二次更大的暴动。1929年4月，上杭党员由200余人发展到300多人，建立区委4个、支部30余个。10月后，党组织迅速发展，有党员3049人。

1929年 26岁

3月，中共福建省委指派李力一（李任予）到上杭城水南，召开（龙）岩、永（定）、（上）杭、（长）汀、武（平）5县代表会议，

恢复建立中共闽西临时特委。李任予任中共闽西临时特委军事书记，成为闽西人民开展武装斗争的主要领导人。

李任予任军事书记后，积极领导闽西地方武装贯彻福建省委“工作大纲”，发动群众开展武装斗争，积极配合红四军行动，为红四军再次入闽，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5月，李任予领导闽西地方武装配合红四军作战，先后打败了盘踞龙岩、永定、白砂等地的国民党军队，解放了龙岩、永定县城，极大地打击了反动统治，土地革命的巨大浪潮席卷龙岩、永定、上杭、长汀、连城5县，开创了闽西革命斗争的新局面。

6月，红四军在望云草屋召开了前委扩大会议。会议决定帮助闽西建立正规红军，成立地方苏维埃政权，使整个闽西形成工农武装割据局面。会后，朱德在红四军军人大会上宣布，在闽西红五十九团及地方农民暴动武装的基础上组建红四军第四纵队，任命李任予为红四军第四纵队党代表。

6月19日，李任予率领红四军第四纵队参加了攻打龙岩城的战斗。

6月20日，李任予与毛泽东、朱德、陈毅等红四军领导一起参加了在龙岩城中山公园举行的祝捷大会。

6月22日，李任予参加了在龙岩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

7月，李任予与毛泽东、朱德、陈毅等红四军领导率领部队在闽西一带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打土豪、除匪霸、分田地、建立红

色政权，为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建立作出了重要贡献。

7月27日，李任予创办红四军军报《浪花》，后经专家考证，该报为红军最早的军报之一。

8月，李任予随红四军军长、代理前委书记朱德向闽中出击。

8月7日，中共福建省委给闽西特委、红四军前委的信特别提到“李力一（李任予）同志暂时在红军中工作，如果红军离时，他一定要留在闽西做党的工作，因为他会说本地话，而且是一个得力的干部”。中共福建省委的信，充分肯定了李任予在闽西和红四军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9月6日，李任予与红四军部队一起重新占领龙岩城。

9月20日，李任予在红四军军长、代理前委书记朱德的领导下，率领红四军部队攻克素有“铁上杭”之称的上杭城。

9月下旬，李任予参加在上杭城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红四军第八次代表大会。

10月初，李任予兼任中共上杭县委书记。

10月18日，李任予参加由红四军军长、代理前委书记朱德主持召开的红四军前委和中共闽西特委联席会议。会上决定红四军执行中央指示，向东江进军。

10月27日，红四军回撤闽西途中，在广东丰顺边界的红四军政治部驻地，红四军前委书记陈毅为李任予赠诗“且遣李郎招旧部，重阳决策下福州。”

11月初，李任予与朱德、陈毅一起带领红四军撤离东江，经赣

南的寻乌回师闽西。

11月18日，李任予参加在福建上杭官庄举行的红四军前委会，讨论和学习中央“九月来信”精神，并决定“扩大闽西赤色区域，建立闽西政权的政策”。

11月28日，毛泽东从苏家坡经蛟阳回长汀时，李任予去接待他，同时还让他给红四军官兵讲课，发表演讲，鼓励广大官兵要积极上进。

毛泽东重新回到红四军主持工作后，李任予积极协助他开展社会调查和群众工作，陪同毛泽东在红四军政治部所在地长汀学宫向群众演讲，临时当起了毛泽东的翻译，用客家话把毛泽东的话复述一遍，群众听了很亲切，在亲切的气氛中得到了革命的启蒙。

同月，李任予参加了在福建长汀举行的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会议决定加紧对红军进行整顿和训练，并决定召开中国共产党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即古田会议）。作为红四军政治部主任，李任予在这个历史转折时期，为红军部队建设和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

12月3日，李任予与毛泽东、朱德、陈毅率领红四军进驻福建连城新泉，随后在红四军开展了举世闻名的“新泉整训”。

“新泉整训”期间，李任予协助毛泽东、陈毅主持新泉政治整训工作，协助毛泽东起草了红四军党的九大的决议草案。“新泉整训”历时17天，极大提高了红四军广大官兵的军事素质和政治思想水平，为古田会议的胜利召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2月17日，李任予与毛泽东、朱德、陈毅率领红四军从新泉进

驻上杭古田，一方面继续进行军事政治训练，另一方面继续为召开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作思想和组织上的准备。与毛泽东、陈毅一起居住在红四军前委机关及政治部驻地古田的八甲村松荫堂。

12月18日，李任予与毛泽东、朱德、陈毅等参加了红四军联席会议。

12月28日至29日，李任予作为120名代表之一参加了在古田曙光小学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即著名的古田会议）。在毛泽东、朱德、陈毅发表讲话后，李任予代表政治部致词。会上，李任予被当选为红四军前敌委员会委员，成为当时红四军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古田会议后，李任予按照会议精神，认真整顿军队纪律，纠正错误思想，端正党的作风，为粉碎国民党军的“围剿”，转战闽赣地区。

1930年 27岁

1月3日，李任予与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从上杭古田出发，经连城、清流、归化、宁化县境，而后转战于赣西南。

2月6日至9日，李任予与毛泽东等一起参加了在江西吉安陂头举行的红四军前委，红五军、红六军军委和赣西特委联席会议（即二七会议）。会议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决定成立既领导赣西南、闽西、东江革命根据地党组织、苏维埃政府和地方红军，又指挥主力红军第四、第五、第六军的“前委”，将中共红四军前委扩大为中共共同前委，前委委员由红四、五、六军和赣西南、闽西、东江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党政军领导人组成，毛泽东为前委书记。

2月7日至9日，重新成立中共红四军军委，李任予与朱德、潘心源、伍中豪、林彪、熊寿祺、罗荣桓任中共红四军军委委员。

2月24日至26日，李任予与毛泽东、朱德指挥红四军和红六军一部协同作战，全歼国民党独立旅唐云山部近3000人，极大地震动了闽粤赣3省敌人。

4月下旬，在江西会昌的筠门岭，红四军政治部主任李任予签署了《宣传员工作大纲》和《红四军各级政治纲领》，明确了红四军各级政治工作纲领和政治工作基本原则，为红军军事系统与政治系统的关系作了明确规定。

6月12日至22日，李任予与毛泽东、朱德等参加了在长汀的南阳（今属上杭）召开的著名的“南阳会议”。会议总结了闽西土地革命的成功经验，提出了“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分田办法，并通过了“富农问题”和“流氓问题”两个决议案。

6月23日，红四军第四纵队与红十二军第一纵队在龙岩县城合编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一军，李任予任政治委员、军委书记，胡少海任军长。李任予同时还兼任中国红军军官学校第一分校（闽西红军学校）校务委员、校政治部主任。

6月25日，李任予领导的红二十一军奉命留守闽西，担负扩大和巩固闽西革命根据地的任务，为闽西革命根据地的扩展发挥了一个革命军事家应有的作用。

7月上旬，李任予与军长胡少海率领红二十一军剿匪，一个月内消灭了龙岩、万安、白砂、十八乡、漳平、永福等地国民党部队、地

方民团、武装土匪，进一步发展了闽西革命根据地，为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的革命理论提供了成功的经验。

8月5日，在攻打漳平永福的战斗中，红二十一军军长胡少海不幸中弹牺牲，李任予继续率领红二十一军转向连城县姑田、梅村一带游击，并在姑田帮助建立了上堡、中堡、下堡革命委员会，巩固扩大闽西革命根据地。

8月9日，李任予在龙岩中山公园召开的红二十一军出击广东东江誓师大会上，对3000多名指战员发表演说，进行战斗动员，率领红二十一军开始了闽西红军第二次出击东江的行动。

8月中旬，李任予率领红二十一军在广东大埔高陂与敌人激战，后转战福建平和。

9月中旬，中央派巡视员到闽西，召开了闽西总行委和二十一军联席会议。为了扩大政治影响，会议决定组织闽西革命军事委员会，指定李任予为闽西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统一闽西南和东江的红军作战指挥。

9月21日，李任予写了一份《进攻东江经过及最近内部情况》的报告，委派军政治部主任陈正前往中央军委南方办事处、广东总行委汇报。

10月，为加强地方党组织的领导，在红二十一军出击东江时，红二十一军政治委员李任予兼任中共上杭县委书记。

10月7日，中央派施简到闽西工作，召集闽西总行委、红二十一军军委、闽西红军学校校委联席会议，决定将红二十一军与红二十

军合并为新十二军，施简为政治委员，左权为军长，李任予为政治部主任。

11月初，红新十二军成立并经过2个星期的整训之后，又被调去攻打平和，准备迂回出击东江，但均以失利而告终。

12月下旬，李任予离开为之战斗了3年的闽西，前往中央驻地上海，被中央派往上海、南京从事城市地下革命斗争。

1931年 28岁

上半年，李任予受中央委派，活动于南京、上海城乡，发展党的组织，建立工会、农会等进步群众团体，秘密领导工人、农民、学生开展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斗争。期间，李任予在上海与武汉军校出身的女党员陈竹君（福建人）结婚。会见过好友——国民党第十路军总指挥蒋光鼐，结识了国民党高级将领冯玉祥和蔡廷锴。

9月，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民族矛盾激化，国民党内部抗日反蒋情绪增长，李任予抓住这一有利时机，深入活动于国民党中上层，广交朋友，互倾爱国衷肠，共商反蒋抗日救国之策。国民党高级将领冯玉祥主动提议李任予组建工农群众武装，并联系好友国民党爱国将领、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相助。于是，李任予拿着冯玉祥的亲笔信找到在南京沪宁路布防的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蔡廷锴欣然应允提供一切之必需，并当即预支1000块大洋给李任予，作为组建革命武装的经费。

11月，在中共河北省委、北平党团组织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况下，中共中央派李任予到北方开展革命工作，恢复整顿党组织。

中共北平市委遭破坏急需派员进行恢复、整顿，李任予临危受命，以中央特派员身份，肩负中央交给的重任到北平恢复整顿党组织。他化名李德山与妻子陈竹君一起来到北平参加组建北平市委。李任予任市委组织部长，陈竹君任市委秘书长兼妇女部长。

李任予到任后，即和其他委员一道投入恢复整顿党组织，领导北平各界反蒋抗日斗争之中。他深入到北平大学、清华大学等院校了解情况，整顿发展党的组织，建立各种抗日团体，组织领导各种抗日救亡活动。

12月初，中共北平市委与共青团北平市委共同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群众性的反蒋抗日运动，并组织了由北平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及迁平的东北大学等院校几千名爱国学生组成的南下请愿团，准备赴南京，向国民党政府请愿示威，要求抗日。为加强对这一运动的领导，市委专门建立了指挥组织，并作了具体分工，李任予负责组织南下请愿团的工作。

12月4日，各校参加请愿的同学集合于前门火车站，准备乘火车南下请愿，车站奉当局之命，拒绝学生上车，中共北平市委经过研究，召开各校代表紧急会议，决定采取卧轨斗争。李任予率领部分请愿团学生到张学良驻地和国民党北平市党部请愿，要求立即允许学生南下请愿。张学良答复请示国民党政府后再予回答。而市党部拒绝接见学生，愤怒的学生边喊口号，边向里冲，并砸毁了市党部牌子。学生们卧轨斗争，使北平与外地交通断绝，同时赢得了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在学生的顽强斗争和社会舆论的压力下，国民党北平当局惊恐

万状，为摆脱窘境，遂于12月7日允许学生乘车南下，卧轨斗争取得了胜利。

12月下旬，李任予深入到北平大学、清华大学、辅仁大学等院校，了解情况，发展党的组织，并对青年学生和工人进行革命理想教育，勉励学生党员，要好好学习，多学一些革命理论，要下功夫进行钻研。在他的帮助下，许多同志进步很快，成为革命斗争骨干。

1931年9月，北平全市所属党员仅76人。李任予重点抓恢复党的组织，逐步恢复了被破坏的区委和一些基层支部。到1931年底，党的基层组织有六七十多个支部，党员有300多人，其中大部分是学生。李任予在北平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近郊远野，为北平市党组织的恢复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1932年 29岁

4月，中共北平市委书记顾卓新调上海工作，李任予负责中共北平市委工作。

4月春，北平西郊建立了公共汽车场。黄包车夫们一看，说：“不行！他们建公共汽车场，我们就得失业，不能让他们建。”陶瀛孙等党员和区委书记刘瑞森酝酿，准备组织工人砸掉汽车。李任予知道了，忙着找他们谈话，他说：“有了汽车，是社会的进步，我们要引导工人进行正确的斗争，不能砸汽车。”接着同他们一起研究了斗争方法。学生党员很佩服他的才能，夸他有较高的领导水平。

5月，中共河北省委为贯彻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决定在国民党统治区开展工农和士

兵革命运动，以配合红军夺取反“围剿”的胜利。在这种形势下，中共河北省委将李任予（化名黎亚克、李之道）调到河北保定任中共保属特委书记，赴保领导保定地区革命武装斗争和学生运动，改组中共保属特委。

6月，李任予到保定时，正值保定反动当局破坏二师的爱国学生抗日救亡运动。面对反动当局镇压学生革命斗争的现实，李任予分析了二师矛盾的激化情况和党团基础，针对国民党反动派破坏二师学潮斗争的情况，决定开展一场争取抗日救国自由，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护校斗争。

为了以保定二师为基地，充分发挥学生党员的作用，燃起学校革命斗争的烈火，李任予吸收二师学生党员骨干曹金月任特委组织委员，杨鹤声任宣传委员，贾良图任秘书长。组建了新一届中共保属特委。

新一届中共保属特委成立后，李任予主持召开了特委会议，就通知二师学生返校、校内和校外的秘密联系方式和护校斗争的口号，以及组织二师学潮后援会等各方面的工作进行了研究和部署。二师学校便成了特委活动的机关。于是一场轰轰烈烈的二师护校学潮斗争在保定展开。

6月20日，保定反动当局奉国民党河北省政府的命令，调集大批军警对二师护校学生实行武装包围，断粮、断电、断柴，断绝与外界接触，企图以武装威迫学生离校。李任予与特委成员发动校外党团组织 and 各界群众，为护校学生筹粮筹款送干粮，支持二师护校斗争。

二师护校委员会在保属特委领导下，带领全体护校同学，坚持斗争，粉碎了敌人武装包围、经济封锁等阴谋，同武装的敌人对峙了半个多月。

7月初，鉴于国民党反动派武装包围二师的严峻情况，李任予和赵天绪到北平向中共河北省委汇报二师学潮斗争情况，并对二师下步斗争作了安排。由于当时北平各校已放暑假，李任予的北平之行没有将学生充分发动起来。他的指示也因封锁严密未能及时传到学校。

7月6日晨，保定反动当局调集大批军警推倒二师校墙、砸开校门，对手无寸铁的护校学生进行血腥镇压，制造了震惊华北的七六惨案。

惨案发生后，李任予一方面组织校外党团组织和进步学生揭露反动当局的暴行，安抚受难战友的家属，另一方面向中共河北省委汇报惨案情况。

中共河北省委为弘扬二师学生抗日爱国的革命斗争精神，发出了《为保定惨案境案告民众书》，强烈谴责国民党反动当局残暴屠杀爱国学生的罪行，号召全省人民进一步组织起来，掀起反蒋抗日斗争更大高潮。二师学生的抗日救国护校斗争虽然遭到了国民党反动当局的血腥镇压，但唤醒了全省人民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热情，扩大了共产党的政治影响，为保定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

7月下旬，李任予参加中共河北省委为贯彻中央北方各省代表联席会议精神而召开的省委全会和县委联席会议。会议讨论通过了《河北省委接受北方各省委代表联席会议的决议》，提出“在河北发展游

击战争，创造新的苏维埃区域”。

李任予返回保定，立即召集党团特委成员传达中央和省会议精神，根据保属各县情况，决定在高阳、蠡县一带发动农民暴动，派特委成员习从真去定县任中心县委书记，组织定县一带农民开展秋收斗争，以牵制国民党反动派，配合高蠡暴动。

8月8日—8月18日，为清楚了解高蠡农民的发动情况，李任予和省委秘书徐云圃来到保定东南区，对蠡县、高阳农村进行巡视，深入考察社会生活，了解乡土民情。在调查了解的基础上，为了使暴动计划更加周详，在高阳县南玉田村召开了高、蠡两个县委联席会，对在高蠡一带地区开展游击战争的准备工作进行了具体部署。

8月20日，李任予在保定主持召开了中共保属特委全委会，就巡视高阳蠡县情况和布置暴动事宜进行通报。会议认为“在蠡县东北区与高阳县东南区的地方暴动条件已经成熟，现在应组织并领导群众暴动，夺取政权”。会议决定将农民武装编为红军，李任予任军政治委员，红军设1个师3个团，初步议定师、团领导人员。

8月21日，李任予以中共保属特委的名义向中共河北省委作了《保定特委为布置蠡县、高阳游击战争致省委的报告》。中共河北省委收到报告后，立即召开省委紧急会议。省委书记孟永祥、军委书记湘农、组织部长赵声等20多人出席会议。会议未作认真研究通过了李任予以保属特委名义给省委写的报告并做出决定，让军委书记湘农到保属特委，代表省委负责指导一切工作。

8月23日，李任予、湘农、白坚主持召开保属党团特委联席会

议，博蠡中心县委、高阳、定县、完县的县委书记列席了会议。会议中心议题讨论高蠡暴动问题。湘农首先传达了省委指示，李任予就高蠡暴动的部署，指挥机关的组成以及队伍的编制等问题，向会议作了报告。

会后，李任予代表中共保属特委将会议情况和保属特委关于布置高蠡游击战争的行动计划报告省委。中共河北省委根据北方会议精神批准了保属特委关于布置高蠡游击战争的行动计划。

8月25日，李任予、湘农和宋洛曙主持召开紧急会议，传达中共河北省委指示，强调高蠡两县应立即发起暴动。

8月27日，李任予和团省委特派员白坚负责全面指挥的高蠡暴动首先在蠡县宋家庄发起，随后，蠡县东北区、西区和高阳县东南区的农民纷纷起来响应。暴动队伍所到之处，张贴保属革命委员会第一号布告，向群众公布游击队十大纲领，发动群众，扩大队伍，收缴反动武装的枪枝，打土豪、斗地主、分粮仓、砸盐店、废除高利贷和苛捐杂税，深受群众欢迎。

8月30日，游击队采取里应外合的战术，缴获了高阳县北辛庄保安团、公安局、区公所等处敌人的长短枪40余支。

同日晚，湘农在北辛庄召开紧急会议，宣布建立地方苏维埃政府，湘农任主席，宋洛曙任副主席，同时整编了游击队，正式成立河北红军游击队第一支队，下设3个大队，共300余人，湘农任支队长。

8月31日，当红军在高阳县西演村等地获胜班师返回北辛庄召开大队长、政治委员军事会议时，被国民党驻安国白凤翔骑兵团包围。

红军游击队奋力抵抗，由于暴动队伍武器不足加上缺乏必要的战斗经验，终因敌我悬殊当场牺牲 17 人，被捕 19 人。大部分队员突围后在数倍敌人的追击下被打散。另一支博野暴动农民 40 余人在向主力汇集的途中也遭到保定派出的国民党军围剿，20 人被捕，其中 19 人被杀，只留下一个最小的暴动队员刘青山。至此，一场由共产党领导的农民暴动失败了。高蠡暴动虽然失败了，但暴动震撼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社会基础，打击了敌人反革命气焰，唤醒了劳苦大众的阶级觉悟，扩大了共产党在人民心目中的影响，播下了革命火种，为冀中平原在抗日和解放战争时期开展武装斗争，建立红色政权积累了经验，奠定了群众基础。

9 月初，高蠡暴动失败，李任予痛心不已。他不顾敌人搜捕、屠杀、强忍悲痛继续指挥战斗。他一面派人秘密到暴动地区，慰问暴动队员家属，安葬烈士；一面组织保定及周围各县党团组织寻找保护暴动失散人员，并亲自督促检查党的保密工作，以最大限度减少损失，待机再行暴动。

9 月 30 日下午 1 时许，李任予等两人来到保定基督教青年会阅报室转移特委油印机、誊写板等物时，由于叛徒出卖，被埋伏在阅览室的特务抓捕。

10 月上旬，李任予被捕后，国民党反动当局如获至宝，由驻保十四旅军法官曹桢、保定特种公安局局长于锡藩和清苑县县长金良骥组成审判小组，昼夜审讯，企图从他口供中获得保定地区党组织、河北省委及北平市委最高领导人的情况，以彻底摧毁整个北方的共产党

组织。国民党反动派对李任予施以鞭打、火烫、压杠子、灌凉水、手指钉竹签等种种酷刑的摧残和折磨，妄想迫使其屈服。在国民党反动派的法庭上，不论是严刑拷打还是叛徒出场对质，得到的只有李任予“来保寻找朋友，其他一概不知”的供词。他曾通过妻子陈竹君给河北省委秘密传出一张纸条，其上写道：“我受刑很重，指甲都被拔掉，十指溃烂，但我的口供只有三个字：‘不知道’。”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坚贞不屈、视死如归的革命意志。

10月中旬，李任予被捕后，中共河北省委和北平市委通过各种社会关系积极进行营救，并通过冯玉祥、蔡廷锴向蒋介石交涉，均以“李任予是中共保属特委书记，组织领导高蠡暴动有据而拒绝通融”。

经过一个多月的审讯，当时化名李之道的李任予始终缄口不言。审判小组黔驴技穷，只有以“李之道已抱定为共党牺牲之决心，多次审讯，茹供不吐”为由，“拟依照《危害国民紧急治罪法》判处死刑”的请示，得到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既证据明确，准照执行”的批复。

11月27日早晨，国民党军警秘密把李任予从牢房提出，押往保定城外小西门刑场。军警害怕李任予沿路宣传，便将李任予放平躺在车上，叫两名犯人压在身上，使其不能说话。刑车在军警的严密看押下驶向保定城外小西门水闸冰窑处。当军警把李任予推下刑车后，李任予面对死亡，昂首挺胸，在“红军万岁！”“共产党万岁！”的高呼声中倒在血泊里。人民的好儿子，中国共产党的坚强战士、红军早期领导人李任予为了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和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

献出了自己年轻宝贵的生命，牺牲时年仅 29 岁。

12 月 1 日，《天津益世报》以“保定共党领袖李之道等昨枪决”为题报道了李任予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的消息。

12 月 18 日，中共河北省委致中央信中，汇报了中共保属特委书记李任予英勇就义一事。河北省委曾在党内刊物发表了《悼念亚克同志》的文章，省委书记孟永祥也在北平市委的一次会上，介绍了李任予为党献身的英勇事迹，号召大家学习他的革命精神，踏着烈士的血迹前进。

同月 中共保属特委组织悼念保定二师学潮和高蠡暴动殉难烈士。

李任予被追认为革命烈士大事记

1946 年

2 月，高蠡人民怀着对先烈的崇敬心情，在高阳北辛庄竖立了烈士纪念碑，碑文刻下了李之道（李任予）和其他烈士们的光辉名字。1957 年又在此建造了高蠡暴动殉难烈士纪念塔。1978 年后重新修葺改名为：辛庄烈士陵园、高蠡暴动烈士陵园、高蠡暴动纪念馆。

1953 年

3 月 23 日，李任予父亲李名伍写信给毛泽东，查询李任予的下落。

4 月 24 日，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秘书处复信说：“你 3 月 23 日给毛主席的信已转我处处理了。关于查询李任予同志下落问题，因时间相隔甚久，部队建制变动很大，短期无法查到，我们拟印发军属寻人名单发至部队，广泛寻找，待查明下落后，当即去函告知。”

1956 年

李任予弟弟李任辉（李安闰）写信给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查询李任予下落。

10 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信访办公室以总政秘群字第 6211 号复信：“关于查询你哥哥李任予的下落问题，据纺织工业部蒋光鼐部长回忆：你哥哥在 1924 年国共合作时，曾任广州教导团政

治指导员。蒋光鼐部长离开该团时，曾介绍他到广州市公安局工作。以后蒋部长曾在上海见过他。后来他在华北区作地下工作，被当时的反动政府拘捕入狱以后就无消息。因时间相隔甚久，而且没有适当的线索，我们无法查明他的下落。特复。”

1957 年

新丰县人民委员会民政科部署对革命烈士进行调查，新丰县城东乡人民委员会派员找到李任予的同乡、族兄弟李寿祺（曾在民国时期任过新丰县政府教育局局长）进行查访。李寿祺于当年 10 月写出回忆，谈到李任予到北平时曾与他通过信，以后无消息。调查后，新丰县人民委员会意见：应称为失踪革命工作人员。

1959 年

6 月 4 日，时任民革中央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蔡廷锴给中共保定党史部门杜毅写信，介绍有关李任予生前事迹。

1984 年

中共新丰县委党史办公室成立后，于同年冬派两人外出调查李任予史料，先后到南京、北京、上海等地进行查询，均无所获。

1985 年

新丰县志办公室成立，与中共新丰县委党史办公室合署办公，又派员到北京、天津、上海等地的党史、档案部门进行查找。在当时的解放军海军学院，找到了编写《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汇编》的王健

英。他提供了许多情况。他说：“李任予，又名李力一，他在福建闽西从事革命活动，先后担任闽西军委主席、红四军政治部主任、红二十一军政委等职，但到 1931 年后就不知去向了，建议你们到闽西去查找。”

1986 年

中共新丰县委党史办公室和新丰县志办公室以“两办”名义向全国各省市的修史、修志部门发函查询，陆续收到了一些信息。最有价值的是时任福建省政协副主席傅柏翠的复信。他证实李任予于 1928 年到福建，参加了平和暴动，左腿受过伤。1929 年在闽西组建红四军第四纵队时，他任纵队长，李任予任党代表。

1987 年

中共新丰县委党史办公室和新丰县志办公室再次派 3 人前往闽西，在龙岩、古田查阅了《闽西文献资料》、《闽西革命斗争史》等史料，找到了李任予于 1928—1930 年期间，从事革命活动的大量资料和《红二十一军军委书记李任予给中央军委南方办事处、广东总行委的报告》，以及整编后第十二军政委施简、军长左权于 1930 年 12 月 19 日给中央的报告。报告中提到同意李任予的要求，前往上海找党中央。

根据线索，调查的同志便到上海找了有关部门，但一无所获。接着又前往北京、天津，查遍了许多档案资料，但都找不到李任予的名字。

1988 年

李任予的弟弟李任辉提供，解放前听韶关潘允和（李任予的知交）说，李任予 20 世纪 30 年代在保定被国民党逮捕杀害，国民党报纸都登过。

1989 年

中共新丰县委党史办公室、新丰县志办公室联署去函中共保定市委党史办公室和保定市志办公室，请他们提供李任予的情况，信发出后，未有回音。

1991 年

7 月，中共保定市委党史研究室来函新丰调查李之道（又名黎亚克）史料。

1992 年

5 月，中共保定市委党史研究室派出安忠国、朴子荣两人前往广东惠州查核李之道（李任予）籍贯，当他们了解到新丰曾归惠州管辖后，便转到新丰查找。他们说：“1932 年在保定任特委书记的李之道（又名黎亚克）因组织领导高阳、蠡县农民暴动失败，给叛徒出卖，被国民党当局杀害。他们党史部门从 1957 年起就进行调查，只知道他是于 1931 年从上海党中央派到河北，由中共河北省委派到北平市委，以李德山名字任北平市委组织部长。1932 年 5 月，又改名李之

道，到保定任特委书记。根据当时共事的同志说，只知道他是广东人，是哪个县的就不知道。据查国民党保定特种公安局档案材料，都说李之道‘供词闪烁，多方狡辩，籍贯一项，忽而安徽，忽而广东。’原收到新丰来函，是查李任予下落，名字对不上号。”于是，两地党史部门通报了调查的情况，双方初步确认：李德山、李之道就是李任予。

经过分析，两地党史办负责人共同签署了认定书。中共保定市委党史研究室并邀请新丰派人前往保定商议共同上报中央备案。后来，由于机构、人员的变动等原因，这件事停了下来。

1999 年

1 月，《广东党史》第一期刊登刘子健撰写的《青山何处觅忠魂》一文，提到“李任予牺牲 60 多年后，家乡的群众才得悉他早已血洒冀中大地。然而，时至今日，烈士的称号尚未得到正名，这不能不让后人发出感叹：烈士魂安何处？”

10 月，中共新丰县委党史研究室派两人前往河北省保定市、石家庄市，天津市，北京市调查李任予史料，各种材料得以齐备。

12 月，新丰县人民政府以《关于要求追认新丰籍红军早期领导人李任予烈士称号的请示》（新府〔1999〕164 号）向广东省人民政府呈递报告。

2000 年

5 月 12 日，广东省人民政府批准，追认李任予为革命烈士。

2002 年

4 月，中共新丰县委、县人民政府为纪念红军早期领导人李任予，在新丰县城南门塘文化广场竖立起李任予烈士的铜像，并将该广场命名为“任予广场”。

主要参考资料

1. 顾卓新：《关于李德山一些情况的回忆》（1992年5月9日），原件存中共保定市委党史研究室。
2.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秘书处秘群字第6211号复函》（1956年10月），原件存广东省新丰县档案馆。
3. 《李寿祺报告》（1957年10月24日），原件存广东省新丰县档案馆。
4. 傅伯翠：《关于李任予同志的几点报告》（1986年1月），原件存广东省新丰县史志办公室。
5. 《中共福建临时省委给中央的报告——闽西暴动及闽西军事形势》（1928年3月15日）。
6. 《中共福建临时省委三月份工作报告》（1928年3月）。
7. 《红二十一军委书记李任予给中央军部南方办事处、广东总行委的报告——进攻东江经过及最近内部情况》（1930年9月21日）。
8. 《左权、施简给南方局、中央的报告——闽西的军事问题》（1930年12月29日）。
9. 蔡廷锴：《给杜毅同志的信》（1959年6月4日）；《蔡廷锴先生访问记》（1959年6月25日）。
10. 林枫谈：《李任予烈士的一些事绩》（1959年5月27日）。
11. 《访陶瀛孙同志》（1987年3月4日）。
12. 唐明照：《关于李任予情况的回忆》（1992年10月17日）。
13. 刘瑞森：《给中共保定市委党史办的信》（1986年2月27

日)。

14. 《河北省委给保定特委的指示信》(1932年7月29日)。

15. 《保定特委为布置蠡县高阳斗争致省委的报告》(1932年8月21日)。

16. 《保定特委向平(周湘农)关于保定游击战争问题报告》(1932年10月10日)。

17. 湘农:《保定特委关于高阳蠡县游击战争的经验与教训》(1932年12月22日)。

18. 《保定特委关于游击队发展经过及失败的原因和经验与教训报告》(1932年11月19日)。

19. 易北也:《保定特委游击战争的经验与教训》(1932年10月25日)。

20. 保定特种公安局长于锡藩:《呈河北省政府民政厅警务处及平津卫戍司令部电文》。

21. 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致:《驻保定陆军十四旅函》。

22. 陆军独立十四旅旅长陈贯群、清苑县县长金良骥、保定特种公安局长于锡藩:《会呈北平军事委员会分会文》(1932年10月20日)。

23. 《陆军独立第十四旅司令部、清苑县政府、保定特种公安局判决》(1932年11月)。

24. 陆军独立第十四旅旅长陈贯群、清苑县县长金良骥、保定特种公安局局长于锡藩:《会呈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河北省政府执行

李之道等情刑文》（1932 年 11 月 29 日）。

25. 中共保定市委党史研究室：《保定党史通讯》1993 年第 3 期。

26. 中共高阳县委编：《高蠡暴动》（节录），河北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

27. 苏士甲：《闪亮的红星：中国工农红军院校及其办校人》，新华出版社 2007 年版。

2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党的文献》、《文献与研究》编辑部编：《史林智慧琐谈 续一》，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8 年版。

29. 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史编委会：《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史》，解放军出版社，1993 年版。

30. 中共北京市委组织部、中共北京市委党史资料片征集委员会、北京档案馆：《中国共产党北京市组织史资料》，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

31. 中共保定市委组织部、中共保定市委党史研究室、保定档案馆：《中国共产党河北省保定地区组织史资料》（1922—1987），河北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

32. 军事科学院军事图书馆：《中国人民解放军组织沿革和各级领导成员名录》，军事科学出版社 1987 年版。

33. 《天津益世报》（1932 年 12 月 1 日），存天津图书馆。

34. 傅柒生：《军魂——古田会议纪实》，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2004 年版。

35. 傅柒生：《古田会议论文集》，解放军出版社 2006 年版。
36. 中共福建省龙岩市委党史研究室：《闽西人民革命斗争史》，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1 年版。
37. 中共龙岩地委组织部、中共龙岩地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龙岩地区档案馆：《中国共产党福建省龙岩地区组织史资料》（1922—1987），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
38. 闽粤赣边区党史编审领导小组：《中共闽粤赣边区史》，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9 年版。
39. 傅柒生、李贞刚：《红色记忆——中央苏区报刊图史》，解放军出版社 2011 年版。
40. 李清方：《碧血丹心——黎亚克在保定》，华夏文艺出版社 2016 年版。
41. 乔盛：《战争岁月——白坚战斗故事》，作家出版社，2005 年版。
42. 吴礼俊：《滨城革命风暴》（1925—1949 北海党史概况），《北海文史》第四辑。

后 记

2015年初，中共新丰县委、县人民政府启动了对红军早期领导人李任予的研究与宣传工作，着力完善纪念李任予相关硬件设施建设，以及史料的征集与整理，打造红色旅游文化品牌。

本人作为一名党史工作者，较长时间从事李任予的研究和宣传工作，在相关刊物发表了不少有关宣传李任予的文章，但从未向世人系统地记述李任予短暂而光辉的一生。这触动了本人利用史料编辑出版一本反映李任予一生的人物传记的想法，书名定为《云髻山飞出的雄鹰——红军早期领导人李任予传》，让世人更加了解他一生的光辉事迹。

李任予是中国工农红军早期领导人，是为数不多参加了著名的广州起义和高蠡暴动的中共传奇人物。半个多世纪以来，他的传奇事迹却长期湮没在历史的烟云之中而鲜为人知，这不能不说是个缺憾。

由于李任予少小离家，生前战斗经历曲折、崎岖，所用化名多，牺牲时间较早等原因，家乡人一直不知其下落。新中国成立后，李任予家人和新丰县党史部门为了解开李任予的神秘失踪之谜，进行了几十年的苦苦追寻，才终于查明他的下落。

20世纪90年代末至21世纪初，作者有幸参与了对李任予史料的调查落实工作。他的革命活动主要集中于1925—1932年这7年时间里，且横跨粤闽赣京冀5省市，因此史料的征集较为困难。由于年代久远，他的史料特别是记载他在红军时期的史料相对较为匮乏，又

没有同事或部下留下回忆文章。在出版的书籍中虽有介绍他担任军中的职务，但文字介绍他的传奇事迹少之又少。为尽可能找到更多有关他的史料，怀着对历史负责的态度和对英烈的崇敬，作者与同事先后二次前往李任予生前战斗过的龙岩、上杭、古田、保定、北京等地，进行资料补充查找、认定，征集到部分很有价值的档案文献资料以及其他史料。

在挖掘史料的过程中，在中共福建龙岩市委党史研究室、古田会议纪念馆发现了部分鲜为人知的珍贵的资料。这些史料的发现，非常有价值，对于确立李任予在闽西苏区和红四军的历史地位和突出贡献，有着直接的、相当重要的佐证作用。

在征集李任予的历史资料的过程中，得到了中共保定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图书馆、中共龙岩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共上杭县委党史研究室、古田会议纪念馆、新丰县档案局（馆），李任予的亲属以及知情人士的大力支持，为李任予的资料征集、研究提供了大量的相关资料，使本书的内容更加丰富，史料更为真实。同时，还得到了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的专家陈弘君、李淼祥、林益，中共韶关市委党史研究室丁伟志、潘光人，新丰县人大常委会原常务副主任唐继仁，广东作家李剑魂等人对本书草稿的鼓励和指正！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为李任予一书的资料征集、研究和书刊出版给予了经费的补助。在此，对以上单位和个人热情帮助表示衷心的感谢！

由于李任予牺牲时间久远，资料匮乏，很多史料没有保存下来，使本

书的一些细节难免出现遗漏或不足，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作 者

2016 年 5 月